

K250.6

31
A13

革命史資料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三·北京

D 13945



《革命史资料》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何长工

副主任：孙 敏 杨放之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景范 刘瑞龙 刘 苏
刘立青 钱 贵 侯 政 温济泽 黄鼎盛
魏传统 麦先任

革 命 史 资 料

13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区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8 字数：140,000
印数：1~2,500册 定价：0.75元
统一书号：11221·13

目 录

-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失陷前后** 李金元 (1)
难忘的教诲 周钦岳 (9)
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 于树德 (14)
在国民党狱中 张明远 (20)
茅家岭暴动 李维贤 (52)
大革命时期的江华农运 吴健人 (62)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活 张季任 (82)
我所认识的赵一曼同志 方未艾 (98)
二十年代初期青岛纺织工人
 运动片断 王景瑞 (114)
首次占领延安 白志文 (127)
 北欧木屋中 江晴恩遗作 (134)
 后记：关于《北欧木屋中》 江柘舟 (150)
 反“扫荡”五日记 钱 钧 (152)
 赣南追歼战 张兴华 (159)

人 物

陈郁同志在全国海员总工会 陈修良 (168)

回忆红九师参谋长胡陈杰烈士

..... 徐孔嘉 陈云阁 (178)

陈志正烈士传略 陈立平 窦正敬 (185)

关于向警予同志的资料

向警予同志被“引渡”内幕 於润华 (191)

订正 张崇文等 (200)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失陷前后

李 金 元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寇从水上和陆地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天空每天有飞机盘旋、轰炸，机关、店铺都关门了门，人们惶惶不安。国民政府的文武大员们早已南逃，躲进大后方的公馆、别墅里避难去了。可我们的周恩来同志仍然坚持在这里领导武汉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当时，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又是我党南方局书记，领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兼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工作非常繁重而复杂。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经常不眠不休，组织群众撤退，转移和输送党的干部，组织出版由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社论的最后一期报纸。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小时。

十月二十二日，日军逼近，日本飞机对武汉也开始连续轮番轰炸，形势已十分紧急。但周恩来同志仍指挥若定，于这天下午亲自组织了我党最后一批同志的撤退，并为同志们送行。这批同志是由李克农和潘梓年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乘坐通过关系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准备直抵重庆。“新升隆”吨位小，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塞

满了，一百余人乘船显得很拥挤。这时，岸上几十名无钱购买船票的难民要求搭船。周恩来同志告诉大家，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这个要求，挤也要让他们挤上去。说时，他亲自上船一一清点人数，腾挪位置。安排就绪后，他又给大家讲了话，并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要离开朝夕相处的首长和同志们，许多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新升隆”徐徐开动了，周恩来同志还站在岸上向同志们频频挥手，直到轮船远去。

武汉的形势更加危急了，身边的同志一直催促周恩来同志早一点离开武汉，但他依然那样泰然自若，谈笑风生，总是从容不迫地说：“再等一等。”为了防止万一，八路军办事处从汉口日本租界大石洋行搬到了武昌。二十四日深夜了，周恩来同志又要过江到汉口法租界检查最后一期报纸的出版情况。司机王友许同志把车开到江边，只觉得硝烟味扑鼻而来，原来是敌机扔下一批炸弹后刚刚溜走，还可听到汉口东北面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他想劝周恩来同志不要过江了，以免发生意外，但看到周恩来同志安详的神色，炯炯有神的目光，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一直看到报纸抢印完、散发走，并安排报馆几名工作人员动身南撤，他才离开。到二十五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武汉市，大街上行人绝迹。日寇的炮火已由城外向市区延伸，兵舰也从水上靠近了汉口。这时，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同志的危险处境捏着一把汗，但他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坚持前去武昌黄鹤楼查看他预先布置刷上的日文标语。当他看到“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坟墓”的特大标语，醒目地刷在城墙最高处，没有错字漏字时，显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当他和同志们告别武汉，一起驱车南下时，正是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到中午时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就踏进了武汉三镇。

我们警卫队的几个同志随罗炳辉、张元培、童小鹏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先到长沙等候周恩来同志。我们在长沙见到了正在这里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马上要去衡阳，临行前，他叮嘱我们说：“长沙局势不稳，‘周公’（同志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称）到长沙后，不要停留，请他立即去衡阳。”武汉失陷的消息传来，长沙城里城外一片混乱，警报一天叫无数次。前方下来的部队川流不息。国民党湖南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束手无策。市民见到军人就问：“长沙能守得住吗？”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回答：“那谁知道，守得住，守不住，是上头的事儿。”

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后，先到了湖北嘉鱼县燕子窝。原来，从武汉开往重庆的“新升隆”号驶至嘉鱼时，遭到日寇飞机轰炸，造成很大伤亡。周恩来同志到后，对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作了妥善处理，对其余同志重新作了安排。尔后周恩来同志又到湖北的咸宁、浦圻和湖南临湘等地视察了国民党部队，对前线将士表示慰问。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同志乘坐他的“雪佛兰”小汽车来到长沙市簸子街八路军办事处。首长安全到来，我们非常高兴，纷纷围上去迎接他。一到，司机王友许同志就给同志们讲述了撤出武汉的惊险情景，大家听了一片啧啧声，个个惊叹不已。周恩来同志面容清瘦，本来就长的胡须似乎又长了许多，但两道浓眉下的目光仍然那样锐利有神。他微笑着向同志们问长问短：“你们安全吗？碰到飞机轰炸没有？”张元培等同志急忙向周恩来同志转达叶剑英同志的嘱托说：“叶剑英同志请你今天就去衡阳。”我们大家也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催起来。“不，今天不走，我要住下

来。”他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我们只好退一步地请首长好好休息休息，工作第二天再谈。可他哪肯休息呀，随便洗了一把脸，喝了两口水，连饭也没有吃，就去视察长沙市的几条主要街道，检查抗战物资转运情况，看望尚在长沙的文化界人士。晚上找办事处的同志谈工作。接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知名人士。他精辟地分析形势，苦口婆心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为了工作需要，周恩来同志总是让我们多了解情况。因此，他谈情况，讲形势时，工作人员只要有空都在一旁听着。我们这些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同志，都为他那辛勤工作的精神所感染，总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

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得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部分同志对撤出长沙还有些踌躇。他把同志们找来亲自作了动员说服工作。他对青年记协的同志们说：“日寇占领武汉后，战略和策略可能要改变，内外形势会起变化，现在长沙太乱，张治中将军难以控制局面。克农同志已到桂林，你们还是到那里去工作为好。”对“周公”，不论党内还是党外同志，都是十分信赖的。听了他的话，当天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同志都离开了长沙。这一天的晚上，周恩来同志终于休息了。由于连日的奔波，他的司机也够辛苦的。为了第二天旅程安全，我和张元培同志替换司机看车，我们就睡在放在门楼下的汽车里头。大约在十一点的时候，篾子街起了冲天大火。门楼上烧着的木板掉到汽车顶上，把我们砸醒了。起来一看，火光染红了半边天，黑烟滚滚，气浪逼人，近处见两个国民党士兵还在将一桶桶油往火上泼，远处是市民的叫骂声、呼救声，乱成一团。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我们赶紧把周恩来同志叫醒，由邱南章、张元培等

同志护送他沿湘江出南门。周恩来同志对日寇还远在千里，国民党政府就点起一场无名大火，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焦土抗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出席衡山南岳军事会议后到了衡阳。他立即召集全体办事处干部、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任务，安排工作。周恩来同志身着八路军军服，腰间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身材魁伟，眉清目秀，兼有学者风度和军人气质。他将双手操在背后，来回地慢踱步子。分析了一番形势之后，站立在我们面前，先用和锐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然后把那浓浓的双眉稍稍一举，说：“日寇占领武汉之后，兵力转向扫荡其后方，正面战场暂停进攻，同时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战略和策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目前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和做好群众工作。”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精辟分析，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办事处的同志，一部分去衡山做南岳游击训练班的工作。游击训练班是我党和国民党合作举办的，每期三个月，学员四百名，对象都是国民党营、团军官。国民党方面派汤恩伯任教育长，副教育长是叶剑英同志。办事处的干部李涛、边章五、谢子真、吴奚如、涂正坤等同志均担任教官，授课内容有游击战、持久战、运动战等。其余同志组成衡阳交通站，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南岳游击训练班的物资保障；二是转送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三是接受并转运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八路军、新四军捐献的各类物品。

周恩来同志将我们的工作安排妥当后，便全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他主要是忙于接见《青年日报》、《文汇报》、《中

央日报》等各报记者。他着重回答了对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怎么看、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以及其他为全国军民所瞩目和关心的大问题。周恩来同志指出：从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这一阶段，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就是从战略上击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战而胜中国的企图，使其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坑。不要以为日军占领了几个大城市，就会象画几何图形一样，可以连点成线，进而发展为面。相反，日寇兵力不够，士气不足，交通不便，他们被我广大地区、广大军民这个“面”所包围。周恩来同志在分析了敌我双方政治、军事、经济、人心向背诸条件后，斩钉截铁地说：“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最后失败是属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特别指出当时国民党方面存在的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呼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他说：我们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发展包围敌人的“面”，使全面抗战在持久战中见效。周恩来同志殷切地希望记者们去各友军、去前线，到那里去采访，把抗战将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报道出去，鼓舞人民，引导人民支援抗战，争取第二阶段新的伟大胜利。对周恩来同志的谈话，除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记者外，都受到巨大教育和鼓舞。周恩来同志用自己耿耿丹心点燃了中原、华南广大地区敌后抗战的连绵烽火。

周恩来同志对同志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可对自己的安全、生活却毫不放在心上。那时，虽然表面上是国共合作抗日，暗地里，国民党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反共反人民。周恩来同志每到一地，他的“公馆”周围都有特务据点，对周恩来同志的行踪和来访人士进行监视和盯梢，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样复杂险恶的环

境下，机智勇敢，四处奔忙。十一月底，周恩来同志在南岳国民党中央开完会准备返衡阳，他的“雪佛兰”小汽车突然被盗。我们知道是狗特务干的勾当，非常气愤。领导派我到衡阳宪兵队，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责成他们查找。他们慑服于周恩来同志的崇高威望，只好乖乖地把小汽车送回给我们。

周恩来同志“安步当车，晚食当肉”，不要一点特殊照顾。在衡阳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住在常胜路七十三号禹生公寓，八路军办事处设在衡阳冯家祭场，周恩来同志每天步行到办事处去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天，他去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不久，我和张元培同志专程到江西安福接他。我们冒着瓢泼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一天，晚上才回到衡阳廖家湾八路军交通站。周恩来同志一下车就先去找炊事员刘彪同志，刘彪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衡阳，是我们办事处的老炊事员。他看到周恩来同志那样劳累，饮食太差，很心痛，有时做点面条，里面放两个鸡蛋，周恩来同志虽则领情吃下去了，可他还是要责备刘彪同志。这次回来又是怕刘彪来个突然袭击，所以事先去打个招呼，他对刘彪同志亲切和蔼地说：“不要油大的，做点素菜，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这一次他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谈工作，又是三天三夜没休息。每天晚上的夜宵，我们得先问问周恩来同志，他每一次都这样告诉我们：“做点豆子稀饭就行了。”我们坚决照此办理，一盆儿豆子稀饭，外加一碟子或酸或甜的小菜儿。

忆往昔，四十多年的历史过去了，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那为祖国、为民族，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的赤胆忠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忘我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

我们。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象他那样工作和生活，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尉国敏 史春保整理)

难忘的教诲

周钦岳

一九三八年的春间，我因《新蜀报》社务去汉口。其时蒋介石畏敌如虎，节节败退，日寇正向武汉进逼，形势极为险恶。我探知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地址，秘密往谒周恩来同志。他身着戎装，英姿焕发，立即出见，热情握手，无半字寒暄，就给予指示：“你来得正好！前方军事不利，武汉难保，《新华日报》决定迁重庆出版，你是重庆本地人，又办《新蜀报》，要全力支持……。”他那爽直、谦逊、热情的作风，使我惊悚而喜，断然回答：“一定照办！”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嘱咐。我热切地对他说，国民党反动派长时期来恶毒攻击、诬蔑共产党如何如何，您是共产党的杰出的代表，随时广泛地接触社会人士和群众，要他们亲眼看看共产党人的风采和英雄气派，大有作用。我另特别介绍胡子昂同志往见，他欣然欢迎。我们立谈了一、二十分钟，紧紧握手告别。

在归途中，我一直心潮澎湃。四十多年来，此种意境，时时回荡于脑海中，日子愈久，愈益生新发芽而铭刻肺腑，指我前路！

一、二日后，周恩来同志亲笔手条介绍汉口办事处周怡同志来谈，继又介绍《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来谈，均在警报灯

火管制的黑夜中，都是为了商谈《新华日报》将迁重庆的事。周恩来同志对党的工作如此极端负责、周密细致的特殊作风，我受到深深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冬间，周恩来同志冒长沙大火的惊险，辗转劳顿来到重庆，我为周恩来同志、董老（必武）、叶帅（剑英）、邓颖超同志和周怡、潘梓年同志等来到重庆，代表《新蜀报》设宴招待，表示敬意。为扩大党对新闻的联系，特邀请了《新民报》社长陈铭德、主笔罗永烈参加作陪（该报从南京迁来不久）。这一直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

自此以后，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更加横行无忌，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及周恩来同志的行动，均受到特务匪徒的严密监视，《新蜀报》也遭到种种压迫、歧视，《新华日报》的处境更无论了。我自己连去郭老（沫若）寓所访谈，都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警告。为了保持内在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就不见面，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以及《新华日报》编辑部等，我都不去，只同潘梓年、熊瑾玎、吴克坚、章汉夫、石西民等同志在新闻界活动中碰面时暗示意向，中间曲折甚多，不详述了。“两新”相距密迩，业务联系，概由业务部门去办。但有时国民党中央宣部喽罗仍造种种借口加以质问，横蛮无耻已极。

国民党反动派从它的中宣部到它的新闻检查机构，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无休止地打击《新蜀报》，时而由部长叶楚伧出面要派人打进来加以控制，时而由部长张道藩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以至在“青木关”（特务卡子）要扣留我。这帮家伙贼心不死，于皖南事变后的一九四三年，竟唆使潜伏在我印刷厂内的特务分子，伺隙放火，全毁《新蜀报》为避免轰炸临时迁建在化龙

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在《新蜀报》当时万分困难情景之下，真是一场大灾难！白光荣厂长慑于法西斯淫威，不敢直说，直到解放后，我在上海往访《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时，白任该报印刷厂厂长，才告以具体情况。

我愤怒已极，于视察现场后，深夜召集全体职工谈话，决心在一个月内全部恢复，继续完整出版（临时请友报代印简版）。经全社职工的艰辛奋斗和有关金融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恢复工作进展甚快，但到最后煞尾阶段差四、五千元，濒临绝境，万分无奈，迫使我商诸潘梓年同志，请求恩来同志的支援。不料，次日即由梓年携来现钞若干（装在跑警报的袋里，当时大都人人如此），并允另以高价买我社闲置的平版机一部（《新蜀报》已改用卷筒机），得以解除急困，真是如天之幸！

“皖南事变”发生一周之后，各报纷纷表态，攻击共产党，《新蜀报》迟无言论表态，罪恶渊薮的“侍从室”两次严令中宣部派新闻处长彭某来社强迫发表社论。我以事关重大，不敢轻率发言，贻误大局，究竟要打日寇，或打共产党，中宣部有明确指示，我就照办。侍从室继再三威逼，我知其毒意所在，始商诸主笔以“相忍为国”为题，写三百字小评，不提事变，刊在不显眼的地位，勉强了事。但他们怀恨更深，终至有最后指使特务夺占《新蜀报》之暴行（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前夕），扼杀其光荣的生命。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到京，立即简报周恩来同志我住的招待所。两三日后，突有副官来告，“请你稍待，聂总司令将来访你。”不久，聂派车来接我到一小餐馆欢聚，同时晤及杨尚昆同志。

不久，在北京饭店一个厅里，举行一次周恩来同志特别报告

会。董老和各民主党派到京的诸老及同志们参加，约百余人，由林老（伯渠）主持。周恩来同志对国内时局的重要报告，突出提到对未解放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政治上各方面的初步安排，历时一小时以上，大家听了无比兴奋。周恩来同志站在厅的中心地毯上报告，我们半圆形地围坐几层。我在头排的尾上，正面对着周恩来同志，相距很近，周恩来同志似已看到了我，报告刚一完毕，他便快步向我走来，紧紧握手，并坐下低声告我：“我忙，要荣臻来看你……”我即说：“见到了！”

会后，为了让大家欢快一下，安排了一个简朴的酒会和舞会，有的伴周恩来同志跳舞，有的同周恩来同志碰杯，我在一边走走看看，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忽然周恩来同志看见我了，高声招手叫我，我急趋前，把着满盅啤酒，相互高兴地碰杯，我说：“祝你为国辛劳！”相互一饮而尽。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设宴招待新从外地来京参加会议的同志约二十多人。在入席之前，周恩来同志赶来同大家晤面，我见他逐一和同志们握手的同时，并逐一亲切地告以他的回忆，清晰无误，无不为之惊异动容。

九月中我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组织分配我回四川工作，于十月下旬离京，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成行之日，周恩来同志曾派人邀我谈话，我因准备行装外出，未能前去。我们一行四人（孙志远、任白戈、天宝和我）搭乘程颂老（潜）专车去汉口，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赶来为程老送行。周恩来同志见我在，拉我一边，简切指示：“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新民报》，我和小平同志谈了，他在路上会找你谈的。”到重庆后，我去见小平同

志，他指示说：“适得北京来电，《大公报》总社决定将重庆版交出来。你去同‘重庆大公’负责人进行商谈，拟将《新蜀报》、《大公报》合并，另改报名，人事器材等由组织妥善处理。”后以协议未成作罢。

谁知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同志，一九七六年以后，我们敬爱的总理就离开我们而长逝了！历历情景，竟成了我最后的遗念！

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

于树德

一九七九年九、十月间，五届政协常委于树德同志在病中回忆了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先后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现在，于树德同志已经去世，为了纪念他，我们特发表这一段回忆。

——编者

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去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那时候，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以天津“新中学会”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当时人们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穷党”，听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变化很大，我很想知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希望借此机会能到莫斯科去看一看。

当时我是天津法政学校的教员。是李大钊同志通知我去参加这次会的，和我一道走的还有唐山的工人邓培。我们从天津乘火车先到了沈阳，住在朋友开的一个旅馆里，然后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那时天气非常冷，在满洲里有专门接待我们的人，用爬犁把我们拉到俄国境内一个叫十八里站的地方。从满洲里到十八

里站是中俄两国不驻兵的中间地带，只有苏联警察看守，在那里停着一列火车，等参加大会的代表到齐后，列车才开走。

在十八里站候车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破旧的车厢里。有一天，张国焘把我找去。他是共产党的代表，住的地方比较讲究，是客车的包厢，里面有沙发、写字台、软床，显得很阔气。当时他还是学生，我是教书的，我觉得学生应该尊敬先生，因此走进去一看就有气。他张口就问我信仰什么主义？我一听更烦了，心想为什么一定要问我信什么主义呢？就故意回答他说：我信无政府主义。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张国焘认为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会议，他曲解了列宁关于这是一次民族会议的本意，他想阻止我去参加这次大会，对我不信任。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从国内去的有十七、八个人，还有一部分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人。我能记起来的代表有：唐山的邓培，山东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还有一个姓王的，后来当了特务，名字记不起来了；安徽的有几个人，名字记不起了；广东的有两个工人；湖南的有王光辉；无政府主义者有黄凌霜，还有黄璧魂，是个小脚，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孙中山曾发给张秋白一个证书，但他最初不暴露身份，而是以记者的面目出现。还有贺衷寒、俞秀松、瞿秋白等。瞿秋白当时在莫斯科，他一方面负责接待我们，一方面给代表团做翻译。

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日本、朝鲜、蒙古等国的代表，南洋只去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代表。

在会议进行讨论时，我就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史》这本书中讲的一段庚子赔款的历

史，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会后，听别人反映，讲得还不错。

会议期间，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张国焘。但他没有将列宁接见他的情况告诉代表们。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我们还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到车站把半截劈柴码起来，这活叫码柈子。那时火车不是烧煤，而是烧木柴，做饭、取暖都是烧木柴。

会议给代表们准备了很好的宿舍。当时苏联经济十分困难，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的居民每人每天配给一些又酸又粗的黑面包。但是优待代表，给我们吃一半白面包一半黑面包。张国焘提议把白面包捐给儿童们吃，大家都支持他的提议，把白面包拿去送给儿童去吃。黑面包是很难吃的，和中国的糠面差不多。

开完大回国时天气更冷了。代表们八人编成一个组，分三批回国。朝鲜、日本和蒙古的代表也都从满洲里这段路回国。我从莫斯科回来时，在那里买了一些印刷的油画。当时莫斯科市场上生活日用品很少，这种印画很多又很便宜。山东代表王乐平去的时候带了一些茧绸，卖了不少钱，回来时，他还买了些皮货。听说从苏联的十八里站到中国的满洲里之间土匪很多，经常发生抢劫。我们这一组没遇见土匪，在我们后面的山东代表却遇上了，王乐平带的东西、钱都被抢光了，到了满洲里，连路费都没有了。我给了他们路费，才到了天津。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北京经李大钊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除了在天津法政学校任教，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女一中等学校兼课，每星期都要往

返于天津北京之间。当时杭州法政学校也需要教员，马叙伦托李大钊给物色教员，结果李大钊把我介绍去了，我于一九二二年暑假到杭州去教书。

一九二三年六月，李大钊在北京写信通知我去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当时没有路费，就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

叫我去参加“三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老同盟会员，接触国民党方便一些（李锡九、江注源、吴玉章等也是这种情况），联系国共合作等具体问题，孙中山容易接受。

杭州的党务工作最初是沈玄庐负责。“三大”以前，在上海的江浙区委负责人徐行之（即徐梅坤）经常到杭州活动。杭州出席“三大”的代表有两个人，我和金佛庄，他是个军人，后来在黄埔军校当了教员和队长。我和金佛庄先到上海，然后一道乘船经香港再到广州。

我对“三大”的印象不深了，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和几个他手下的广东党员刘尔崧、阮啸仙等，还有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刘仁静、金佛庄、徐梅坤、李大钊等人，其他的人记不起来了。

在我的印象里，“三大”开得很急促，因为马上就要同国民党进行合作。会议的内容就是决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最后决定不是以全党的名义加入国民党，而是以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后来一部分人参加国民党，另一些人不参加，如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没有参加国民党，以表示共产党是独立的政治组织。

“三大”以后，我回到杭州继续教书，到一九二四年暑假又返回北京。

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指派我为直隶省代表去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改组国民党的纲领、文件都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孙中山最后定的。其中有很多文稿是鲍罗廷起草的，他用俄文写。由黄平和张太雷给翻译过来，交给汪精卫看。

我在广州时，经常到鲍罗廷那里去开会。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老同盟会员中真正赞成的只有廖仲恺等少数人。汪精卫表面上赞成，但也不是真心实意。戴季陶懂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时还是赞成的。不懂得中国话的华侨陈友仁也赞成改组。反对改组最激烈的有胡汉民、张继、谢持、邹鲁。冯自由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当场被开除了。黄季陆有学问，他也反对过改组。那时，老同盟会员几乎都不赞成孙中山那一套，三民主义有的连看都不看。总而言之，国民党之所以改组还是孙中山的坚持和廖仲恺的帮助。

国民党“一大”后，我以个人资格加入了国民党，算是跨党分子，被派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执行部主任是李大钊，他挂个名，实际工作，由我们出面去做。具体分工我是青年部长，党内还有韩麟符等。当时共产党在国民党里占优势。路友于、丁惟汾当时都是改组派，即国民党左派。改组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的工作上，共产党的主张多用国民党的名义发出去，有时也单独给党内发指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身份有暗

的如林伯渠等，有明的如李大钊等。国民党对我们疑神疑鬼，把一些国民党左派也视为共产党，如路友于就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其实他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和李大钊一起牺牲了。

我记得党内还发过一个通知，内容是说陈独秀不参加国民党，并通知了国民党。这表明不是全党加入国民党，而是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并不受国民党的约束。这时还多次发表宣言，表明对时局的主张，也是要显示共产党是独立的。

国民党改组后，我们发展一些人先加入共产党，再加入国民党，也是跨党。不少工人表示愿意先加入共产党再加入国民党，有些老同盟会员也是这样，如李锡九、江注源等。

我在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工作时，代替李大钊进行对外活动。我的主要工作是搞青年活动，到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前叫“首都革命”，总指挥是朱家骅教授，那时他还不是国民党，但他代表右派观点，我们拉朱出来活动，用他作招牌，可以争取一部分右派学生。国民党真右派是傅汝霖。

“三一八”这次示威请愿运动本来决定由我作指挥，但我因事去天津，改由李大钊同志出面指挥。不久，我在天津被张作霖部下李景林的便衣队逮捕，后疏通关系获释。第二天，我便离开天津乘船去广州，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

(姜华宣 肖甡整理)

在国民党狱中

张 明 远

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简称白区）的我党的无数优秀儿女，遭到敌人公开和秘密的屠杀，壮烈牺牲！更多的同志被长期关押。敌人妄图以此来维持它的统治。然而，事实与敌人的愿望相反，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也没有被敌人的精神摧残所征服。他们把监狱和反省院当作生死搏斗的战场，开辟了白区地下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一九二八年下年至一九三二年，我和许多同志先后被关押在天津的第三监狱和北平的第一监狱，为反对敌人虐待、残害政治犯，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三次绝食斗争。既赢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也曾遭到严重挫折。回忆这段战斗生活，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当时我党在白区工作的一个侧面。现根据回忆，将它写出来，以纪念在监狱中和出狱后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并期望对青年同志们有所教益，了解革命先烈们的战斗历程，学习他们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在天津第三监狱里的战斗

天津是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革命斗争中心城市之一，党的顺直省委（后改称河北省委）和北方局曾设在这里。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我党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进行了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艰苦的斗争中，很多革命先烈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一九二八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天津后，利用人民对旧军阀的痛恨和不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面目认识不清而尚有一定幻想的时机，实行比北洋军阀政府更加阴险、残酷的政策。它们一面打着“国民革命”的招牌欺骗蒙蔽群众，破坏我党同群众的关系及群众内部团结；一面实行白色恐怖、建立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破坏我党和革命组织，镇压我党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使我党的活动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加以当时我党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不断搞脱离群众的“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行动，以及叛徒告密、出卖，致使我党和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入狱。一九二九年五月间，我党的顺直省委遭到一次重大破坏，省委以下各级负责干部和一般党员二十多被捕。其经过是：曾任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去参加党的“六大”，于一九二九年由莫斯科回国后，同省委委员李德贵叛变了革命。为了保卫党组织的安全，省委秘书郭宗鉴同志根据省委决定，在法租界把王、李二人秘密处决。附近的巡警闻枪声赶到现场，听到王藻文尚微声呼叫郭宗鉴的名字才死去。法租界工部局随即发出认尸公告，被王藻文之妻张建生（与王同时叛变）认出，即带领敌人四处搜捕我党同志。与此同时，敌公安局特务队发现一可

疑信箱，逮捕了取信人省委交通陈涤云。陈在敌人酷刑下供出了他的住址和一些同志，致使彭真（当时名傅茂公）、郭宗鉴、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金城（狱中名金珍）、詹大权、叶毓文等省、市委负责人和其他党员二十多人陆续被捕。他们先被关在公安局，受到种种酷刑审讯逼供，敌人在捞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后，移交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这些同志被关进第三监狱。他们入狱后，除在法庭上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狱中向普通犯人进行革命宣传外，还带领狱中同志以各种形式同敌人展开“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五·一”前后，省委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布置在“五·一”劳动节，全市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号召工人总罢工。这次活动引起敌人恐慌，加强警戒、搜查，致使有些党团员陆续被捕。个别人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问而供出党的组织和同志，先后有数十人被捕。也是由军警机关侦察、刑讯，然后转到法院，关入第三监狱。其中有薄一波、乔国桢、刘仁、武竞天、刘文蔚、刘慎之、高克林、刘汉生、张孟旭等同志。我也是在这时被捕入狱的，从此同狱中的战友们一起，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此外，关押在这个监狱的，还有河北省一些市、县被捕的同志。

一、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春以前，政治犯与普通犯关押在一起，监狱对犯人采用许多刑罚和残酷手段，进行迫害、虐待和勒索。他们克扣囚粮，狱中伙食十分恶劣，每天两餐小米饭，犯人称它为三合米（发霉的小米、谷子、砂子的混合物），薄薄的一小片咸菜和只

有几片菜叶的菜汤。七、八个犯人挤住在仅能容纳四、五人的小牢房内，床铺容不下，只能睡在潮湿的地上。判刑在三年以上的都要戴上沉重的脚镣，对监狱的虐待表示不满和稍加反抗，便遭到随意打骂或给戴上手铐脚镣。每天上下午放风各一次，去大小便，其余时间只能在室内大小便，因而卫生条件极坏，牢房内充满臭气，生病的很多，几乎每天有人死去，其中与王文祥同时被捕的李辉、程秉义同志，就是在这样的虐待折磨下，入狱不久而牺牲的。监狱当局还特别利用普通犯人中的盗匪、凶杀等待处决的死刑犯和无期徒刑犯向其他犯人敲诈勒索。每个牢房内由这类人当“铺头”，他们在监狱当局庇护下，肆意欺压勒索其他犯人。犯人入狱后，必先向他们缴纳财物，交纳多的就可以睡在床上，否则只好睡在潮湿冰冷的地上。勒索的财物，“铺头”与监狱当局、看守等秘密分赃。在政治犯中有位左镇南同志是共青团干部，因没有钱，受尽了“铺头”的侮辱和虐待，以致身患重病。

“铺头”不许他睡床，而强令他昼夜卧在马桶旁边，当他病重失去反抗能力时，“铺头”把点燃的蜡烛放在他头上燃烧取乐，滚烫的蜡油不断向脸上流，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

彭真等同志抓住这一事件，经过秘密串连，发动政治犯揭露敌人的罪恶和监狱的黑暗，在狱外党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

首先，以合法斗争方式对监狱的黑暗残暴进行揭发控诉，同时通过各种关系登报揭露，成为当时的重要社会新闻，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与谴责，国民党有关当局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被迫将这个“铺头”由法院重新判处了死刑。狱中斗争获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

经过这次斗争胜利，敌人害怕政治犯揭露监狱的黑暗，煽动普通犯继续“闹事”，特修了一所新监，将政治犯集中关押在那里，同普通犯人隔离，生活待遇并没有多少改善。就在这次斗争之后，在政治犯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从此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狱中斗争。当时支部负责人为彭真（书记）、郭宗鉴、詹大权、叶毓文、卢福坦（卢出狱后任江苏省委书记时叛变）。

二、第一次绝食斗争

一九三〇年“五·一”以后，第三监狱中政治犯的突然增加，更有利于对敌开展斗争。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条件，进一步揭露敌人“杀人不见血”的罪行和虚伪的“人道”与“法治”，配合监狱外面的革命斗争，以党支部为核心，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除了组织尚未判定案的同志，利用法院审讯的机会，在囚车内沿途呼喊口号，散发手写的传单；在候审室和法庭上（有时有新闻记者或旁听者在场），对敌人的滥捕滥押滥用肉刑、无理起诉以及狱中的种种黑暗，据理依法进行揭露、控诉外，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恶劣待遇，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同监狱统治者的斗争方面。

当时的形势，全国革命正由低潮转向高潮，南方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发展很快；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已经爆发。天津是阎锡山统治的后方，在战争中他非常害怕后方不稳，加紧了对革命活动的镇压与防范。同时反对阎的其他政治派系的人也抓了一些，有些被称为军事犯（多是些为了升官发财，搞政治军事投机，组织杂牌军等活动的投机分子和社会渣滓），也有几个国民

党和黄色工会的小头头，先后有二十多人关在新监内。党支部根据当时形势和政治犯是生活在失去人身自由，被慢性折磨宰割环境中的特点，以及监狱当局同所标榜的“人道”、“法治”言行相背，内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等矛盾可以被我们所利用等情况，认为政治犯在狱中应该斗争，必须斗争，也能够进行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战胜敌人杀人不见血的监禁政策。但在监狱的特殊环境下，斗争目标和提出的要求，必须合情合理，经过依法据理斗争，基本上能取得胜利。为了不给敌人以镇压的借口，使斗争遭受失败，力求避免提出不切实际，超出敌人法律范围的过高要求和过“左”的口号与行动，在斗争策略上，必须善于利用敌之矛盾和弱点，实行合法与非法活动相结合，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狱内斗争与狱外支援相结合。拟定周密计划后，再采取全体政治犯集中行动，全面提出书面要求，推举代表交涉，在监狱当局查监时，包围他们，同他们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限期答复。在运用各种斗争方式无效时，则举行绝食。绝食是监狱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经过慎重研究讨论，做好充分准备，具备争取胜利的条件后，才能进行。否则，不能轻易采取这种方式。

党支部委员会根据大多数政治犯的迫切要求，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对第一次绝食斗争进行了以下的部署：

以支委和坚定可靠的党员骨干为核心，我们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秘密串连，征求意见和战斗动员，着重从必须斗争，斗争能够胜利和如何争取胜利等方面激发对敌人的仇恨，提高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以每个监房为战斗单位，由支委指定一名党员骨干负责本监房的工作。每个号甬（监房为十字形建筑，共四排，每排监房中间有一甬道，称为号甬，每个号甬两侧各有监房

三间，每间搭一通铺，可住四、五个人，四个号甬中间有一圆厅，设看守瞭望台）有一支部负责人或指定一名代表，具体领导本号甬各监房的工作和斗争，同支委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了现有支委被敌人隔离与支部失去联系时，新支委的候补人，使支部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坚持战斗。

集中大多数政治犯的要求，并拟定了“改善生活待遇”，“反对监狱虐待”，“我们有生存权利”等斗争口号。于五月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向监狱提出八条要求，要求尽快答复。八条要求是：（1）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增加蔬菜；（2）除去脚镣等刑具（当时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都戴脚镣，“犯狱规”的都戴手铐）；（3）白天开放监房门；（4）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病人生活待遇，增加西医、西药（当时只有一名中医）；（5）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报刊物；（6）增加家属探亲次数和延长会见时间（原来一月一次增为每周一次，每次由不超过三十分钟延长为至少一小时），遇有特殊情况，准许随时会见；（7）延长放风和运动时间；（8）发给被褥及日用必需品。

当时关在新监的政治犯，情况比较复杂，有已判刑的和不服判决在上诉中的约四、五十人；有尚未判决的所谓“共党嫌疑犯”，约五、六十人；军事犯和其他嫌疑犯约二、三十人；在以上一、二类犯人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少数是和党有联系的赤色群众。这两类人中大多数人的表现是好的，也有少数人因各种原因不同程度的情绪不高，对斗争不够积极，顾虑较多。个别的人被捕后，经不住敌人严刑拷问，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但也和其他同志一样被判刑；在同志们的责难、鄙视下有所愧悔，要求给出路，接受考验。第三类人，在外面因受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不

了解我们党，对我们持各种不同的错误态度与看法。经过一段狱中的共同生活，对他们进行争取、团结、教育工作，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党支部为了在绝食斗争中使全体政治犯（包括叛徒和第三类人）都能参加，行动一致，确定以表现好的党员和赤色群众为主力，指定专人负责做好一、二类人中表现较差的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叛徒和第三类人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解除他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并决定在斗争中必须遵守纪律，主要有：无论狱方采取什么手段，必须行动一致，不许单独复食；按事前规定的内容与要求依法进行说理斗争，不许超出规定范围，乱喊乱闹，砸门毁物等；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等，违者由他承担一切责任。同时也估计到绝食斗争开始后，在敌人威胁诱骗下，有些人违反纪律，单独复食，但只要我们的主力坚持到底，就能取得基本胜利。

为了保证绝食斗争的胜利，党支部将斗争的计划报告给省委（当时天津尚未成立市委，狱中党支部受省委直接领导）审批。由于我们绝食斗争开始的时间和绝食后的情况发展，难以事前预计，所以必须与省委保持密切联系。为此，规定了联系的两条渠道，一是省委指定一通信处，约定绝食的隐语密写，由支委通过同情我们的比较可靠的看守寄出，二是通过省委或狱中党支部选定的亲属或伪装为亲属的同志不时来探监，传递藏在不易发现的衣物中的密信，或以隐语交谈。为了及时让社会上知道，我们还准备绝食一开始，即以第三者名义直接给报馆投新闻稿和以全体政治犯名义发呼吁书（当时《大公报》有我党的同情者，《庸报》有一位记者是我党党员）。

以上部署，党支部分别向各号甬各监房的负责人和一部分党

员骨干作了交待，要他们掌握时机和分寸，向不同对象进行传达。同时要他们对绝食斗争也秘密地作好物质（主要是食盐、咸菜）上的准备，一旦绝食开始，只要静卧，多饮加盐的开水，就能维持体力消耗。准备绝食斗争之际，和我住在同一监房的魏振华同志（津浦铁路的工人党员干部，一九二九年省委遭大破坏时被捕，被判九年徒刑，不服判决，在上诉中）因受狱中恶劣待遇的折磨，身患重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不幸逝世。在他生病监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轮流去看望他，告诉他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准备进行绝食斗争，因他有病，叫他不要参加。他听了非常激动，表示绝食时一定通知他，坚决和同志们一起战斗。按照敌人法律的规定，魏振华是应当“保外就医”的，家属向监狱提出让魏振华到外医治的要求，我们采取各种方式向监狱交涉，督促监狱答复家属的要求。但是监狱方面多方刁难推托，声称保外就医需要报高等法院审批，经再三催促，监狱才把申请转到高等法院，就在此期间，魏振华同志不幸逝世了。这一事件引起政治犯很大震动，大家非常悲痛。党支部抓住这一事件，一方面向监狱提出抗议，要求允许我们为魏振华开追悼会和迅速答复八条要求；同时积极向全体政治犯开展工作，提出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忍受下去，象魏振华同志那样，被折磨而死；一是团结起来，为改善生存条件而斗争，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全体政治犯情绪很高，斗志旺盛。当狱方不准开追悼会，对八条要求一再推托、拒绝时，党支部立即动员全体政治犯绝食一餐，以表示对魏振华同志的哀悼，也是向监狱一次示威和绝食斗争的预演。拟用这一行动逼监狱答应部分要求，但狱方却毫不让步。于是，第一次绝食斗争，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开始了。

绝食是一场十分紧张激烈的生死搏斗。绝食一共进行了五天。第一天，敌人送来了早饭（每天早晚两顿饭），全体政治犯都一致不吃，同时对监狱看守们讲：“魏振华死了，大家很难过，吃不下饭去。如果生活不改善，我们的生命毫无保障，都会象魏振华一样被折磨而死。”“我们都是无罪的人，无理被关押，即便有的人被无理判刑，既然法律上没有判处死刑，就都有生存的权利，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宁可绝食而死。”要看守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监狱当局。狱方第一天对我们的绝食表面上伪装镇静，说你们不吃饭活该，但背地里却采取各种破坏行动，一方面把他们认为为首的分子和劝说可以复食的十多人关押到监狱的单人牢房，与新监的政治犯隔离起来，另一方面把已判刑的彭真、叶毓文、李运昌（狱中名李初学）、李光汉（狱中名王文祥）等二十多人转到天津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隔离的办法，将我们各个击破。同时，敌人还借军警的力量，对我们实行镇压。他们向天津的军警当局谎报说三监的政治犯在闹事，企图暴动，狱方正在处理，如平息不了，要求它们派兵前来镇压。下午送来晚饭大家仍坚持不吃，监狱方面态度仍很蛮横，恶毒地训斥说：你们提出吃大米白面的要求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一天，党支部的负责人均被分散隔离，预先指定的候补负责人和各号房的负责人，通过去厕所、打开水等机会，交换意见，告知各监房负责人，我们已按预定计划把绝食斗争的情况告诉了省委和家属，并向报馆发出新闻稿和呼吁书，很快会收到外面党组织和社会舆论的支援。要他们做好本监房的工作，坚定胜利信心，遵守纪律，保持镇静，按原计划坚持斗争。

第二天，是斗争最紧张最激烈的一天，也是对斗争的胜负最

关键的一天。当时蒋、阎、冯战争正打得很激烈。阎锡山在前面指挥作战，对他的后方治安非常担心，一再责成天津军警当局要确保安定。军警当局根据监狱的报告与要求，立即做了部署。于绝食的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派兵进入三监，在新监周围布满岗哨，新监内每个号角都有四、五个士兵，手持上刺刀弹上膛的步枪往返巡逻。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军警当局在狱中成立了临时军法处，准备在我们稍有“越轨行动”时，就以扰乱后方罪处决几个“为首分子”，妄图以血腥镇压破坏绝食斗争。他们来监狱后，提审了郭宗鉴同志，问他为什么绝食，并让他说服大家复食，对他威胁说，现在前方战争吃紧，不要扰乱后方，不然要以军法从事。据事后了解，敌人当时确曾把郭宗鉴同志做为镇压的对象。郭宗鉴同志依法据理地揭露和控诉监狱的种种黑暗，说我既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监狱采用种种办法克扣我们的伙食，折磨我们，使我们无法活下去，为了求生存，我们才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也是法律所允许的。法律并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不吃饭，不吃饭有罪。我们不吃饭不知犯了什么法，犯扰乱后方哪条罪？这些义正辞严的回答，使军法处的法官们无隙可乘，不得不把郭仍送回单身牢房。在新监的政治犯，面对敌人的威胁，一方面遵守事先定好的纪律，静坐抗议，高呼事先规定的口号：“反对监狱压迫”，“改善生活待遇”。同时向士兵做工作，说明我们无辜被捕，有的被无理判刑，在监狱中受到种种非人待遇，监狱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等等。经过宣传，有些士兵开始同情我们，他们说：“我们上当了，原来说你们要炸狱，派我们来弹压。”当时就下了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不久就撤走号角的巡逻兵。当天下午，前来镇

压的军警官员感到监狱夸大和谎报了情况，实行镇压的理由不足，社会舆论不容易欺骗，害怕为监狱承担屠杀政治犯的责任，最后把兵撤走了。监狱当局请兵求救、借刀杀人，妄图把我们的斗争镇压下去的阴谋破产了。由于我们团结战斗，行动一致，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集中打击监狱的弱点，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重大胜利。

绝食的第三天，监狱方面请兵镇压目的未能得逞，开始动摇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换了欺骗诱惑的手法，早餐送来大米粥，诱劝大家先吃饭，说其他条件好商量。对关押在单人牢房的犯人说：“别的犯人都吃饭了，你不吃饭太傻了，不要再受人利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极个别比较幼稚的人和十几个被隔离的军事犯上了敌人的当，开始复食了，但绝大多数仍然在坚持，并且正告敌人，不答复条件绝不复食。敌人拉拢欺骗的手法又遭到失败。我们看到这种形势，信心就更足了，大家暗暗地互相鼓励，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时外面已知道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省委于七月四日发出紧急通知，要各级党组织动员广大群众，援助我们的绝食斗争，组织家属到监狱要求看望自己的亲人，狱方不让见，家属就质问为什么不让见，犯人是否被杀害了，同狱方展开说理斗争。这天有的报纸也登出了三监政治犯绝食的消息，这对敌人是个很大的压力。斗争形势，向有利于我们方面发展。

第四天，有些新闻记者来到三监，要求访问新监的政治犯，开始监狱当局不同意，经过记者们一番交涉，监狱当局不敢得罪他们，被迫同记者来到新监，找了一部分人访问，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把这次绝食斗争的原因，魏振华的死，狱中恶劣的伙食和所受的种种非人待遇，监狱拒不答复，使我们的生命毫无保

障等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控诉。控诉时同志们心情沉痛，泣不成声，记者们听了很受感动，陪同记者的监狱负责人灰溜溜地一言不发。

绝食的第五天，报纸上发表了记者的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天津公安局长曾延毅（阎锡山的亲信）害怕事态扩大，影响治安，于下午带着随从人员，并有新闻记者跟随，来到新监，召集全体政治犯进行谈判。开始讲了一些装作同情我们，批评监狱当局处理不当的话，劝我们先吃饭，要求的条件慢慢商量。我们不等他说完，悲愤地揭露了狱中的黑暗，政治犯受到的非人的待遇，强调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如不改善生活条件，我们无法活下去。曾延毅听了我们的控诉后，就伪善地表示说：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除看报问题，因上级规定不准许，我不能答复外，其他各项，我认为都可以办，我就叫监狱去办理。同时他又恫吓说：“阎司令在前方很关心这件事，你们要先吃饭，如果再继续闹下去，会影响后方治安，这对你们很不利，那时我对你们也就无能为力了。”并表示愿拿出二百元钱，一半买些营养品给我们，一半给转到陆军监狱的人。曾延毅既假仁假义，又杀气腾腾。当时，我们既未被他的假仁假义所迷惑，也未因他的恫吓而退却。我们表示复食可以，但必须先把分散出去的政治犯都送回三监。曾延毅说，他们已送到陆军监狱，就不必回来了，他们在那也会得到同样的待遇。经过一番争执，我们提出派代表去陆军监狱看望他们，如果他们同意了就复食，否则，我们决不复食。最后，曾延毅同意派车把我们的代表送到陆军监狱看望彭真等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经彭真等同志研究，认为如坚持把他们转回三监做为复食条件，对我们不利，应结束绝食，准备新的

斗争。就这样，经过五天的生死搏斗，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当天晚上，监狱就给送来热汤面。郭宗鉴等被隔离的同志，也送回新监，战友们重新团聚，宛如久别重逢，互相慰问。复食的第一餐，同志们的心情特别激动，深感胜利来之不易，敌人虽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能否实现，还要靠同志们团结战斗，不要轻信敌人的诺言。第二天，曾延毅派人送来鸡蛋、白糖、奶粉等食品。对这些食品的分配，大家一致同意优先照顾有病和体弱的同志，然后按人平均分配。数量少，按人不敷分配的，分给各监狱自行调剂。当时有两位女同志，周铁忠（狱中名王又兰，同志们叫她铁大姐，乔国桢同志的爱人，已怀孕数月）和方王氏（是狱中的名字，省委组织部长李友才同志的爱人，带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被关在女监牢房，同我们隔绝，我们派徐彬如同志也给她们送去一部分。当时个别人被曾延毅的伪善手法所迷惑，认为绝食的胜利，是得到他的帮助，流露感激情绪。为了揭露曾的反动本质，我们发动大家讨论，帮助有错误认识的人（主要是军事犯）。经过讨论，大家更加认清了胜利的取得，是靠我们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坚决斗争和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援。此外，我们恰当地利用了阎锡山在前方打仗，害怕后方不稳的弱点和敌人党、政、军、警、法院、监狱等当权者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有利因素。曾延毅对我们的绝食斗争所以那样解决，决不是同情我们，发了“善心”，而是为了维护他的切身利益。我们的绝食斗争，既已在报上揭露，如不尽快解决，他怕引起社会上的“动乱”，危及阎锡山的统治；他怕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丢掉自己的官。为此，他不得不耍这个花招。等待战局稍稳，再向我们进攻。这样，他既可以防止社会“动乱”和欺骗舆

论，又可以打击异己（监狱的头头，不是阎派的），获得阎锡山的赞赏，名利双收。真是狡猾毒辣。至于他拿出的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所谓“公款”，他个人拿钱给我们买东西，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斗争胜利后，狱中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伙食吃细粮，增加了蔬菜，沉重的脚镣除掉了；每日早晨，监房门不关不锁，大家可以到院中做操、跑步，可以到各监房互相交谈、开会；家属探望次数增加了，时间延长了；对购买和外面送来的书刊的检查放宽了，报纸可以通过表现较好的看守秘密买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革命文艺作品等，都能看到。通过这次斗争，更加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使同志们认识到，在敌人的监狱里，只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才能打破敌人慢性杀人的政策，争得生存的条件。为了团结对敌，大家一致表示对那些在绝食斗争中表现不够坚定的人，不加歧视，享受同样的待遇，他们十分感动，表示今后一定和大家一起战斗。

三、第二次绝食斗争

第一次绝食斗争胜利后，党支部因彭真、叶毓文同志和卢福坦在陆军监狱，又组成新的支委会，及时总结了经验，分析和估计了形势。提出今后主要任务。

对形势估计，认为敌人是决不会甘心的，随时都有可能进行反攻，如对已经答应而尚未实现的条件，拖延不办，甚至将已实现了的全部取消，对我们再次分散关押等等，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做好回击敌人反攻的准备。

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团结，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做

好表现较差的政治犯和军事犯的工作。二是巩固胜利成果，八项要求中尚未实现的要争取全部实现。三是利用胜利后的有利环境，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文化水平低的，在学习革命基本知识的同时，开展文化学习。

以上各项工作，尚未来得及贯彻执行，果然不出所料，在复食后不久，敌人将尚未判刑和判刑较轻的以及刑期已满、将满的二十余人，先后转到公安局和新成立的临时自新院，内有从陆军监狱转到自新院的十几人。我和乔国桢、徐彬如、司福祥、杜远等同志被转到公安局，不久，将徐彬如、司福祥等同志又转到自新院。薄一波同志从三监的后监转到新监不久，也被送到自新院。九月十七日将我和乔国桢、祝子杰、杜远等七、八人又转回三监。

九月初，敌人调换了典狱长，给他以整治政治犯的权力。他上任伊始，就积极策划和寻找机会，准备对政治犯发动突然袭击。九月十六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同志，因患肺病，狱中医疗条件恶劣，得不到有效治疗，不幸惨死在狱中。张宗信同志的死，激起政治犯的极大愤慨！当日即推出代表，向监狱当局交涉。要求派代表向张宗信遗体吊唁，尽速实现已许诺的改善狱中医疗卫生条件。狱方认为时机已到，对我们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指责我们无理取闹，得寸进尺。宣布取消绝食斗争后的各项待遇。九月十七日早晨，各监房门不开锁，不许我们自由出入，重新给判重刑的同志戴上脚镣，早餐给送来绝食前的恶劣饭食。

我们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早有准备。党支部秘密通知了各监房负责人，动员全体政治犯自十七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回击敌人的反扑。口号是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

遇，保障我们的生存权利，不恢复上次绝食后的待遇决不复食。同时将狱中情况密报省委，请求支援。我们并不直接向报馆投新闻稿和呼吁书。绝食的第三天，报上登出我们第二次绝食的新闻。省委组织几位狱中同志的家属来探监，被监狱拒绝，受到家属质问谴责，同监狱进行了合法的斗争。监狱当局以为对我们严密封锁，隔绝同外面的联系，可以为所欲为。不料阴谋很快败露，陷于理屈词穷的被告地位，被迫于绝食第四天，打开上锁的监房门，监狱看守告诉我们说：“你们又胜利啦！”从此又恢复了二次绝食前的各项待遇。第二次绝食斗争胜利结束。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临时自新院的情况。这个机构是阎锡山的天津市政府于一九三〇年七月成立的。我党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通过打入市政府当科长的张友渔同志，当了该院副院长。他以合法身份，对这里的政治犯做了不少营救和保护工作。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待遇较好，在这里面可以自由活动。没有看守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院长是个老知识分子，信仰佛教，不赞成共产党，也不仇视。他想用佛教来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一个教员，是同情我党的。每天的生活是学习、讨论。主课是三民主义和佛学，但没人听他那一套。实际上是自由学习，没有人检查，图书室有书刊报纸，可以自由阅读。这里也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薄一波同志任书记，领导大家学习和对付自新院。他们在这里的时间不久，因阎锡山在战争中失利，天津将由东北军张学良接管。我党利用这一时机，通过张友渔同志的上层活动和积极营救，将他们全部释放，又都走上新的战斗岗位。临时自新院也随之撤销。

四、胜利后的战斗与学习

第二次绝食胜利后，狱中形势发生了对我更加有利的变化。监狱方面，经过两次失败，虽然决不甘心，但已不敢轻举妄动，而是请求和期待着上司，谋划出向我们进行更毒辣残忍的进攻计划。在新的进攻之前，对我们暂时采取守势来麻痹我们。党支部根据这一形势，主要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并对支部委员会作了调整，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情况是：

1. 巩固胜利成果，乘胜夺取新的胜利，随时准备回击敌人的进攻。

经过不断斗争，争得在新监范围内的活动自由和生活进一步改善。伙食，由我们排出食谱，交给管伙食的看守执行。病监的条件，有的同志住病监，家属或亲友可以到病监探视，自由交谈，无人监视。如郭宗鉴同志住病监时，他的同学唐明照、张希贤等就常来看他。冬季各号房有了炉火（过去没有，监房内常常结冰，生病的很多），给衣被单薄的发了棉衣被褥。开展了文娱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由懂得军事的同志当教练，以秫秸麻杆等作武器，学习基本动作、刺杀、队形训练、野外演习（在新监院内）等，并讲授一些军事课。利用新年和春节，演出自编的反映革命斗争的话剧、双簧、相声和以彩纸点缀戏装的京剧等。在生活上，一些同志得到家庭、亲友的接济时，对食品都是和同监房的难友或病弱的同志共享，金钱则用作狱中活动经费和购买报纸、革命书刊等，供大家阅读。为了不暴露党支部的组织及其活动，又能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斗争和管理好我们的生活，建立了全体政治犯代表会议的组织，由各监房推举号房代表一至二人组

成。代表会议内建立党组（当时称党团），党支部的各项决定，通过党组贯彻执行。为了应付监狱，不给他们以向我进攻的借口，代表会议的公开名称叫“号甬委员会”，如监狱查问，就说这是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维持监房秩序的组织。这个组织对于领导斗争，组织学习，管理生活，团结非党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一段生活中，除个别人以外，大家都深切感受到团结战斗，友爱互助，亲如手足，胜似手足，同甘共苦，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而失去身陷囹圄之苦。

此外，我们争取监狱看守的工作，也取得一定效果。有的同情我们，向我们诉苦，发牢骚，透露监狱内部一些情况，给我们传递信件、报纸，对我们的活动，只要不出新监大门，便不加干涉，也不向他的上司报告。使我们的活动，得到许多有利条件。

2. 加强学习。

斗争胜利后，取得良好的学习条件。新监附近有个容纳二十多人的图书室，里面虽然都是些国民党的宗教之类的书刊，无人看它，但可以自带书刊在这里学习。可以在这里由我们的人给学文化和学外文的人上课。多数同志是在监房内学习、讨论。我们自购和外面送来的革命书刊很多，由专人统一管理，组织阅读。按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个人意愿，分别编成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等班组，一人可以参加两个组。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和日本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根据个人阅读能力和爱好，选读其他书刊。文化水平低的，主要以听课与阅读通俗易懂的书刊相结合，学习革命的基本知识。

政治学习，主要是结合实际，学习我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等。每逢革命节日，都进行纪念学习。在一九三〇年冬，为了悼念死难烈士，在新监的圆厅，还开了一次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会场陈列自制的花圈，圆厅和各号甬挂满挽联，介绍了著名先烈的光辉业绩和英勇牺牲精神，号召大家向先烈学习，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为了辅导学习，还曾出了两期秘密刊物（手抄数份传阅）。以后考虑在狱中不适宜而停办。

在我们知道国民党实行反省自首政策后，及时进行了革命气节的学习讨论，明确认识了敌人的这一政策，是妄图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征服”被捕的共产党人、革命战士，使你丧失革命意志，叛变革命，甚至给敌人当特务。它比直接屠杀和判刑监禁的政策对革命的危害更大。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誓死保持革命气节，决不能按敌人的需要，写什么“反共”、“自首”之类的东西，丧失革命气节。

通过以上学习和监狱生活的锻炼，绝大多数同志在思想、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坚强的革命意志，旺盛的革命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坚强的组织观念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同志，后来有的牺牲在狱中。就我们所知，有郭宗鉴同志，他是在被转到北平陆军监狱后，因受恶劣待遇，又失去同组织和亲友的联系，身患肺病，得不到有效医治而牺牲的；张桑三、祝子杰同志（狱中名李青），是在被转到北平第一监狱进行绝食斗争失败后，惨遭监狱的摧残牺牲的。不少同志在服刑期满后，因拒绝履行敌人规定必须声明“反共”的出狱条件，被送反省院长期关押。如刘文蔚、刘慎之、赵子青、彭

德、刘尚之、祝子杰、杜远等同志即是。赵子青同志牺牲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祝子杰同志从第一监狱送到济南反省院后，终日叫骂反抗，反省院对之束手无策，不得不又送回第一监狱，后被第一监狱惨害。有更多的同志，出狱后成为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还有一些在被捕前同我党有联系的群众，进步也很明显，有的在狱中入了党或团。就是与我们毫无联系只因“共党”嫌疑被错捕入狱的普通群众，在我们教育影响下，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例如有一个琴师，在工人自己组织的票房（学京戏的场所）被捕，他一向不问政治，敌人审讯时，问他是不是 C·P（共产党），他回答说：“我知道，西皮是三眼一板，二簧是板起板落。”敌人骂他捣乱，被打了一顿。经过一段狱中生活，他开始懂得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谁好谁坏，出狱后，还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另有一个小偷，在火车上偷了一个柳条箱，内有宣传品，是省委李友才同志携带的。下车时被检查出来，被捕后判刑一年，在狱中受到教育，出狱后，也曾给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3. 建立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教育。

第二次绝食之前，由于狱中与外边的环境不同，党员不能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党支部对党员开始是保密的。支部工作，由支部委员分别与各监房的党员骨干单线联系。二次绝食胜利后，随着狱中环境不断改善，建立了党的小组和组织生活制度。经过支委审查，首先把被捕后和在狱中表现好的同志编入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然后再逐渐把表现差，经过帮助有好转的，或被捕后犯有错误，但不属于叛变自首性质，入狱后表现好，对错误亦有认识的，编入小组。支委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制度，都建立起来。共青团员也编了小组，由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刘慎之同志

领导团的活动。从此，党、团员开始了严格的组织生活。为了加深党、团员对党的认识，增强党的组织观念，由彭真、乔国桢等同志上党课，讲述党的性质、纲领、任务、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彭真同志是在一九三一年新年前后，从陆军监狱回来的。回来后，因他是监狱注意的首要人物，为了利于秘密工作和锻炼其他同志，他没有再担任支书和支委，但实际上他仍是支部的领导核心。同志们都很尊重他，支部的重要问题都是先征求他的意见才决定。

经过党的教育，在狱中还发展了几个新党员（有杜远），有几个团员，在狱中转为党员（有彭德、刘尚之）。还培养几个发展对象，在他们出狱时，把他们的情况介绍给省委。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支部学习了中央关于反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文件。提高了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认识。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搞分裂党的活动，组织第二中央——非常委员会，顺直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了第二省委，使省委和天津的党组织陷于分裂、混乱状态。第二省委还通知三监支部归它领导。支部委员会当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吸收小组长和一部分党员活动分子参加。一致不承认这个省委，认为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分裂党，危害革命的行为。要求他们立即解散第二省委，有不同意见，应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在原来的省委未被撤销之前，必须服从这个省委的领导。同时还向他们提出：三监的同志正在死亡线上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他们却把矛头对着领导我们的党中央和省委，应当感到惭愧和痛心。劝他们赶快悬崖勒马，改正错误。会议根据这些意见作出决议，报告给原来的省委，请省委将我们的意见转告非法的省委。这个报

告是密写的，由高林同志出狱时带出去的。省委同意并转发了我们的报告，还鼓励了我们。对党内这个事件，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使我们受到一次现实而深刻的教育。

4. 扩大斗争范围。

一是鼓动和指导普通犯的斗争。第三监狱中的普通犯，经常有一千多人。已判刑的绝大多数在三监的工厂做工。他们在我们的绝食斗争胜利影响下，对我们很羡慕和钦佩。有些人逐渐不安于现有的待遇，秘密通过给我们送水送饭的犯人，要求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为改善生活待遇而斗争。党支部积极支持了他们，并把鼓动和发动普通犯的斗争，列为支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指定专人同他们联系。要他们先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从一些容易实现的事情做起，如反对管理人员随意打骂处罚犯人，改善一些劳动条件等。要他们找带头人，组织犯人学会各种斗争方法，最后可用罢工来争取，一般不要搞绝食。他们在我们鼓动和指导下，同管理人员吵闹，违犯“狱规”，不服“管教”，消极怠工等事件逐渐增多，个别车间曾发生短时间停工（实际是罢工）事件。使监狱当局惶惶不安，加强了防范和管制。

二是根据党的宣传内容，利用尚未定案的同志去法院受审的机会，在囚车内沿途喊口号，散发手写的传单、标语等。此项工作搞了一段时间，后来敌人派警察跟车检收。喊口号因车厢封闭，行驶快，外面听不清，均未达到预期效果。相反，敌人在这些同志下车后，搜身检查。有一次在张孟旭同志身上搜出传单，法院据此又加判了四年徒刑（原已判刑八年）。孟旭同志对此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撤销了这个判决。此事发生后，经支部研究，认为此项工作，没有实际意义，未再进行。

在此期间，支部对新人狱的每个人的案情都做了了解。对于被捕后无问题的，即向他介绍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由略懂法律有合法斗争经验的同志，帮助他依法为自己辩护、驳斥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审判庭的判决书。当时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对政治犯的审理，有两个刑事审判庭，根据同一条法律（大多数案件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惩治反革命暂行条例》中“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判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条款），刑一庭量刑较轻，刑二庭偏重。对于判刑重（三年以上），上诉有可能胜诉的，则帮助他写上诉书或请得力的律师办理。判刑轻的，考虑上诉后审理时间长，有时超过判刑时间，一般不再上诉。经过这种合法斗争，有些同志取得胜利。

回忆这一期间狱中生活，党支部在顺直省委的领导和支援下，决定和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很突出的。但是在第二次绝食胜利后，在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失误，使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挫折。主要表现在以下问题上：

1、对敌斗争问题

对监狱斗争的目的，认识不够全面。强调斗争是为了求生存，反抗和揭露敌人慢性杀人的政策，配合社会上的革命斗争。当斗争胜利，生存条件有了改善以后，则应以保护既得利益，学习政治、理论武装思想为主。为此，对监狱的斗争，应适可而止。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敌人，过于暴露自己，当时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监狱当局怕“政治犯闹事”，上边追查责任丢掉饭碗等弱点，争取延长“休战”时间是有可能的。但当时未能这样做。没有结合狱中实际情况，检查纠正实际存在的“左”倾思想。在

“不断斗争”的指导思想下，对学习重视不够，抓的不紧。干了一些不必要的幼稚傻事，如在囚车中散发传单、喊口号等。对普通犯的斗争给以可能的帮助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在情况不明、联系困难、不具备条件情况下，把鼓动和发动他们的斗争作为我们的重要任务。有些同志热衷于搞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影响了学习。在斗争不断胜利和扩大，支部讨论监狱斗争发展前途时，个别同志竟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主张。支部对以上这些问题，虽然进行了纠正和批评，但未能从思想上认识这是“左”的思想影响而切实加以解决。

2、对胜利后的形势估计问题

对形势的估计，虽然也提出敌人不会甘心，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敌人的进攻，但在不断胜利的形势下，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对敌人各种可能的进攻，我们应如何准备和对付，没有认真的研究，认为敌人经过两次失败，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动进攻，也不过仍用前两次对付绝食所用的那些办法。因此，对于一些新的情况，如监狱挑拨军事犯同我们的关系（一九三一年新年前后，将大部分军事犯移出新监后，利用他们在报上对我们造谣诬蔑），利诱政治犯中个别表现不好的分子探听我们内部情况；新监的政治犯出狱的比进来的多；敌人正在周密部署，准备向我们动手等等，我们却失掉警惕，未做防备。

3、关于政治犯的内部团结问题

新监狱的政治犯自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后，有进有出，经常在一百人左右。这些人大多数的表现是好的。有少数表现差的，在第二次绝食斗争前，经过我们争取团结教育，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从而能团结一致取得斗争胜利。二次绝食胜利后，对于这部

分人的争取团结教育，逐渐放松。对他们一些落后言行，不是耐心帮助教育，而是受到一些同志的讽刺歧视，甚至不适当的批判。党员内部个别同志“左”的思想作风比较突出，不能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甚至把个别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托派”，加以敌视。这些情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团结。

一九三一年五月，敌人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二十一日（据彭德同志记忆为五月八日）向我们发动了突然进攻。将我们三十人分别转移到北平第一监狱、北平第二监狱。另有一部分转到济南反省院。将我们转移后，第三监狱对留在新监的政治犯立即取消绝食胜利后的待遇。转到北平第一、第二监狱的，也受到各种恶劣的待遇。为了反抗敌人的进攻，留在三监的和转到北平的政治犯，同时进行了第三次绝食斗争。转到济南的情况不明。

这次斗争，留在第三监狱的政治犯，由于得到外面的支援，报纸又登出绝食消息，敌人害怕拖延下去，对它更加不利，不得不又恢复绝食前的待遇。转到北平第一、二监狱的绝食斗争，则在没有准备，敌人严密封锁，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仓促应战，遭受严重挫折。

第三监狱当局在这次进攻又遭到失败后，对新监的政治犯采取了只出不进的办法，使新监的政治犯人数逐渐减少。对新入狱的政治犯，则关在别的牢房内与新监严格隔离。他们也不断地进行了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新监的政治犯根据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形势，曾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出狱的要求，并由郭宗鉴同志起草了意见书，大意是：“民

本无罪，只因政治关系入狱，现国将危亡，救国人人有责，请以政治关系，将民等释放出狱”。当时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不可能接受政治犯出狱的要求，同志们没有再采取其它斗争行动。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第三监狱借口上级削减经费，取消对政治犯的“优待”，又恢复了绝食斗争胜利前的恶劣待遇，并将刑期将满的杨恒安、孙人卫、周黎杨、张大中、鞠少亭等转到济南反省院。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当即发动第四次绝食斗争进行反抗。经过四天的斗争，在南开中学进步师生和社会舆论支援下，又取得胜利，恢复了原来的待遇。此时新监的政治犯仅有二十多人，以后将郭宗鉴转到北平陆军监狱，在狱中牺牲，其他刑满的，经过合法斗争，陆续出狱。这次绝食斗争胜利后的待遇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六年同志们全部出狱。

战斗在北平第一监狱

一九三一年五月，敌人对第三监狱政治犯的大分散，除留下的四、五十人外，转到北平第一监狱的有金城、张桑三、武竞天、赵子青、赵玉祥、张玉、祝子杰、杜远、彭德、刘尚之、陈云祥、李泽、孟庆章、阎怀聘和我，共十五人。转到北平第二监狱的有彭真、田士勋、刘秀峰、李子明、刘文蔚、刘慎之、刘庆瑞、张炳文、张凤歧等十五人，转移的这天，监狱通知我们后，要我们收拾东西，立即出发。当时支委已来不及开会，简单向留下的韩义同志交待，原支委委员已全部转移，要他转告郭宗鉴同志负责组成新支委会（郭在病监不能去看他），迅速将我们的情况报告给省委，并约定这次分散后，如监狱取消现有待遇，即举行绝食斗争，我们被转移的也这样做。我们去北平的到天津北站

后，利用候车时间，由彭真和支委的同志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形势和到北平后的对策。认为这次是敌人经过周密计划，我们是仓促应战，形势对我们不利。如北平第一、二监狱对我们的待遇，与天津三监差不多，就不进行绝食，要先熟悉情况，加强内部团结和尽快打通同外边党组织的联系。如果取消三监那样的待遇，就进行绝食，争取实现和三监同等待遇。估计到这次绝食困难大、时间可能长，斗争将比过去更加残酷，要求大家紧密团结、坚决斗争，争取胜利。会毕立即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和动员。

我们被转移到第一监狱后，逐人办理各项入狱手续，随即把每人带来的食品、书籍、衣物等全部扣留。发给一身囚衣，关在单身牢房。从此，我们之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联系。晚饭敌人送来的是窝窝头、菜汤。对此，我们向看守提出质问，并要求会见监狱负责人，看守不予理睬。于是，按预定计划，人自为战，开始了第三次绝食斗争。转到第二监狱的同志，也同样进行了绝食斗争。

我们在一监的绝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不仅同外面失去联系，我们相互间也被严格隔离，断绝消息。绝食五天以后，在敌人诱骗和强制下，有的人陆续复食，我和彭德、武竞天、祝子杰等同志坚持了八天。最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敌人各个击破，以失败结束。在绝食期间，监狱施展了种种伎俩。开始对我们不加理睬，对我们的抗议和质问，以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的命令来搪塞。说什么，“我们是按上级的命令办事，司法行政部要我们对你们严加管教。你们的要求，都违反上级规定，我们无权答应。”三天以后，派医生检查身体，把我用担架送到病监单

人监房隔离。接着送来糖水、牛奶、鸡蛋，诱骗劝食。说某某已经复食，他叫转告你们不要再坚持了。遭到拒绝后，竟采取灌肠的办法，从肛门灌牛奶。灌后，我即将它排泄出去以示反抗。监狱一个科长在劝诱彭德同志进食无效后，竟叫看守撬开彭的嘴，强灌牛奶冲鸡蛋，彭德同志愤怒的向这个科长喷去，把科长的新衫弄脏，气得他无可奈何。绝食期间尽管多次抗议监狱对我的惨无人道，提出了不住单身监房，发给纸笔给家属写信，要求允许我们十五人会面才能复食，但监狱始终强硬地加以拒绝，表现有恃无恐，毫不让步，以“模范监狱”来煊示。所谓“模范”，除监房建筑比三监稍好外，主要是在折磨、“改造”犯人的方法上，一般不用野蛮、打骂，而是有一套比三监更毒辣，更残忍，用软刀子杀人的手段。典狱长是个混入美术界，伪装斯文，结交一些社会名流的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直接管犯人的马科长，外号叫马阎王。为了对付我们，费尽了心机。在我们绝食失败后，对我们的隔离、封锁更加严格，怕我们买通看守，严格挑选他们认为可靠的看管我们，即此，还经常更换。规定他们不得和我们交谈，对我们的言行每天要向看守长汇报。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洗澡到病监的单人浴盆轮流去洗，每天放风二次，也是单人轮流活动，互相见不到。监房内不许有纸笔，每天到监房搜查，不允许家属接见，给外边写信须经批准后，由看守监视写，发出的信和来信受到严格检查，并经常被扣留。寄来的钱，不许个人保存。看病由医生到监房或者看守值班室，不许同医生谈与病无关的话。从监狱图书馆借书，要由看守长审查，多方限制，经常无书可看，能看到的多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书。伙食一天两顿窝窝头，由于营养不良，不少人患肠胃病和其他慢性病。更毒辣的是施行精神折

磨。在日常生活中（如看病、写信、买书、借书、买东西等等）多方刁难、刺激，妄图使你的精神陷于忿愤、烦躁、抑郁、悲观甚至失常的状态。往往借口触犯“狱规”，给以关禁闭和其他处罚。禁闭室黑暗潮湿、不通风，仅容一人，不能站、卧，无盖的马桶放在室内，臭气熏人，有时还给戴上手铐。被关一次，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敌人就是用这些办法，妄图使我们与世隔绝，变成有耳无从听，有眼无可视，有口无处语的聋哑盲人。即使不死，出狱后也成为身心俱残对社会无用的人。例如“九·一八”事变，我是在七个月以后，从一个普通偷偷投入的纸卷上才知道的。我在一监被关一年半，说的话，几乎没有在第三监狱一天说的多。狱中搞得我体弱多病，出狱后数年才恢复健康。其他同志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所受敌人的摧残是一样的。

尽管敌人费尽心机，实行种种摧残，要置我们身心于死地，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敌人残酷折磨所征服，而是吸取绝食失败的教训，在孤立无援极其艰难各自为战的条件下，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根据绝食失败的教训，首先必须冲破敌人对我们的隔离和同外界的封锁。为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取得了铅笔和纸张，利用放风场地、洗澡盆、借线装书定暗号、写密信，给住同一排监房的同志定密码，敲暖气管发“电报”，争取住隔壁的普通犯和收买、争取看守，使我们一、二人，二、三人之间逐渐建立了经常的或时断时续的联系，同志们互相勉励，商讨斗争对策，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反击敌人的摧残。同外边党组织的联系，费尽周折，仅个别同志一度接上关系，其他同志始终未能实现。我和武竞天同志就是利用敲暖气片联系的，后来这一办法被敌人破

坏了，就通过住他隔壁的普通犯张庆建立了经常的联系。经过教育，张庆觉悟有了提高，由我和武竞天介绍他入了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我出狱后，通过张庆介绍另一经常到狱外采购搬运副食品的普通犯（有看守押运），同武竞天同志还保持了半年的联系，给他送些钱和革命书籍，告诉他外边形势等。我出狱后，也是武竞天同志通过住他隔壁的另一政治犯——清华大学学生关士骏（反帝大同盟盟员）的关系，找到清华大学党支部，同省委接上的组织关系。经我介绍，省委同武竞天同志也一度建立了联系，后因张庆出狱和省委不断遭受破坏，又失掉了联系。张庆出狱后当了党的干部。为了冲破敌人的隔离和封锁，有的同志曾屡被关禁闭或受其他处罚。

我们还根据狱中的实际情况，除尽力争取同志间的秘密联系和同外面的联系外，主要时间是用于学习上。虽然敌人对借书买书多方限制，但经过斗争和利用敌人的无知，还是可以买到一些进步书籍，从图书馆借到一般增长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如唐宋诗词、《资治通鉴》、日用百科全书之类）。我在这里一年多，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是有不少收益的。

我们经过艰苦顽强的斗争，一监的环境虽然未能得到明显好转，但是同志们却始终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为反抗敌人的摧残，付出了重大代价。彭德、刘尚之、赵子青、祝子杰、杜远、张玉、赵玉祥、陈云祥（非党员，以后精神失常）等同志坚持革命气节，在刑期已满，断然拒绝履行“反共”、“悔过”出狱手续，被分别送到北平、济南反省院。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张聚三、赵子青、祝子杰同志就是在反抗敌人的摧残中，惨遭杀害的。

回顾以上监狱生活，我们共产党人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为

争取和保卫生存权利，改善生活条件，同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并利用坐牢的时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为出狱后进行新的战斗，武装了思想。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绝大多数同志提高了革命觉悟，加深了对敌仇恨，锻炼了革命意志，增长了革命智慧，学到了革命本领，锻炼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很多同志出狱后，走上革命各个战线的领导岗位。

实践证明，共产党人在失掉人身自由，生命掌握在敌人魔掌中的情况下，只有同敌人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并根据监狱的特点善于斗争，才能打击和揭露敌人，取得斗争的胜利。

茅家岭暴动

李维贤

—

一九四〇年秋，蒋介石阴谋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初，趁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从皖南向敌后抗日战场挺进之际，以七个师的兵力预伏于茂林地区，悍然对我军突然袭击。我军仓卒突围，一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少部分因伤或分散隐蔽被敌人搜捕去。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

被捕的新四军人员被囚禁在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附近之周田村一带。在这所外界称为“上饶集中营”的法西斯监狱里，特务们将被捕人员编成五个中队、一个特别训练班，特训班专门囚禁在战区附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共产党员。为了欺骗舆论，对被捕人员不称“犯人”而称“学员”，也有教官，还从社会上请来所谓“名人”、“学者”讲课，企图从政治上来软化我们。这些手段收效甚微，于是法西斯凶相毕露，对被捕人员施行各种刑罚，强迫自首叛变。其刑罚我们概括为“金”、“木”、“水”、“火”、“土”。“金”就是拷打后再用刀背在棒伤上砍，或是用三、四寸长的针刺腹部等软组织。“木”是压杠子、老虎凳、棍

棒拷打。“水”是灌辣椒水，或者冬天脱光衣服扔进冰河里冻。“火”是用火烤烟熏。“土”是活埋大半身。受过这些刑罚后仍不屈服者就被关进集中营中的监狱——“茅家岭”。这是座庙宇改成的监狱，有优待室，关押有过错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重禁闭室，象普通监狱一样，称笼子，门口有卫兵看守，新四军被捕人员及共产党员当然是关入笼子。关进茅家岭之前，敌人要你在全队面前公开诬蔑共产党或新四军，实际上是公开逼降，遭到我们同志驳斥后，以煽动罪当众拷打，称为“惩罚”，然后上手铐由宪兵押送茅家岭。到达茅家岭由监狱管理员王锡恩（浑名“王八”）验收后，先得站铁刺笼，这是仅容一人站立的木笼，围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叫你站在里面动弹不得，站久了就会头晕目眩。

二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被捕人员除少数是老红军、老同志外，绝大多数是东南几省和海外归来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学徒。到一九四一年底，茅家岭共关有新四军干部和地方共产党员二十余同志：王传馥、李胜、陈子谷、吴越、宿士平、钟袁平、李维贤、祝增华、吴华光、徐师梁、杨灿等。女监中有李采芝、纪白薇同志。这些同志多半是三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有两位归国华侨，有三位留日学生，一个大学生，其余多系中学生。尤其陈子谷同志可以说是毁家纾难。他是泰国华侨，为了解决新四军受国民党限制军费的困难，他经组织同意去泰国，将分得的家产二十万元及从华侨中募捐的六万元全部贡献给新四军，解决了全军两个半月的抗日军饷。象这样的爱国青年也被国民党关进集中营。还有部分青年学生，虽然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对党和革命有一定认识。

对革命大家庭有深厚感情，但应如何认识“皖南事变”这一挫折，如何对付敌人的阴谋诡计还不十分明确，十分需要党的引导。

我们在茅家岭被分为几个队，各队都有些比较老的同志。经过短期酝酿，党的小组、支部或核心组先后产生，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工作，要求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党组织逐个找大家谈心，帮助大家认清“皖南事变”是革命进程中的挫折，是国民党反共降日面目的暴露。通过组织的工作，大家了解到党中央正在为“皖南事变”伸冤，正在想办法营救被俘人员，都很受鼓舞。特别是叶挺军长大义凛然，严词痛斥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阴谋制造“皖南事变”，拒绝“中将副司令长官”的诱饵，以及组织部长李子芳、政治部秘书长黄诚、冯达飞等领导同志公开痛斥特务的事迹传开后，不仅大快人心，而且鼓舞了同志们斗争的勇气。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同志原是上海一个纱厂女工，参加新四军那年仅十七岁。本来可以先行出发，但她愿接受新考验，毅然要求随队行动。突围时，她因病隐蔽在一个农民草舍中，被国民党匪军搜出后轮奸，染上了恶病。施奇被抬到集中营时已奄奄一息，特务说，只要她在自首书上盖上手印就可以给她治病。但她说：“我身体虽然被糟蹋了，但我的灵魂是纯洁的，我的政治气节是清白的。”拒绝在自首书上签字。这个纯洁、忠贞的共产党员终于被敌人活埋于茅家岭。

还有一个重病不屈节的杨文岐同志，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有抗日青年的正直品德。他在狱中患回归热病已报病危，他父亲闻讯前来，想通过关系领回抢救。国民党特务也允许保释放，但必须在悔过书上画押。杨文岐虽然一直处在持续高

烧的状态中，但对这件事始终不糊涂，就是不盖手印画押。他父亲只好含着满眶老泪单身回去。后来杨文岐居然从死神手里挣扎回来，直到赤石暴动与同志们一起冲出特务魔掌。

茅家岭监狱的党组织还在狱中组织大家学习。在监狱里组织学习，困难重重，大家利用反动宣传品的空白和背面装订成小本子，将蘸水笔尖绑在木杆上制成笔，解决了学习工具问题。为了躲过特务们的监视，一个办法是利用特务知识贫乏，在合法掩护下学习禁学的内容：我们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学起。特务们来监听，我们就高谈孙中山，特务一走，我们就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学日文、英文是允许的，有的同志将革命铭言，译成英、日文来教大家学习。我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感动了一些关在茅家岭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次，我们讨论苏德战争形势，经过热烈辩论，大家认为苏联人民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得到全世界人民拥护，德国法西斯虽然暂占优势，直逼莫斯科城下，但最后胜利必属苏联人民。日本虽已占大半个中国，最后也必败于中国人民。这时在笼子外墙角听我们讨论的国民党军十三师政训处长杨某突然露出身影，感慨地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讲得多么精辟。你们这些年青人，关在牢里不知死活如何，还在关心天下大事。得天下者，必共产党。”看来，我们的学习给这黑暗的监狱透出一缕光亮。

茅家岭监狱里党组织巧妙地领导了反迫害斗争。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是皖南新四军军部东进一周年纪念的日子，也是“皖南事变”一周年前夕。那晚，关在大笼子里的同志突然站立起来，先默哀三分钟以悼念“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友，然后高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的新四军军歌。

这悲壮歌声划破黑夜的沉寂，震人心弦，也触痛了敌人的神经。特务、卫兵歇斯底里似地围着牢笼咆哮、嘶喊：“不准唱！不准唱！”同志们谁也不理睬它，唱完全首歌曲。这一夜，敌人没有睡好，估不透我们还准备干什么。我们预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果然，没两天，敌人找了个借口将参加新四军不久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吴华光同志拖出去拷打，逼问谁是狱中领导者。当时特务、卫兵荷枪实弹，气势汹汹，气氛紧张，吴华光虽然身体粗壮结实，但也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他坚不招供。我们在笼子里也齐声高呼：“不准打人。”直到恶棍们筋疲力尽，才将吴华光同志拖回笼内。党组织决定采取绝食斗争，以抗议敌人暴行。连续三天，我们都不进食。最后由接近我们的中间人士进行调停，狱方答应了我们“不准打人，准许唱歌”的条件。这次绝食斗争是我们集体斗争的预演。

赖少其同志是我国青年木刻家，集中营特务头子——三战区情报专员张超亲自出马逼他自首，碰了钉子。张超恼羞成怒，将他押到茅家岭站铁刺笼，站得头晕眼花。正在这时，笼子里一片人群站了起来，唱起了他写作的《渡长江》歌，他感到一股暖流通过全身，挺起胸又坚强地站立在木笼里。

广东青年陈剑峰是新四军一个连队的文化教员，因受特务迫害，精神有点错乱。有次又发病了，正当寒冬腊月，敌人将他拖出去毒打，他大喊：“朱总司令带五十万大军南下援助新四军！”特务又气又怕，加劲打他，越打陈剑峰叫喊越厉害。我们责问特务，为什么虐待病人。敌人只好将陈剑峰放回笼内。说也奇怪，一回到笼子内，他感到阶级友爱的温暖，病也不发了。党组织指定人专做他的工作，又注意照顾他的病体，以后他一直没发病。

在失去自由的监狱里，在黑暗的法西斯酷刑迫害下，我们靠着坚强的党组织，靠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使受难的青年战友看到了前途，增添了斗志。所以许多其他集中营的战友都称“茅家岭”为“茅家岭大学”。

三

经过与敌人几次较量，同志们增加了与敌斗争的信心，过去酝酿过的暴动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王传馥、李胜等同志集中了主张暴动的意见，说服有不同想法的同志，求得了认识上的统一。越狱暴动不同于一般的武装斗争，必须缜密地组织计划。我们推选王传馥、李胜、陈子谷、吴越、宿士平五同志组成暴动委员会，策划和领导这次暴动。暴动委员会成员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逐一研究了暴动的各个环节，提出各项具体措施。由于大家的掩护，直到暴动开始，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有异常的形迹。

暴动委员会分析了茅家岭监狱周围的情况：这里国民党军政机关林立，距三战区长官部皂头十五里，距三战区政治部汪家园不到四里，与三战区情报专员室即特务机关相距三里，特别距刑讯室只有几百公尺，可以说是虎口下的禁脔。敌人选择这块地方作为集中营的监狱，还派了一个排看守，自认为万无一失。在这里暴动，无异虎口拔牙。况且同志们多是刑后余生，营养不足，身体虚弱，要想暴动成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有有利条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随时都准备献出生命，并且已经紧紧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同时，我们摸清了敌人的行动规律，可以寻找空隙，还可以设法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是可以制胜的。经过反复研究，下了举行暴动的决心。

暴动委员会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暴动。虽然我们每天被克扣囚粮吃不饱饭，又有不同程度刑伤，体质虚弱，但如果能巧妙地夺取武器，敌强我弱的形势就会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对卫兵做工作，放松看守，混出笼子三、四人，再加上女囚室的两个新四军女同志，以五至六人分别对付笼子口及大门口的两处值勤卫兵。万一对付不了，可“关门打狗”，先解决笼子门口卫兵，笼子内同志一举冲出，夺取全部卫兵枪支，这样可以控制茅家岭监狱内局势。因此决定必须夺枪暴动。

暴动委员会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选择一条避开敌人力和火力拦击，以最小代价冲出三十里包围圈。在这三十里范围内，国民党除配置军、警、宪岗哨外，还组织了严密的基层政权机构网——保甲制度、连坐法。后来集中营越狱的同志，好多人就这样被追捕回来。因此，必须在暴动的第一夜就突出这封锁区。在监狱中要摸清敌人岗哨情况是很困难的。但是通过平时对各方面人士做工作，在被敌人押送审讯途中及在卫兵监督下出公差、砍烧柴时对周围地形的观察，还是积累了些地形、岗哨的情况。这时从下周田村关进了一个与我们党有关系的姓梅的保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况。特别是龚金福同志过去在闽北打过游击，从周田集中营跑出去后找到了闽浙赣省委汪林兴同志领导下的游击队，有次负伤掉队，又被敌人抓回。他没有暴露游击队员的身份，以逃跑罪名被关进茅家岭。他知道闽赣一带地方党的关系、接头点和秘密路线，为我们暴动后到闽北找立足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暴动委员会接着研究战斗方案和战斗编组，决定先解除值勤卫兵的武器，然后夺取全部卫兵的武器，立即冲出茅家岭监狱，

选一适当隐蔽地点，稍事整顿，利用黑夜脱离这一地区，向南直插黄沙岭，再到绵羊关去武夷山。我们估计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各成系统互相掣肘拆台，当地部队得知茅家岭出事后不会主动派兵协助特务。而特务头子张超手下只有看守集中营的两连宪兵，无法抽调。为了防止连锁反应，他只能加强控制集中营，同时报告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派兵追捕我们。要调集一个连以上的兵力，最快也要迟至两小时后才能出兵。以我们体弱每小时走五华里计，两小时也能走出十余里路，进入山区。以后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迟至五小时后才派出两个宪兵连追赶，根本没有见到我们人影。

根据以上方案，我们按人员体质、战斗经验编成两个战斗组，另分配我和杨灿同志担负夺取大门外值勤卫兵枪的任务。每个战斗组负责解决一个卫兵班。每个组内又分出夺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将特务、卫兵囚禁的具体人员。分工严密，责任明确。

为了准备暴动，还做了其它准备工作。敌人被我们制造的假象所蒙蔽，虽然派进了“潜伏哨”，也没摸到我们一点信息。

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时机。暴动委员会一方面对执行主要任务的同志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愈是接近暴动，愈要防止急躁情绪，一人成败关系全局；另一方面加强观察敌人动向，及时捕捉战机。不仅指挥全局的李胜、王传馥同志注意掌握战机，每个同志也都在一天、两天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

四

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来到了。

随着日寇进攻浙赣铁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一触即溃。战事

逼近上饶。国民党三战区军政机关，惶惶然作逃遁准备。二十五日，观察哨频报敌情：敌警卫排长同两班长去团部开会，“王八”管理员带几个卫兵押送玉山中学被捕几个教员去周田集中营受训；中士班长与朋友去上饶城里，将看守任务交给下士副班长。晚饭后尚不见出去的敌人返回。为了最后核实情况，王传馥同志佯言要找“王八”管理员问何时去队“受训”，他先至“王八”房里，查明“王八”确实还没有回来，又返至警卫排长及卫兵班室，不见排长，仅见一两个士兵在室内闲躺。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暴动委员会下了最后决心，通知大家“立即动手”。

李胜同志先派杨灿到庭院中洗衣服，以配合我夺大门外卫兵的枪或关大门。随后派我出去。我以收回晾在大门外衣服为由，得到笼子外卫兵放行。当我出大门时，下士副班长紧跟着我，大门外卫兵也很警惕，无从下手。我只好收了衣服回笼内将情况向李胜汇报。他命令我再次出去执行第二方案关大门。我以肚子痛拉痢为由再次得以出笼。我经过杨灿身旁时向他发了个暗号，随即三步并作两步接近大门，以迅猛动作“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插上横闩。待大门外卫兵醒悟时，用刺刀捅厚实大门已无济于事。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跑来，连喊：“你干什么？！”我在杨灿配合下举起身边火钳，威吓特务说：“你来！劈死你！”吓得他连忙窜回房里。只听大笼内一声怒吼，若山崩地裂，人群冲出笼门，推倒卫兵，夺下他手中枪支。我与同志们一起分成两股，分别冲向两个卫兵室及特务管理员室、警卫排长室，夺下全部武器，计轻机枪两挺、步枪九支、手榴弹三十八枚。这时参加暴动的二十六位同志都武装起来，连两位留日学生陈子谷、吴越同志都紧握两枚手榴弹，颈上还挂着两枚，威风凛凛，吓得卫兵叩头求饶。

茅家岭已完全被我们控制，下一步是组织突围。这时，大门外卫兵的枪已由下士副班长掌握，用火力封锁我们向茅家岭村的去路。我们一位作家、《浙江潮》编辑钟袁平同志被敌人火力压在田埂上，不知负伤没有。王传馥同志跃过去想拉他，被敌人打中一枪负了伤。他沉着地利用墙角向敌人投了一枚手榴弹，爆炸声中，敌下士副班长应声倒下。同志们扶着年老的宿士平及负伤的王传馥同志向南夺路冲去。但王传馥同志伤情严重，只好将他隐藏在一山沟里，后来敌人全面搜索时将他抬回去活埋了。钟袁平同志也光荣牺牲。

冲出茅家岭后，除少数体弱及有地方党关系的分散行动外，大部分同志按原定计划行动，第一夜冒着大雨，赶到黄沙岭一带，隐蔽了一天。以后陆续到达绵羊关、青竹坑一带老苏区，辗转曲折找到了闽浙赣省委领导的游击队。以后又汇合了六月十七日崇安赤石暴动脱险的四十余同志。我们在武夷山再次举起红旗，坚持闽浙赣游击战数月。随着日军从浙赣路撤退，我们也向大江南北，返回新四军。

这就是四十年前发生在上饶集中营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当暴动消息传到周田集中营时，难友们抑制不住内心喜悦传告“茅大”毕业了。确实，茅家岭暴动及以后六月十七日赤石暴动的胜利，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被捕人员“溶化”政策的彻底破产。两次暴动后特务们对英勇不屈、未能从赤石脱险的同志大加屠杀。赤石遇难烈士王子燕同志有一首遗诗说：“浩气永世存，丹心昭万古；生平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大革命时期的江华农运

吴 健 人

接 受 训 练

一九二七年元月下旬，中共湘区党委与共青团的领导把我从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本科调配到省农民协会农运训练班，受训一个月。这个班的创办，完全是为适应当时的全省农民运动已经普遍公开发展的形势需要，由湘区党委创办的，全班同学不到三十人。训练班的主任是省农会委员长易礼容同志，中共湘区党委书记罗迈同志（李维汉同志化名）亲自讲授政治、时事等主要课程。此外，秘书长柳直荀与党外进步人士徐特立分别担任农会组织章程与国民革命史略的讲授。重点课程为一九二六年底全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和各项重要决议文件，以及当时北伐与农运斗争的重要口号，如：“农民兄弟们组织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砸断封建宗族枷锁！扫除封建迷信！男女平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等等，每个口号都作了深入的讲解。理论与思想方面，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国民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方针等专题讨论。各个专题讨论，最后都由李维汉同志作总结。我记得在讨论三民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时，李维汉同志曾指出孙中山先生的“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的提法有待商榷，李说，共产主义固然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而民生主义则仅仅是共产主义的初步准备，而不是什么“实行”，至于在实践上是否会导致走弯路，还要看形势的发展才能判明。我们的同志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使自己有个明确的思想界限，决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但不要在宣传上，公开地把未来的目标现在就提出来，现在还只能讲三民主义，更不能提高自己、贬低别人，这不利于当前合作关系，我们的同志必须注意遵守。这次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当徐特立同志在讲课中，因强调三民主义的绝对真理性，曾引起同学的反感与辩驳，使徐老处于尴尬境地，李维汉同志立即出面制止，要求同学们要尊重党外同志，不能用自己崇高信仰去要求朋友，在合作关系上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能遇事小题大作，故意挑剔，要注意恰当处理党与非党关系，否则会使党处于令人望而生畏的孤立境地，那是欠明智的，只能给革命带来阻力而不是助力。他要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无产者在我们国家里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在革命征途中要注意争取盟友，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战略，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我们的同志要清醒、慎重地对待这个目前就面临的重要问题。他针对徐老讲课所发生的矛盾，要求同学们只能在课后用便条向班部提出质疑，由班部与徐老研究后，再在课堂上答复，这样就平息了课堂上的争辩，徐老的讲课也相应地提高了。后来徐老随着形势的发展，由原来民主革命者迅速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

组织农会

我是三月初到达江华县城的，首先到县高小学校向韦汉同志递交了中共湖南区党委的介绍信和省农会委派令，并向他着重地转达李书记和省农会的紧迫指示，希望能尽快成立县农会，发动全县开展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群众运动。我告诉他在长沙动身时，李书记再三指示，时间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抓紧发动宣传。因此，我问他：能否在一周时间内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宣告县农会正式成立。韦汉同志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县农会筹备处已成立月余，各区、乡农会筹备处也普遍在成立中，按农会组织章程规定的人选安排，也大致就绪了。他笑着说：召开代表大会事，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专候驾临”了。我听了十分高兴，说：“你们工作做得这样扎实出色，使我十分钦佩，至于我个人，还只是CY同志，又是初次跨出学校大门，毫无工作经验，今后你既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老师，只有在你的指教与支持下，我才能勉强挑起上级所赋予的重任的。”韦汉同志表示非常高兴，并继续对我的提问作出既风趣而又明确的答复，他说：“至于召开全县代表大会日期，我看用不着一周时间，我立即叫筹备处漏夜赶发通知，只需三天时间，我们就可以祭起东风火烧沱江县城了。”这使我感到意外的满足。在初次见面的交谈中，可说我们就建立了极为融洽的同志关系，随后他带我去筹备处与王贤能、何时芳等筹委及农会秘书雷某见了面。他立即安排他们赶发通知和准备大会文件最后审阅的工作，并给我安排了办公与卧室房间，使我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第二天他召开支部会议，介绍支部成员蒋昔非、蒋应采、罗正

平、兰世凯、王贤能、何时芳、沈成平等与我见面，随后又发展了唐汉民、胡青松等为支部成员，并分别安排他们在召开大会期间的任务。他殷切地叮嘱同志们说：“大家都要全力以赴，保证大会的胜利召开。”同志们也都兴致勃勃地表示：我们一定要以旗开得胜的战果来揭开全县革命历史的第一篇章。这时只有蒋昔非一人，似乎有些超然恬淡的姿态，我背后问韦汉同志，他告诉我这是一个老资格的跨党同志，是县党部（国民党）党务特派员。会后，韦汉陪我去县党部拜访了他，然后到县公署、挨户团、教育局等各机关团体作一次普遍拜访，随后他们也都到县农会来作回访，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其中挨户团主任毛鹏翥，我特别留神他的外表，他身穿长袍青马褂，胸前挂着银表练，头上戴着红珠瓜皮帽，仍然是十足的团防老爷的那种神态，他一进门就是脱帽九十度鞠躬，并向我表示歉意说：“特派员驾到，我们少礼失迎，特来告罪，农会万岁是卑职衷心拥护的，特派员是我们的上司，我有随时听命驱使与守卫之责，从明日起我就调派一班枪兵来农会站岗守卫，以免闲杂人等来打扰……”，我连忙摆着手势对他说：“这个用不着你劳神，农会不是衙门，我们随时都要接见客人，如果守上门卫反会使我们和群众隔绝，那还算什么农会呢？我只希望挨户团的同志，要切实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扶助农工，不能象旧团防那样保护土豪劣绅，欺压百姓，能够做到这点，我们是很欢迎的，以后相交还长，请你多多协助。”他连忙起身鞠躬，连声称“是，是，我一定遵命行事。”我本能地感到这个人十分讨厌、不可依靠。随后在韦汉同志交付的农会组织人事名单中，发现此人列为农会委员兼武装部长，我就向韦汉同志表示要保留，不能在大会选举名单中正式提出，因为建立农民武装问

题，在训练班学习时就研究过，决不能以现存的地主武装来代替农民武装，人事要完全改组更换，要由我们自己的人去掌握。韦汉同志说，这当然很好，但目前周围各县还没有实行，我们也只能退后一步。毛主任这个人，目前还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接替，大会不提名可以，县的自卫军军长的头衔还是暂给他挂上，这对今后进一步改编挨户团是有利的。我见韦汉同志这样坚持他的意见，我对毛的为人又不了解，就依了他的安排。这是最大的失算，是关系到放弃武装领导权的问题，后来我们的骨干同志和韦汉等人，都丧生在他的屠刀之下，成了痛心的血的教训！

县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大约是在三月上旬。会议进行了三天，到会代表百余人。会议的进程和内容，大体上是按照省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模式举行的。开幕之日，满城街道都贴上了红绿标语，锣鼓声、爆竹与土铳声，真是震撼了整个县城，韦汉同志首先向大会介绍我与代表们见面，我在会上作了简短贺词，并介绍了长沙各地农会普遍兴旺与打土豪杀劣绅的热气腾腾的情况，大家几次起立热烈欢呼。最后一天选举了县农会人事，是用大会提名介绍举手通过的简单方式进行的，县农会委员长为何云溪，组织部长为唐汉民，宣传部长为王贤能，武装部长暂由委员长兼代，主任秘书何恩波及委员何时芳、罗正平等。会议通过了各项重要决议，如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祠庙公产由农会接收管理，执行禁烟、禁赌等，这些都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会上还宣读了各区农会筹委名单。大会闭幕后，大会的决议案与禁令都用大字标红布告贴出去，围观的群众无不奔走相告，喜形于色，都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各区代表回去后，我满以为会很快出现组织高潮，捷报不断传来，殊不知十天半月，仍

然消息沓然，只有附城乡农会很快组织起来了。我就和韦汉同志商量，开展打土豪劣绅的群众运动。经过支部与农会酝酿，决定揪出县城大名鼎鼎的王谟、杨霖两个大土豪进行游斗示威。那天，由城乡农会梭标队三百余人，浩浩荡荡开进城，把他们押到大会场进行控诉，历数他们残酷剥削压迫百姓，鱼肉穷人的滔天罪行，当场群众愤怒地勒令他们跪下，认罪请罪，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押到街上示威游行，两个家伙吓得面如土色、冷汗淋淋。这是继代表大会后县城掀起的第二次群众运动高潮。在这次运动后，城乡正气大大高涨，烟赌绝迹，盗匪潜行，当时街巷三、五成群的小孩，到处唱着：“农民协会呱呱叫，县太爷衙门打清蘸”的顺口溜。这些，当然使我和农会的同志们十分高兴。但为什么区、乡农会含苞待放的花却迟迟开放不出呢？我向韦汉同志建议：光是斗争几个土豪，恐怕还是解除不了农民的顾虑，是不是抓一个民愤极大、罪恶多端的恶霸开刀，进一步树立农会的声威，扫除农民的顾虑呢？他说这要农会正式成立土豪劣绅特别审判法庭后，才能有法有权来考虑这样的事，目前还不在急上。但他又告诉我，农民的顾虑确是一个看不见的暗礁，他说北区方面农村里，暗暗在传播一个反革命谣言，说什么“农会无天又无法，将来个个过刀杀”。我说这还了得，这是“道士门前鬼唱歌”了，一定要追查出来，就用他来祭刀，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第二天，我和唐汉民一道去北区农会筹备处，想抓出线索来，却不料筹备负责人一个也不在家，外出了，只有一个中年工作人员接待我们，问他最近听到什么农会不好的谣言没有，他矢口否认说，没有什么谣言。我们只好叫他转告筹备负责人，认真查报县农会。同时，我们问

区农会准备什么时候成立，他说：这里人心不齐，谁都不愿出面管事，看情况还需要一些时间，等各区都成立了，我们这里也是会成立的。这都使我非常失望，客来主不在，我们也只好当天赶回县城。后来又请蒋应采同志去发动与查访，也没有什么分晓，问题就搁置下来了。这个区农会，在我的记忆里，是始终没有成立起来，可能有些乡农会成立了，那也是形势所迫，勉强凑合而已。

江华区乡农会发动得较好的首推秦三区，那是在发生一次两姓为争坟山牧场的大械斗，经过唐汉民和我及时赶到现场，作了有力的制止和调解，避免了一次大流血的惨祸之后，我们抓紧这个机会进行了揭露与宣传教育，才把坏事变成了大好事，有力推动了农会的普遍成立。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当秦三区的械斗消息传来时，县政府和挨户团都束手无策，不敢出面。唐汉民关心桑梓，建议和我立刻赶赴出事地点，进行排解。我们两人骑上挨户团的大马，带了一排枪兵，挥鞭径奔出事地点。正当双方发起冲锋，快到短兵相接的时刻，我们两匹马直插到中间地带，唐汉民大声高呼省特派员来了，命令双方立刻就地停止，不许前进，这时双方枪声紧密，子弹不断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啸而过，唐汉民又发布口头命令双方立刻停火，违犯的就立刻拿办。这时我们带去的挨户团枪兵一个加强排四十余人也满头大汗赶上了，在唐的指挥下，拉成一条散兵长线，从中隔断与监视双方停火后撤，才制止了这场大械斗。据说双方人枪与梭标都在五百以上。随后唐又招呼双方为首的宗族头目来和我见面，我严肃地厉声斥责他们，并追问他们为什么胆大包天，竟敢煽动农民兄弟自相火并、残杀，农民协会要彻底追查罪魁祸首，双方如有伤亡事故概由双

方头目抵命赔偿负法律责任。我命令他们当场立下永远和息字据与认罪悔过书，才免予带往县城追究，这样他们乖乖地各自悄悄收兵了。同时，唐汉民又找来双方较有觉悟的骨干分子约三十多人，我和他们一块坐在草坪上，用谈心的方式询问他们：

“今天这场械斗假如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该会造成怎样的流血死亡的惨象呀？”他们看到我这样心平气和的提问，并无责骂他们的气氛，大家紧张的心情也解除了，都争着回答说：“特派员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今天到场的人个个都说农民协会比观世音菩萨还显威灵，要不然谁能在刀口上把我们抢救过来，这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啊……。”我又问他们：“既然大家明知是火坑血海，为什么你们都甘心跳下去，是谁逼迫你们非跳不可，难道你们家里没有老父老母，没有妻儿子女吗？你们卖命死了，谁来赡养你们全家老小！你这样死了伤了，有什么光荣？有什么用处，那不白天白死、黑夜黑死了吗？杀死杀伤了别人你们居心何忍呢？”他们中不少人流着眼泪说：“我们确实是鬼蒙了心，族长老爷们一声呼唤，我们就不敢违抗，也就顾不得一切来拼命了，好象这是上保祖宗丘墓下保宗祠公产的一个好汉英雄，这个宗族至上的思想，就是族长老爷们常常向我们灌输的……。”我趁机向他们指出：“是呀！宗族观念好象是人的本性，其实只是封建流毒，它是宗族里土豪劣绅驱使农民为他们卖命的迷魂汤，他们利用宗族观念这根绳索，穿着大家的鼻子，大家就成了他们串上的鱼砧板上的肉了，叫你活就活，叫你死就死，这样就给他们建立起无上权威，谁敢于违犯他们的意旨，他就叫你在宗族里抬不得头，站不住脚，连活也活不下去，因此，你们今天明知是凶多吉少，也身不由主地被迫来卖命了，是不是这个情况呀？”他们都

齐声回答说：“完全是这个情况，特派员的话真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械斗完全是宗族老爷逼迫着我们干的，宗族是个害死人的圈套，它是一具无形的枷锁紧紧套在我们祖祖辈辈的头上，我们命中的八字就完全操在族长们手心了，这个道理分毫不差，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想透，找不出根由来。”我说：“是呀！这也怪不得大家，我过去也不懂这个道理，从小就拜神祭祖，在族长绅士面前不敢说半个‘不’字，直到学了革命道理，才开了心窍，才知道土豪劣绅真是个活阎王，他们坐在族长宝座上，利用祭祖拜神祀天的名义，来操纵祠堂庙宇的公产，高租重利盘剥农民，他们不劳而获、安享尊荣，我们穷苦农民终年劳苦却吃不饱穿不暖，还以为是自己命中八字注定的，这不是愚蠢的奴才吗？现在农民协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官僚军阀通通打倒，扫除这些吸血鬼害人虫，我们劳苦农民才有出头之日。因此，只有农民协会才是为我们农民创造幸福的大家庭。我这次是湖南省农民协会派来的，唐汉民同志是县农民协会派来的，你们今天算得是听农民协会的话，在死亡边沿上站住了脚跟，但是还要彻底回头，今后不要再听土豪劣绅的话，要听农民协会的。用农会的权威压倒土豪劣绅的权威，这才是我们子孙万代幸福无量的事啊！”当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表示说：“农民协会救了我们的命，我们今后发誓要听农会的，决不再听土豪劣绅的。”我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这样就取得了一场发动与宣传的大胜利。我记得我和唐汉民一道回县城时，沿途父老婆婆们竟然放鞭炮点香烛插在路上来欢送。在回头路上，唐汉民高兴地对我说：“我们这次出马真是打了个大胜仗。”区农会筹备处的同志说：“特派员和你这次挥鞭赶来，不但挽救了我们许多农

民兄弟的生命，对我们区农会开展工作也是一场及时雨。”果然，不久区农会就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之日我和唐汉民又赶去参加，只见红旗似海，锣鼓喧天，真是盛况空前。大会的决议案，不但提出在政治上彻底推翻宗族恶势力，而且为一切权力归农会作出了有力规定。例如改组区公所武装，它明确规定，在区农会成立后一个月内着手改编为农民自卫武装常备队，归区农会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指挥，这是在县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还没提出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在经济上，不但对一切祠堂庙宇公产由农会清理接收，而且对减租减息与废除苛捐杂税都作了具体规定，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是向消灭剥削勇敢地迈出的第一步。区农会还号召各乡成立妇女协会与儿童团，开展妇女解放与儿童教育的活动。

风 云 突 变

正当全县农会打破停滞局面，秦三区高举红旗，岭东区紧锣密鼓，苍梧区展开发动之际，发生了“马日事变”。消息传到江华，大家在震惊之下，却错误地认为这只是少数反动军阀妄图螳臂当车，纵然猖獗一时，也不过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罢了。我们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苍梧区方面派去兰世凯同志，一方面向那里的土霸主莫奉山队长打好招呼，请他兼任该区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另一方面把那里区农民代表串联发动起来，推动筹备委员展开全面的工作。但此时出人意外的是，永州方面反动军队王德岗团竟然接连袭击与封闭农会，屠杀我同志。当时韦汉同志与何云溪会长两人面面相觑，认为大势不好，祸迫眉尖了。我力促韦汉同志召开支部会议共商紧急对策，会上唐汉民同志首先慷慨陈词

说：“蒋介石肯定已经叛变了，局势确实严重，我们应该当机立断来扑灭野火，才能保住大片森林，这是非常事件，就要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县里民枪有千余支，我们可以立刻下令各区农会把民枪牢牢抓到自卫队手里，并各派出一支力量汇合进驻县城，归县农会指挥，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局势，城乡呼应，万无一失了。第二步就是要毫不犹豫地把挨户团武装拿过来与农民自卫军组成战斗编制，同时派出得力人员联络永明、道县、宁远的农会和我们采取一致行动，汇合各县自卫军会师永州扑灭永州方面的反革命野火，并通电声讨长沙的叛贼，待命挥戈北进。”他激昂地说：“湖南三千万农民兄弟当然不会容忍反革命小丑跳梁，就是蒋介石全部掉转枪口，我们也肯定能消灭他，问题是在于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必定遭殃……”我越听越觉得这位同志有胆有识，便和蒋应采同志立刻表示完全赞同。韦汉同志却坐在靠椅上沉默不语，我急得冒火了，冲着他说：“韦老师说话呀！唐汉民的意见你同不同意呀！”韦回答说：“唐的意见很好，但是……”我立即抢着说：“那我们就分头去干起来！”韦说：“你不要急躁，听我讲完，这事非同小可，论感情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们各方面情况不明，怎么可以兴师动众，光凭血气用事？我看还是等候上级指示，我们再采取行动。至于发出声讨长沙方面叛逆的通电，那是可以立刻就办的，各方面的联络也可以派专人进行，不知大家以为如何？”这时蒋昔非立即表示完全同意，通电交县农会拍发，联络人就请蒋元斋担任，即日启程先去永明县，可是他一去便杳无消息。随后韦汉同志接到了上级紧急指示，大意是各地区农会应镇静应付事变，不能轻举妄动扩大纠纷事态，要静候上级调处。韦汉同志这时更加

认为自己与上级指示不谋而合，他把暂时撤退县城的腹案搬了出来，进行安排。他吩咐唐汉民回秦三区去，自己与何云溪、何愚回到岭东区去，他说我们的大本营在这两个区，抓好了两区的武装，我们退可以守，进可以攻了。县城方面只留下特派员与王贤能、蒋应采坐镇，他说城乡密切联系，首尾相应，就可万无一失了。他还对唐汉民说，你想把拳头打出去，我看先要向后收回拳头，才能看准目标挥出有力的拳头来。这样大家没有二话就照他的安排行事了。我在县城里呆了一段，各方面风声日紧，韦汉同志曾两次写信催我撤退下乡，附近城乡农会的同志也十分关切地劝我下乡暂时避风，不宜大意，街上经常碰面打招呼的人，此刻也变得冷漠起来了。一天夜晚，有个邮电局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姓名）向我秘密通风说：“永州府有紧急电报到县府。”要我特别留意。我凭着一股探虎穴的勇气，暗藏手枪径直从后门走到王德钦县长的房间里，我向王说，特来求教的。他慢吞吞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暂时下乡避避风呀？”我问他：“您近来接到上级什么指示没有？”他打开抽屉拿出卷宗，抽出一份电报拿在手里对我说：“永州王团长（他的兄弟）有一个电报，很使我为难，你赶快把农会牌子取下来，离开县城好不好。”我不看电报就知道这一定是催命符了。便对王说，谢谢你的关照，我马上照办，我告辞回转了身。王是一个非常平和而诚笃的道学先生，在短期相处里，虽然农会大大压低了县署的权威，却没有直接顶撞他的地方，我还赞扬过他是执行三大政策的典范。这个人在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馆员，现在去世十多年了。当日正是经他的善意提示，我才随后在唐汉民同志亲自来城接带下，在一个拂晓时分悄悄离开沱江县城，去秦三区的。

起 义 受 阻

我和唐汉民同志离开县城后，一路上谈怎样起义的办法和步骤，我问唐，这回把拳头打出去有没有把握？他说，我来接你下乡正是为着这个问题，你来，这个问题我就更加充满信心了，秦三区的群众对你有很好的印象，你来加把火，就会沸腾起来的，问题是岭东区韦汉同志那边是否有决心配合我们行动，这个问题我就没有把握了，论实力岭东区比我们强。我问他，假如岭东区没有决心，你们能不能首先干起来？他回答说，能，只是声势单薄了，实力也不够，打不开大的局面来，就不能一股作气拿下沱江县城，弄得不好还会半途而废，不合算。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再问他，那我在你们这边再停留几天时间和区乡农会的骨干会会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我们两人就到岭东区好不好？他说他也正是这样想的。当天到达秦三区，第二天，唐就召集骨干到一个学校里开会，他首先介绍说，特派员这是第三次来到我们区里了，这次来大不同于前两次，他有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和大家研究，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要认真听清，不懂可以问，会后要绝对保守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句话，谁走漏了消息，我们就把他当土豪劣绅的奸细来惩办，并且希望大家互相监督。接着，我就和大家讲话，我说：“我这次来到这里，确实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是我想帮助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现在却是我要求大家帮我解决非常迫切的问题，也只有大家下定决心，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我把长沙、衡阳、永州等地接连发生的反革命叛变事件真相告诉大家，并指出，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源是土豪劣绅和军阀勾结起来，想把我们农民协会、工会一巴掌打下

去，用血腥手段把我们农民兄弟压到十八层地狱去，听任他们宰割，来恢复土豪劣绅与军阀们残酷统治的天堂。我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严重的生死关头，我们怎么办呢？是后退到火坑地狱里去还是和这些魔鬼拼一场，打退他们的进攻，把农会、工会坚持到底呢？这是要和大家商量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大家最关切的问题，这将有牺牲，因此，要请大家作出选择和决定。当时大家的情绪立刻沸腾起来，有的站起来握紧拳头说：“我们大家都去当农民自卫军，把土豪劣绅斩尽杀绝，再打到沱江县城，打到永州府，打到长沙，打到南京去，不斩尽杀绝这班军阀，我们就不回来。”有的说：“农会牌子一定撑到底，农会不能散伙，这不是特派员的事，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豁出一条性命也要保住农民协会。”这些义愤填膺、斩钉截铁的话使我得到了极大鼓舞和安慰，我要求大家散会后，注意不露声色，考虑我们最好的行动计划，明天开会研究。

第二天夜晚研究行动计划，有的主张挑出精干武装由唐汉民率领，乘夜解除区公所武装，然后捕杀土豪劣绅，再向县城进攻；有的主张与岭东区约定日期同时行动，一起进攻县城，不要先杀土豪劣绅，惊动地方，把县城拿下后，再捉土豪劣绅，他们是跑不掉的；有的主张先用少数人去城边南北两方引出挨户团，用埋伏的大队在途中消灭他们，在这同时围缴区公所枪支。这些计划方案都很好，很周密，我和唐汉民研究后，告诉他们：“第一点是决心干，第二点是等待我们去岭东区商量日期后同时干，第三点是严密监视区公所与土豪劣绅的行动。散会后，我还看了青年同志刀枪爬杆的武装训练，真是气冲霄汉。

我和唐汉民满怀着胜利的信心来到岭东区，可是与何云溪、

韦汉谈到我们的建议时，他们认为不能凭着一股血气，要从长计议，要等待上级指示才能行动。韦汉同志还大言不惭地说：沱江县城早就摆在我的手心中，只要一捏拳头就什么也跑不掉，你们急什么，我们岭东区是大本营，谁敢来太岁头上动土。一句话，上面没有指示他就决心不动的，这使我象掉进冷水盆中一样。唐背后对我说，他们是肯定不下水的了，我们的计划也只好暂时搁起来。我问他是不是回秦三区去，单独一区先干起来呢？他说我早就考虑这一点，岭东区不配合，光秦三区是孤掌难鸣的，只能别开门路另想办法。我问他有什么门路可开，他说，我在广东陆军部队里有熟人，可以设法钻到范石生的部队里去拖杆子上山，在湘粤桂边界树起红旗来，我们区的群众是会跟我走的，你暂时就住在这里等我的旗子树起来后，派人来接你，那时再看他们岭东区愿不愿意配合我们行动。我说，这太好了，我就和你一道回秦三区去吧。他说，你还是住在这里为好，我们两人马上离开这里会使他们难为情，韦、何两人曾写信接你下乡，也不好匆匆辞走，你留在这里还可以继续做些发动工作，还是有一些希望的。我那边就用不着你担心了，树起旗子只是时间迟早问题，你就照我的意见行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同志真是对革命忠心耿耿，有办法又有魄力，我在失望中又泛起了一线希望。这样，我就在五子庙小学跟何云溪住下了，学校的教员杨荫湘、吴某与唐崇縉的儿子三个人都和我相交很好，他们有事请假我就勉强去代课，小朋友天真可爱都和我打得火热，可我内心却始终记住唐汉民同志的话，要设法推动韦、何二人搞起义，否则消磨时间那是毫无意义的。如何去推动呢？这对我是一个难题，由于自己的知识太浅薄，有时一开口就引得他们发笑，有一次我借谈历史问何云溪

“辛亥革命不是蔡松坡在云南举起义旗就把满清王朝推翻了吗？”老何笑着说，那是推翻袁世凯称帝，不是推翻满清皇帝呀。”我只好将错就错地向他进行鼓动说：“不管是清帝还是袁帝，不举起革命义旗，四方响应，就推不倒他们，今天蒋介石还不是想做封建皇帝吗？！”何云溪说：“不错，但我们怎能和蔡锷相比，他是以一个省举义的浩大声势才济事的，不然，蚂蚁子是顶不起磨石的。”我说：“只怕不顺人心，顺了人心，那怕一个村的力量也能推翻王朝。”何说：“那有这样的事？”我问他：“太平天国不就是从一个金田村起义的吗？”他笑着说：“时代不同，不能这样比。”总而言之，他是没有揭竿而起的信心和决心的。我对韦汉同志也曾借古人的诗句去讽刺过他，那是一首杜甫赠送李白的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高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我故意向韦汉求教第二句典故的解释，并把这一句改为：“未举红旗愧老农”，我问他是不是合平仄，他看了说，还可以，接着又鼓励我说：“你多读唐诗，学着做诗是最好的。”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规劝他，也许他是故意装聋作哑，免得我去纠缠。随后，何云溪的女儿何良玉和她未婚夫刘景云从衡阳逃回岭东来了，也寄住在五子庙小学，何云溪很喜欢这个漂亮年轻而颇有学识的未婚郎婿。听说两人都是共青团员，由于沉浸在热恋中，而绝口不谈革命的大事，对我也只是淡淡相迎，好象害怕妨碍与打扰他们的宁静生活一样。有一次，我向他们作试探性的提问：“你们学校团组织领导，在你们离开衡阳时是否有过什么布置和指示？”何闭口不作回答，刘笑着说：“在各散四方的紧急情况下，还能谈得上什么布置，布置又能起什么作用？”从此我不再和他们攀谈此道了。

不 幸 失 败

在韦汉同志专心等待上级指示的指导思想下，我只觉得日如年，但起义的希望之火，并没有从我内心熄灭。大约是在旧历年关前后，果然上级派来罗醒吾同志主持发动以江华为永属各县基点的湘南总暴动的工作，我顿时喜得心花怒放，踌躇满志。我对韦汉同志失望与抱怨的心情，这时都一扫而空了。罗醒吾同志也对我慰勉有加，我对罗说：“好不容易盼到你来了，原来是一潭死水，今后就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海洋了。”他回答说：“这要靠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问他如何把发动工作开展起来。他叫我先看看上级机密文件与指示再谈，文件都是湘南特委与湘南暴动总指挥部的，在湘南暴动总计划中，把江华县列为江、永、道、宁四县的核心，指示要先在农会基干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这个工作都是罗醒吾与韦汉主持的，在五子庙高小大约举行了三次入党仪式，先后吸收了何云溪、唐崇縉、杨荫湘、尹政、彭良、吴湘、罗湘、屈昭雪、廖学聪、杨弄、韩慧英、刘景云、何良玉、李少白与唐崇縉的儿子等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些是衡阳第三师范学校逃回的。我只参加了一次仪式，会场在小学进大门左手边的课堂里。

随后，罗醒吾派刘景云作交通联络人，赴各区联络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布置各区的暴动准备工作。总暴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要迅速发动全县农民举行农村大暴动，用断然手段，造成农村赤色恐怖，把白色恐怖彻底压下去，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土豪劣绅要斩尽杀绝，不许漏网，财产没收，房屋全部烧光。其中使人怀疑和难于接受的是采取人为的农村普遍赤贫化，要求做到

大义灭亲，并使自己队伍成员凡稍有财产的都要全部烧光，使小私有者完全变为农村无产阶级，以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基本队伍。组织上要先成立全县暴动委员会，与暴动指挥部和各区乡的赤卫队组织，暴动日期尽可能提早，至迟不超过四月份。我看完计划后交还罗醒吾同志，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大约回答了两点，一是希望绝对保密，除韦汉同志外，暂不给任何人看；二是措施上的过激部分，暂不完全执行，以免造成内部的不稳定。罗立刻露出严肃的脸色说：“你的思想不坚定，要好好检查，上级颁发的计划就是命令，不能打折，作为领导核心这是不容许的。”从此以后我不去找他，他也不再主动找我商谈问题。原来他曾征求我去秦三区发展党组织，以后不再提起了。我发现唐崇縉经常背后和何恩波在一块，何是一贯反对搞起义的，我建议罗从唐崇縉村子里搬到学校来住，他听而不答。以后在暴动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我处处表示不占主要位置，只能充当他的副手，他也点了点头。他的腹案是，指挥部总司令何云溪、我为副，县苏维埃主席韦汉，岭东区赤卫纵队司令唐崇縉，秦三区纵队司令唐汉民。纵队以下分步枪队、梭标队、大刀队、运输队以及放火队等组织。暴动的步骤是，第一步，分头夺取区公所与挨户团的武装，捕杀名单上的全部土豪劣绅，抄取全部财产，开仓济贫，杀掉县公署与挨户团的武装领导人，由放火队烧掉全部房屋；第二步，围攻县城，夺取挨户团武装，成立县苏维埃政权。暴动不论成功或失败，都要将主要武装向兰山、桂阳方面前进，以期与主力会合。

暴动计划与日期决定后，由韦汉同志派人报送上级审批，由于暴动日期紧迫（具体日期记不清），我向罗醒吾同志提出让我

赶赴广东找回唐汉民的建议，罗同意了并催我即日动身，务在暴动日期前赶回岭东区。我匆忙由秦三区找来以前跟在唐汉民身边又知道唐在廉江县落脚地点的一个人带路，可是我这时身患感冒，又没有估计到横过五岭高山的艰巨性，路上的干粮也没有带足，结果中途断粮靠摘些茶苞填肚子，后来进到茅山地带，一棵茶树也没有了，饥饿使我一步也走不动了，一阵头昏眼花便倒了下去。后来，巧遇一个中年苗族妇女，给了些玉米饭，长了精神，我们才重新踏上了路程。

抵达廉江县城后，那里唐的同伴告诉我们，唐汉民已经离开了廉江，至少要一周到十天才能转回，我无法在那里等待，就留下一个字条，请他见字立刻赶来岭东区共举大义。

我赶回岭东后，还不到一周，就发生了反动武装乘夜突然进行的大逮捕。

敌人事先显然已经掌握了我们紧张活动的全部情况和预定的暴动日期，并且侦知了唐汉民同志必定先期赶来担任主要指挥。他们秘密调集了反动武装力量，布下罗网，只等唐汉民赶来岭东，就加以截捕，同时乘夜对我进行一网打尽。我们的同志却连一点敌情也没发现。这是与韦汉、何云溪当时“岭东大本营，谁敢太岁头上动土”的自我麻醉思想分不开的；罗醒吾又深居大本营的中心堡垒中，山门村有五十多枝步枪的农民自卫武装力量，他就更加认为固若金汤，大可高枕无忧了。而唐汉民带着两名卫兵大摇大摆地跨进大圩街上时，他根本也没想到自己会踏上暗布的罗网，成了敌人的第一个猎兔。

当天中午，何云溪与韦汉还在学校聊天，根本不知道唐汉民已经身陷囹圄。晚餐后，我在急切盼望唐汉民同志的心情支配

下，信步走到溪边离桥头约一百余公尺的地方坐下来，凝思着暴动开展起来的情景。忽然，在寂静的四周，隐约听见有“嚓嚓”的响声，我定睛观察，看到一列人影，到桥头时分为两路，一队往山门口村前进，一队过桥向学校展开包围。不待我多想，只听几声枪响后，火把通明，枪声大作，并有人高呼活捉特派员吴柱（我当时的名字）。我知道情况不好，便沿着小溪边悄悄向瑶山东冲逃去，一口气跑到东冲罗家，那位罗老忙叫一个人送我进了瑶山。当天深夜，何云溪、韦汉两人也逃到了山中和我会合在一块；后来又听说罗醒吾也逃到东冲，但由于处在紧张时刻，没有机会和他碰面。不久，他被逮捕了。

我和何、韦两人逃到山中后，敌人并未放手，进山部队逐日增加。在形势极端紧迫的时刻，经韦汉同志提议，我们三人分开行动。不幸，他俩被敌逮捕，后来英勇牺牲了。唐汉民同志也不幸遭敌杀害，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暴动没有展开就失败了，无数同志牺牲了，我们缅怀他们。而大革命时期，党内“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带来的危害和造成的恶果，我们却应该永远记取。

（一九八〇年十月）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活

张季任

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一九二七年春。距今虽已半个多世纪，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谆谆教导，以及当时生活、学习、斗争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每一念及就感深深怀念。特写此回忆以志纪念。

投奔熔炉

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尤其是湖南更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同志倡议开创湘、鄂、赣三省农运讲习所，随后三省推派代表至武昌筹备。湖南省对此尤为重视，选派当时省内革命领导人之一周以栗同志前往参加筹备工作。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独北伐军进展神速，工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也都相继进入高潮。毛泽东同志从整个战略考虑，建议把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湖南成立了农讲所招生考试委员会，由鲁子源任主任委员。招考委员会发出招生布告和通知，长沙市和各县进步青年纷纷报

名应考，一九二七年春节后即将举行考试。一九二六年我在湖南长郡中学读书，寒假期间没有回家，和湘潭同学钟少奎一起钻研革命理论，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和钟都是共青团员，志同道合，得到农讲所招生消息，真是喜同雀跃，迅即报名应考。临考前湘潭同学张祯于因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武昌复考落第回长沙，益阳同学胡世英由家来长沙，我们鼓励他二人一同报了名。

考试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礼堂举行，易礼容、鲁子源等领导亲自临场监考。经过笔试、口试、体检后，很快就发了榜，我们长郡四个同学都录取了。记得是元宵节后，长沙各中学相继开学，平日要好的同学为我们饯了行；省团委给我们转了组织关系，考试委员会为考取的同学挂了火车专厢。大约是农历正月二十左右，我们顺利到达武昌，投入了伟大的革命熔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武昌市区并不很宽广、发达，农讲所设在北城角一栋独立建筑的平房里，据说是湖北商科大学旧址，现已成了红巷，被周围街道包围了。

组织概况

农讲所是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但它的组织形式是集体领导，设常务委员三人：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凡出布告、发通知，都是三个人署名。邓演达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在国内有较高的声望。他思想进步，和我党合作得很好，毛委员很尊重他，但他身兼多职，很忙，几个星期才能到所一次。实际上农讲所的一切具体措施，都是毛泽东同志确定的，如教育方针、教学计划、聘请教员、政治活动、学员生活等，样样都亲作规划和安排。至于陈克文，听说他是国民

党组织部的秘书，他任所里的训育主任，会讲话，但他的政治态度暧昧，周以栗同志曾在一次团员会上要我们有所警惕。

所里设教务、训育、事务三个部门，各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其中教育干事人数较多。最受同学们爱戴的是教务主任周以栗同志，他原是办教育出身的，曾在湖南长沙周南女校当过教务主任，调赴武昌前是湖南省党部的组织部长，既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又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是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关心同学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学习各个方面，总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劳地工作着。事务主任是一位实干家，不知道他的姓名，事务方面的工作都料理得井井有条，会计室、医务室也由他领导，同学们的生活也归他直接抓，大家都是满意的。训育主任陈克文的工作比较轻松，除间或在操场上集合同学讲话外，没有兼任什么课程。

农讲所共有同学八百人。因为是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扩大的，所以给这三个省的名额也较多，每省计二百人，共六百人。其余的二百人是十多个省招来的。八百名同学是按军事建制编队的。全所为总队，设总队部，下设三个大队，以下再分中队、区队、班，班长是从同学中选出的，各级队长都是由部队和军校调来的。起初的一位总队长记得姓卢，因他的作风不受同学们欢迎，向毛委员反映了这个意见后，他调走了，改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总队长（姓杨）兼任。杨总队长到职的那天，毛委员在队列前作了介绍后，还给我们讲了几十分钟话，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说没有革命武装就打不倒反动派，就不能保卫农民的利益，革命就不能胜利。他要求大家服从各级队长的领导，严格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为争取革命胜利做出贡献。

同学中在入学时约有团员一百人，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到结业时约二百余。当时吸收团员是比较慎重和严格的。团支部书记范泽淦同学是湖南益阳人，活动能力较强。团支部下分十小组，我担任第二小组组长。除团员外，其余同学都是国民党党员，当时的国民党同学，一般还是比较单纯的。所里设有区党部，具体负责人我记不起了。每星期天都开会一次，团的常会是到附近一所小学召开，对外还是保密的，国民党的常会就在所里开。

生 活 学 习

同学们大都来自各大中学校，过去生活比较散漫，进讲习所实行军事编制后，一切起居作息都得按军事制度行事。清晨军号一响，就得迅速起床，穿好军服，系好腰皮带，打好绑腿，穿好草鞋，整好内务，携带武器奔赴操场集合，进行早操；按号音收操盥洗；再听号声进行早餐。整队入食堂后各就各位，值星队长发出口令：“立正！坐下！开动！”才能开始吃饭。早餐是稀饭馒头，几分钟后，值星队长又下口令：“立正！解散！外边集合！”不管碗里还剩多少都得放弃，迅往操场整队，清点人数后再解散。中餐、晚餐也按此规矩进行。上课下课、出操收操都以号音为准，不得迟到早退。晚上分三间大自习室（每大队一间）自习，或整理笔记，或阅读书报，或参加会议。听号音下自习，仍到操场集合，点名后值星队长讲话，讲完解散到寝室就寝，几分钟后熄灯。这种紧张的军事生活，同学们最初感到不大习惯，但自觉性和进取心都较强，几天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星期天搞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可以上街买点书报和生活必

需用品。团支部会一般都是星期天召开，每次不是毛委员亲自到场作报告，就是周以栗同志参加作指导。

值得提出的是每天中餐、晚餐伙食开得很不错，每餐六个菜，餐餐有大鱼大肉吃，味道鲜美。每每读到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之句，回忆当年所里的生活，不知自己吃过多少次“武昌鱼”，更感到那时领导对我们生活上的照顾和关怀。

以下谈谈学习。

我们的学习原则上是术科学科并重（即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起初一段时间每天进行军训两小时，随着同学们的体质日趋强健和国内局势的逐渐恶化，军训时间也逐步增加，后来每天四小时，甚至整天练兵习武。我们每人发了一枝全新的步枪，三十排子弹（一百五十发），全是同学们到汉阳兵工厂抬回来的。还发了一套斜纹布灰军服，腰皮带、绑腿、斗篷、雨衣、军毯、水壶、饭盒等等，全副武装上身有几十斤重。在操场练好基本动作外，还习以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书本军事课。我们多次到野外进行作战演习、实弹射击等。结业时，每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军事素养和杀敌本领。

政治学习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讲课的人都是当时的著名革命家和理论家，都有很高的水平。毛委员亲自讲授农民问题的课程，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考察湖南五县农运后，回武昌经过整理写出来的一部光辉著作。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幸运地最先聆听到他的亲自讲述。他讲得那样通俗、生动，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就象我们都亲临其境，使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在说到“矫枉必须过正”的时候，他用

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根向右弯的杆子，随即向左又画了一个弯，最后在正中画一直线，一边画一边讲：要把这根杆子搞直，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狠扳几下，才能使它直起来，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通过他的讲课，农运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得到明确，一些混乱思想得以澄清。

周以栗同志除在各种场合经常给我们讲话外，也兼了一些课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他讲授的，对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说得很透彻。这个宣言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共产党人协同孙中山先生写出来的，是当时指导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那时是必修课程。

恽代英同志当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主持教育事宜和政治工作，经常来我所讲课。他对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和革命党人应有的品德修养等，都有极为精辟的见解。

郭沫若同志到所讲课的时候也多。他揭露蒋介石叛变的阴谋和罪行，是淋漓尽致的。他还讲述了脱离蒋介石到武汉来的前后详细经过。他说话幽默动听，教学效果甚为良好。

彭湃同志也曾多次来所讲课，他个子矮小扎实，满面笑容，语言风趣，讲的是农民运动的方法和策略，并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具体经验，在同学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所里还聘有两个苏联教员（一男一女），讲课内容包括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合作社的意义和组织，以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方法等，他（她）们上课时都是由张太雷同志当翻译。后来苏联教员先行离去，就由张太雷同志亲自给我们上了几堂课。他理论修养深，举止文雅，风度不凡，很得同学们尊敬。

李季、施存统两位的课都是有关马列主义理论的，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丰富，见解精深透彻，极有说服力。

李汉俊是当时湖北省教育厅长，他讲教育问题，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那黑皮包里装满了各种资料和教材。

夏明翰同志是“马日事变”后由湖南避难来武昌的，后来在农讲所任教。他主要讲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说得很有条理，他把提纲写在黑板上，便于大家作笔记。

周佛海一身军服穿得整整齐齐，他专讲《三民主义》，口若悬河，抑扬顿挫、很有节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门课是不可缺少的。谁料周本人后来竟成为一个大汉奸。

另外还聘了某学校一位女教员，兼教我们的音乐。她的声音嘹亮清脆，音乐根底较深，教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

政治教员中大约还有两三个我记不起姓名了。农讲所有这样多的好教员，这样丰富的教学内容，对培养农运干部，实在是最好不过的条件。

开 学 盛 典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是农讲所举行盛大开学典礼的一天。在这以前，所里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已进行了一个多月，这是补行的仪式。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操场里搭起了一座雄伟的主席台，对联、彩旗、标语，在阳光下分外耀目。同学们一律穿着新发的制服，腰系光亮的新皮带，打着人字绑腿，脚穿新草鞋，个个精神抖擞，喜上眉梢。早餐后在响亮的号声中，我们

迅速奔向操场整队。各大队值星中队长向总队值星报告了人数。参加典礼的各省代表、武汉各党政机关代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包括英、美、法三国代表）、各位教员和来宾共数十人，徐徐走进操场，邓演达先生和毛委员走在最前面。总队值星钟若章同志以宏亮的嗓音喊了一声“立正”后，跑步向邓演达报告总人数（毛委员身着蓝布长衫，邓演达全副戎装，在军事礼仪上只能向邓作报告）。随后，参加典礼的领导、教员、代表、来宾等一齐登上主席台。仪式开始，奏军乐，鸣鞭炮，热闹非常。毛委员主持典礼，邓演达致开幕词后因事退场，接着周以栗同志报告筹备经过，他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的，筹备期间，修葺校舍、添置校具、聘请干部教员、制订教学计划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大家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全心全意为农运工作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

毛委员一一介绍台上的来宾和代表，所有在台上的人都发了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劳工代表汤姆，他身体肥胖，谈笑风生，逗人发笑。凡外宾讲话，都由教育干事朱正为同志翻译。最后一个讲话的是湖南省农运协会委员长易礼容同志，他似乎感到有点为难，他说：“要说的话，以上的同志都说过了。”但他还是简单、扼要的说了一通。随后同学代表致了答谢词。毛委员作了总结。当时的人在会上讲话，都不带发言稿，几十个人中没有一个从袋子里掏出稿纸来，但是都说得那么流利、恳切、中肯、动听，很有教益。

开学典礼持续了几个小时，同学们全神贯注，没有一个感到疲倦。典礼结束时，还举行了阅兵式。最后照了一张集体像，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圈，本所领导及来宾等坐在前排，摄影机架在正

中，镜头徐徐旋转，转到三百六十度全部摄完。后来洗印出来是一幅长达数尺的长条照片，我们当时觉得很新奇。

通过这次开学典礼，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操练时精力更加充沛，所里纪律秩序也更加井然。

声 讨 蒋 贼

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就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妄想一举消灭共产党。出师北伐后，他一直不到湖南和武汉来，盘踞江西，连续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不少流血惨案，其后率部东下窜占南京、上海。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纷纷通电声讨。四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三十万人参加声讨大会，农讲所同学全体参加，同学代表登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发了言，决心与蒋贼斗争到底。我们还组成宣传队，分赴街头巷尾宣传蒋介石的罪行，唤起人民一致讨蒋。

蒋介石的爪牙无孔不入，伸向各地进行破坏活动，农讲所里也不例外，所里有部分工作人员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的。我党经过周密部署、深入调查，查出一名五十多岁的教育干事（忘记了他的姓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在同学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破坏活动，个别同学也成了他的同路人。一天晚上，周以栗同志主持一个批判会，忽然电灯不亮了，经查是他的同伙干的，好久才得修复。后来这个干事和一名思想反动经常捣乱的同学被逮捕送法院惩办。周以栗同志在团支部会上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时，要我们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注意做好保卫工作，绝不能麻痹大

意。

在农运高潮中，湖南一批大恶霸地主窜到汉口，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同时与武汉政府中的右派分子拉拉扯扯。我们的同学倾悉这种情况后，经报告领导同意，立即荷枪到汉口大旅馆里搜捕了几十个大土豪。逮捕前，他们还在玩弄妓女、饮酒作乐，抓获后给他们戴上高帽子，脸上抹得乌黑，游街示众。将这些土豪带回农讲所时，正值彭湃同志在讲课，他认为这一行动很好，但说脸上不要涂黑了，才能显出他的本来面貌。后来这几个土豪也送进了法院，这是从社会上拔除蒋介石的根基。

通过声讨蒋介石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我们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敌情观念。

麻城平乱

五月初旬，湖北麻城县的土豪劣绅凭借封建武装红枪会发动暴乱，向农民协会猖狂进攻，杀害一些干部和农民。武汉政府坐视不理，毛委员毅然派遣同学二百人，由大队长傅杰同志率领前往平乱。傅杰同志是湖南宝庆（现邵阳）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有勇有谋，作战经验丰富，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平叛队伍出发时，全所同学整队送至长江岸边，被派去的同学个个全副武装，怀着愤怒的心情登上轮船。周以栗同志带领送行的同学高呼口号，出征的同学也同时喊起口号来，“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坚决镇压反动暴乱！”“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誓为农民利益奋斗而牺牲！”船上岸上一片口号声，轮船徐徐驶动，离岸已远，口号声音还此起彼落，响彻长江两岸。

经过约近一个月的清剿，平叛队伍消灭了反动武装，枪毙了

匪首，彻底平定了麻城的暴乱。六月初，傅杰同志率领二百名同学胜利班师，回到武昌农讲所。当天下午所里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周以栗同志在会上致欢迎词，高度评价了这次平乱胜利的伟大意义，对出征干部和学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傅杰同志介绍了平乱的经过情况后，强调要保卫农运成果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建立坚强的农村政权和强大的农民武装。他们两人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掌声。大会进行中天下大雨，台上台下仍冒雨坚持到最后一刻，并无松懈情绪。

保 卫 武 汉

北伐战争继续向前推进，河南的郑州、许昌等重镇相继被攻克，武汉是远离前线的后方了。蒋介石虽已叛变，但他盘踞的南京、上海，隔武汉很遥远，在军事上还不至于对武汉有所威胁。所以对当时的一些措施，我们难以理解。

五月中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有几千人）和我们农讲所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农讲所的学员，除派往麻城二百人以及在所体弱带病的以外，编成一个正式营（三个连），营长是由武汉分校炮兵大队长调来担任的，有两个连长也是新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我们白天的军事训练加强了，晚上登上蛇山及武昌城进行警戒，并派队在城内巡逻。

我编在第一连，每晚都要出动，由排长杨子江、麦连登轮流指挥，通宵达旦地在蛇山或武昌城上认真警戒，俯瞰武昌城外，观察过路行人，连每支手电发出的亮光等都认真察看。早晨收哨回所，全身总是透湿的，即使不下雨，露水也会把衣服打湿。

原来，反动派在湖南、湖北等地都在酝酿叛变和捣乱，毛委

员和恽代英、蔡和森、叶挺等同志洞察其奸，果断地采取了应变准备，以防发生突然的动乱。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记得是五月二十日前几天，我们奉命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出发。队伍还没有开出武昌城，又传来就地待命的指示。我们按原队形席地而坐，时间不久仍返回了农讲所。这是因为驻在湖北宜昌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反动势力策动下，叛变了革命，率领六个团的兵力猛扑武昌。消息传到国民党中央，他们公然说：这是共产党惹出来的是非，你们共产党去抵挡。陈独秀平时只相信和依赖国民党，这时束手无策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委员等当机立断，马上派中央独立师和叶挺同志掌握的教导师，奔赴前线应战。

夏斗寅的部队是乘火车来的，在离武昌三十华里的纸坊下车登山，向武昌扑来，恰好碰上我们的部队。武汉分校的学员、叶挺同志的学兵，个个象出山老虎猛打猛冲，不到两个小时就打得夏斗寅叛军落花流水，只在一个山窝里遇到较顽强的抵抗。后来叶挺部的作战参谋给我们作报告时说，那里碰到的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他们的警卫部队为了保护头头逃命，作了一下最后挣扎。

农讲所的同学是中央独立师的组成部分，武汉分校的学员走在我们之前。我们是在前线大获全胜之后返回农讲所的。如果战斗再持续几个钟头，我们就可参加战斗了。我的老同学、叶挺部的吴福全和武汉分校的张维德，事后带着胜利的喜悦来到我所，畅谈作战情况，真感到痛快淋漓。可惜我所摆在预备队的位置上，没有上去冲杀，太遗憾了！

两天后，我们全所同学开赴纸坊侧山学习实战经验。叶挺部

的一位作战参谋（年约四十多岁，蓄点短胡须）给我们详细讲述战斗经过，敌人如何分兵上山，我们如何迎战，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如何发扬猛烈火力，都讲得非常生动具体，还将敌人低落的士气和我们旺盛的士气作了对比。最后他说武汉分校有的同学单凭一股革命热忱，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招致了不必要的负伤，大家应该吸取这一教训。通过这次实地参观和学习，我们提高了实地作战的水平，也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重性。

这天晚上，我们在山地宿营，第二天到达武昌城侧的南湖，在一块大坪里集合。整好队后，郭沫若同志到场讲了话，主要是追述北伐军攻克武昌的经过，因为武昌城墙高大坚固，北伐军几次攻城没有攻破，并受到损失。后来只好先攻下汉口、汉阳，再部署兵力回攻武昌，攻城的主力是叶挺的独立团和军校同学。他们几次冒着枪林弹雨抬着云梯去爬城。云梯短了，再用几架梯子绑接起来才够高度。敌人居高临下，密集火力向下扫射，牺牲了我们不少同志，但是北伐军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终于攀登上城墙攻克了武昌。我们的同志流了不少鲜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夺得最后胜利。他说烈士的鲜血是革命的肥料，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开花结果。他又说，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决不允许反动派兴风作浪，来扰乱我们的后方，来篡夺我们的胜利成果。要百倍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打击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听罢他的讲话，更坚定了我们保卫武汉的决心。

赴湘应变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多钟，同学们在农讲所的课堂里坐得整整齐齐，只是上课的教员还没有到，大家都在等待着、猜测

着，但课堂仍然是肃静的。忽然，毛委员亲自走上讲台，同学们感到有些惊异，因为课目表上没有安排他的课程。毛委员环视了全体学员后，开始发问：“昨晚我们所里来了‘暴徒’，你们知道吗？”大家都打人了闷葫芦中，不知所对。沉寂了一会之后，毛委员说：“昨晚我们所里教育干事朱正为同志的父亲朱剑凡同志，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夏明翰同志等，都在所里歇宿。他们都是‘暴徒’。”我们更是惶惑不解。

接着毛委员说：“湖南在五月二十一日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蒋介石、何键的指使下，带兵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妇联……等，都遭到突然袭击，留在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一经抓住立即枪毙，都说是‘暴徒’。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朱剑凡、夏明翰等同志是幸脱虎口的‘暴徒’。我们不能容忍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不能饶恕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我们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把反动气焰压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同学们听罢，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纷纷要求派赴最前线，誓与反动派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经过毛委员和周以栗等同志的精心策划，决定先派部分学员回湘，协同地下党恢复组织，联系失散人员，积聚力量，开展斗争。六月初，团支部书记范泽溢同志通知我，即日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参加短期学习，准备提前回湖南。

参加这次学习的约二十余人（都是湘籍），学习场所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后门外山顶上的一栋三间屋独立房子里，四周有围墙，不会走漏风声。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精明能干、知识渊博、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但始终没有介绍姓名。学习内容包括：自

制简易炸弹、装拆和使用铁壳手榴弹与驳壳短枪、近战的要点和方法、敌情的判断和侦察、秘密的通讯技术……等。学习期间恽代英同志到场作过报告，分析当前形势，传达党的政策精神，勉励大家鼓足勇气，坚定信心，为挽救局势作出贡献。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学习，我们回到了农讲所，所里开了欢送会，毛委员召集大家训了话。

我们来到都府堤四十一号毛委员的住所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左右，毛委员忙别的事去了还未回来，我们在他卧室等候约二十分钟。屋内陈设简单：一张很普通的床铺，几条板凳，一张办公桌摆在正中。我们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板凳上。杨开慧同志热情地给我们端了茶，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还是几岁的孩子，天真地在我们身边穿来穿去，但不顽皮，不吵闹。房子里点了两盏煤油灯，可能是我们人来得多，比平时多点了一盏。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为什么不装电灯，后来认为大约是因为那时常常停电，下半夜又不一定供电。而毛委员每每是干通宵的，点煤油灯倒是可以保证他工作顺利进行。

少刻毛委员回来了，岸英兄弟连忙退到里屋去了。随即毛委员对我们讲话，首先介绍了他连日来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进行说理斗争的经过。谭延闿认为湖南现在很乱，主要是农民闹事，甚至攻打县城省城，这样搞要不得，应该平息下来。毛委员驳斥他的谬论，说农民的行动是许克祥等大肆屠杀革命人士、摧毁革命组织才激起的，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如果只许许克祥杀人，别人不能还手，那世上就无公理可言了。政府当局对许克祥等人的反动变乱不独不予惩办，反而责怪农民，实在使广大革命群众寒心！毛委员接着对我们说：“湖南的事情已经不是局部问题

了，国共合作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全国规模的反动逆流，正在酝酿和发展。我们要独立自主，坚决斗争，保持革命阵地，争取最后胜利。对国民党政府不能再抱任何幻想。真理在我们手里，广大工农群众在我们一边，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今后不管要经过多少艰难险阻，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你们回去后，要服从地下党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和情况，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经过一个多钟头的训话，我们对整个局势和自己肩负的任务有了彻底理解，更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怀着依依之情，辞别了毛委员回所。

当时湖南笼罩着白色恐怖，这些同学只能分散陆续启程，有的改穿便衣，有的仍着军服，都各找其他单位的“合法”证明，以作掩护。我在武昌城外右旗兵房一位姓喻的同乡营长那里搞了一份放行证，大约到六月十五、六日，我们先后离所回湘，作为先锋奔赴新的斗争岗位。

× × × ×

六月十八日农讲所举行了结业典礼。至此，八百名同学，带着毛委员的叮咛和人民的寄托，分手驰往不同的地区，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五十五年过去了，有的同学在斗争中英勇献身，有的在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运动中去世，留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健存的同学互相勉励，永远记住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农讲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我所认识的赵一曼同志

方 艾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由东三省《商报》转到哈尔滨《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一天，同我单线联系的伯阳同志给我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我很好地利用副刊，来作为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我那时刚参加党内工作，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也不深。选用来稿和自己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审批，完全由自己决定的情况下，有时这个可利用的刊物也就不能完全合乎党的指示。

有一次伯阳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内容和写法都存在问题。他提议要给我介绍一位同志，让我好好向她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表示欢迎。

经过不少日子的一天上午，伯阳来到报社找我，他说要给我介绍的这位同志正在公园等待同我接头。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同伯阳前往公园。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道向北没有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

望着里边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走近她不远，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她慢慢站起来，在我们走到她身前时，她先让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伯阳做了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就是他和她讲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伯阳说，他称李洁为李大姐。她比我大一岁，我也称李洁为李大姐。从她的口音中，可以听出她是具有很重的四川乡音。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李洁同志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同志。

自从这次和她接头后，她就常到《国际协报》找我，在我住的一间单人宿舍里给我讲授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最初真是象老师一样，我的精神稍不集中，她就提醒我注意，还提出问题重点要我回答，检查我是否记住和了解的程度。有时还让我谈谈心得体会。

她很谦虚，有一次她说，她学的革命理论，掌握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时讲得不一定十分完全，解释得不一定十分正确。

她说，她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间很短，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组织派去学习，一九二九年一月党组织调回工作，只有一年多，三个学期。那时学校国共两党学生斗争尚未结束，斯托两派学生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她是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还一面刻苦研究俄语。所以在革命理论方面，没有能集中精力学习，所知道的还不多，可以说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也快都讲完了。她让我再找书看，好好自学。

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你自以为是沧海之一粟，我却感到犹

如爬珠穆朗玛峰，尽力攀登还不知何时能达到峰顶。”

她听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将来如能到苏联去学习几年，你回来我们再在一起工作，我还得跟你学习，你所学得的可能真成为珠穆朗玛峰了，我还得继续象你这时一样努力攀登。”

经过多日，我在乐天照像馆孙乐天处借到一本布哈林著、译成中文的《列宁主义初步》，她看到了，问我是从哪里借的。我对她如实讲了。她告诉我布哈林已经成了右派，他的著作，在苏联已被禁止阅读，只可做为研究参考，不能认为他写的都正确。

一九三二年哈尔滨的冬天，比往年都冷，大雪降了几尺深，天空还是冻云不散，阳光透露的时间不多，北风呼啸，雪花时飘。我住的单身宿舍是在一幢二层楼上，是同邻居共烧一个壁炉取暖。这个邻居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夫妇。他们夫妇不常在家，他们有时不升炉火，我也不升。我的宿舍就常冷冰冰的，寒气逼人。我那时穿一件呢大衣并不感到如何冷。可是她每次来时穿一件皮大衣，还说我的宿舍很象冰窖。有一次她批评我懒，要去代我烧壁炉，我感到难为情，我就开始总把壁炉烧得很暖。王岐山的女人感到宿舍温暖，她就常留在家，不再外出。一天午间，一曼同志正在和我谈话，这个女人没有敲门，就推门进来，她看见一曼同志竟一愣，向我挤了挤眼，就退过去了。一曼同志感到很奇怪。我对她说，这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的小女人，人很年轻，也很风骚。她说，她看过《五日画报》常登一些时髦女人的像片，有些文字也不怎样进步。王岐山能爱这样一个女孩子，也可见他的为人。她还问《国际协报》编辑长王研石和王岐山是不是弟兄，我说不是，有个外勤记者叫王凤山的，他们是弟兄。她

说，她常看见王研石在大街上，拎着一个文明杖，有一种绅士派头。我说王研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他是有意摆架子，他的内心还是爱国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曾向关内报纸发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她告诉我，只要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走上革命道路。

一天深夜，我睡得正熟，一阵急促敲门声将我惊醒，我立刻打开灯，没有顾得及穿上衣服，只着一条短裤，赤着身子就去开门。门一开就有一个面貌似曾相识的日本人，用冰冷的勃朗宁枪口触到我的胸膛，我急忙闪在一边。跟在他身后进来的有两个朝鲜族人，一个中国人，我都未见过。他们站在屋内巡视了一番，见只是我一人站在一边，那个中国人拿着一张像片，看看像片，又看看我，对那个日本人说了两句什么，这几个人就都转身向外走去。我关上了门，听见他们又在敲邻居的门，声音也是很急促，很大。

我躺在床上，不晓得这些日伪走狗是什么意图，却感到很庆幸，他们在室内没有进行搜查，因为在我的床铺下还藏有党让我转发的几本文件和一捆传单。他们没有发现，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不得安生了。

第二天上班，听同事们议论，才知道他们是在搜寻一个被绑架隐藏起来的人。

这天下午，一曼同志来找我，我对她讲了夜间的事。她让我不要再在报社宿舍里住，最好找一俄国家租一住处，那样比较安全。她说，她是住在俄国一个老太婆家。这个老太婆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她。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太婆象对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老太婆感

到安慰，她也感到幸福。老太婆很富裕，一切费用都收得很少。看她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用过和没用过的衣服借给她穿。她说，她穿的这件皮大衣就是这位老太婆借给她的，她不穿，这位老太婆还说，你挨冻，我心疼。

我根据一曼同志的意见，去找了几个俄国家，都没有找到可住的地方，我就搬到马街一个波兰女人开设的瓦尔沙瓦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这个小旅馆房间不多，地址又偏僻，旅客很少，生意也很萧条。日伪的宪兵警察暗探特务都不注意。我住在那里以后，伯阳去看我几次，他知道了这种情况，也在我的房间对面租了一个房间，他住在那里不久，又有一位吴健同志也来和他同住。一曼同志来看我时，给我讲些问题以后，常到对面房间去看伯阳和吴健。有时我也和她同去，认识了吴健。他有三十多岁，是上海工人，在上海参加过三次工人起义。他额上有一块伤疤，据说是在上海一次浴血斗争中留下的纪念。他常给我讲他的革命经验，还教我唱革命歌曲。

伯阳和吴健常换上工人服装，到三十六棚工厂和车辆厂的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有时一曼同志穿着朴素衣裳也与他们一起去。有几次我和她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都向她亲切地打招呼，不让她买票，也不让我买票，下车时还不住向她挥手送别。

一九三三年春节前一天，有两位三十六棚的工人给伯阳和吴健送来半袋面粉和一盆和好了的肉馅，让他们在除夕包饺子吃。这晚，一曼来了，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也来了。他们让茶房借来面盆、面板和擀面杖，和好面，在对面房间里，就一面谈笑，一面包起饺子来。一曼同志也让我前去参加。我说我不会擀，也不会包。

她就让我摆饺子，下厨房烧水。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候在家过三十晚上的情景，我们这几个江南海北的人，竟亲如一家在一起过年了。

元宵节，我买了几斤元宵，有枣泥馅的，有山楂馅的，有玫瑰馅的，请她吃。她吃得非常高兴。她第一次问起我的身世来。我告诉她，我生在辽河西岸一个小村子的雇农家庭。父亲在二十八岁时，还在地主家里当长工，不幸得了中毒性痢疾，没经医治就去世了。我当时还不满四岁，我的母亲三十二岁。她为了把我拉扯大，每天起早贪晚给人纺线，维持困苦的生活。幸而还有伯父、叔父、舅父有时帮助。在七岁时就开始入私塾读书，都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前程的人。我在私塾八年读了不少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的是孔孟之道，看的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农民。考入县立师范，因为反对教员，被学校开除。进入日本学校，参加反日运动，逼死校长，又被学校开除，还被通缉，遂弃文就武。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队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感到国家要亡，人民受难，这才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听后，对我很同情。她也谈起自己的身世，说她是川南地主的女儿，和我这辽西雇农的儿子，正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后代。可是她马上又说，她虽是地主的女儿，也受地主的压迫。因为在十岁时地主父亲死了，哥哥是家长成了地主，对她是事事限制、压迫，读了几年私塾，不准她去上中学，还要强迫她嫁人。她忍无可忍，就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她哥哥种种罪恶，发表在一个妇女刊物上，从此她就和地主家庭断了关系。她有一个姐夫是共产党员，培养她，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又帮助她考入了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以后，

党把她送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残害时，党又把她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在家乡工作，然后又到上海、江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在沈阳工作不久，就来到了哈尔滨。

她说，她在私塾也读过四书五经，还读过唐诗宋词，学过作八股文，作诗，作词。可是她非常反对孔孟之道，因为孔丘说过：“惟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孟之道竟将女子比做小人，她极端痛恨。她说，她到哈尔滨后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她当时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是这样八句诗：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我和她相处多日，只知她性格刚毅，语言豪爽，思想先进，行为坚强，对同志热诚，对敌人痛恨，是一位很少见的巾帼英雄，还不知她对文学有这样素养，对写诗有这样才华。

从这次彼此谈了身世，又谈了诗的写作之后，她再到小旅馆去看我时，除谈革命问题，还谈起文学问题。她说，对中国作家，她最爱读鲁迅作品，对苏联作家最爱读高尔基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很喜欢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她说，有一次在中央大街和伯阳一起走，遇见了一对青年男女，伯阳认识他们和他们谈了几句话。然后伯阳告诉她，青年男人是三郎，青年女子是悄吟。这是她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也常在大街上见到，两个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一双男

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进，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给她印象很深。她说三郎和悄吟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想性强，文笔风格艺术性也很高，他们夫妇可以说是两位革命作家，不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我说，他们夫妇我都认识，我知道他们已经和党内几位同志常有接触，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他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过。我当时还和她讲了，我和三郎在沈阳一段经过。那时我们认识了一位党内同志，他要介绍我们入党，他给我们写了一首长诗，有几句是：“嗟尔二兄弟，飘零何所适，一朝秋榜发，相顾悲失意。”我记得三郎对他这样说过，我们所做的事和写的文字，只要对读者有益就好，至于榜上有名无名，我们就不想它了。这个同志以后就没有再提。三郎也许还是这样想，悄吟是和他夫唱妇随。一曼同志听我说了之后，想了想，很深情地说：“你有机会应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战果也大。”

瓦尔沙瓦小旅馆女主人有一个女儿名安娜，年十七八岁，在专为俄国人设立的女子中学读书，她学的课程中有汉文，她有时到我的房间问一些她学的汉文问题。我的俄文是跟一个俄国少妇罗茜学的，刚学过半年，用俄语解答汉文问题很困难，用汉语解答她又不能完全听懂。有一次一曼同志遇到了，她用俄语给安娜做了解答。她们这时开始认识了，安娜以后常和一曼同志接近，她们竟成了朋友。一曼同志知道我还在学习俄语，她有时就给我纠正俄语发音，教我俄语语法。她知道我会日语，她教完我俄语，要我教她日语。她说，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学些日语有用。

三月间，《国际协报》营业发达，报纸由一大张四版，改为两大张八版，增加了收入，给我在报社对面租了一个带有厨房和浴室的房间。社长张复生还让他的女儿亲自催我两次，为了不辜负他的善意，我就搬出了瓦尔沙瓦小旅馆。

四月初，一曼同志和伯阳、吴健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全市电车停行了数小时。这次大罢工震惊了日伪统治集团。在报纸上发出消息后影响很大，共产国际杂志也刊载了报道。它鼓舞了全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精神，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支援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热忱。

大罢工以后，汉奸走狗、宪兵警察和暗探特务都忙乱起来，昼夜不息，到处侦查革命活动。这时伯阳和吴健也离开瓦尔沙瓦小旅馆，搬到另一个地方，一曼同志不再去那里接头，也不常来找我。

五月，哈尔滨有了春日的气象。一天中午，一曼同志穿了一身很华丽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到我住的新地址找我，她的脸色丰润了些，嘴唇象薄薄地涂抹了一层口红。她邀我到松花江上去划船。我正在给人修改一篇稿子还未完成，为了不打断她的情兴，我就陪她去了，走到江边租了一只小船。她坐在一头，我坐在中间，划着双桨，就向太阳岛驶去。她望着微波荡漾的水面，若有所思，低低地唱起扬子江上流行过的一曲船歌。她唱完了，似在叹息地说：“很久没有坐过小船，划过小船了！还是在宜宾女子中学时，和同学们曾在金沙江、岷江和长江汇合的江上多次坐过，多次划过，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我还怀念那时的情景。人们都说哈尔滨是美丽的城市，这只能说是人工美，并不是自然美，哈尔滨有江没有山，我们的家乡有江又有山，才真是江山多

娇，江山如画。”

船到中流，我慢慢地划着。她还似在微风拂煦中浮想联翩。她说：“王维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就不是这样。我是身在异乡非异客，每逢佳景倍思乡！”他问我：“林郎，你说人生如梦，还是如戏？”这是她第一次称呼我的笔名。这个人生问题，我是已经理解了。我说：“人生如梦，这是李白的思想，他的诗文都说过，‘人生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如戏，这是曹雪芹的思想。他的词中有：‘今嫌紫蟒长，明日锁枷杠，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都是旧时代的人生观，新时代的人生观就不应该是这样，不仅不象对自然社会那种看法，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里应该是为全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斗争，一个人应该做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象马克思那样，象列宁那样，才是正确的人生观。”她听我这样说，她竟看着我大笑起来，我认识她以来，她未曾有过那样的笑。她笑着说：“我给你讲了这么多日子，看来还没有白讲。不过认识是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啊！你没看到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是在梦想做大人物，有名有利，还不是在争着要演帝王，作威作福。”她沉思了多时，她又问我：“你知道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谁在指导中国革命？在瑞金的中共中央谁在领导中国革命？”我那时是都不知道，文件上都没有提过，我只摇头抱歉似地笑了笑。

她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是米夫，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又是中山大学校长。他自称是中国通，写了不少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他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他是中山大学学生中所谓二十八宿最拥护的人。现在瑞金中共中

央究竟主要一些领导人是谁，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有拥护米夫二十八宿中的一些人。方才我们说有的人把人生视作大梦，有的人把人生当为演戏。在中山大学有人演过床下人，现在在中国竟又演别的角色了。”我问她是谁。她给我念了四句打油诗：“四川陈爱山东秦，不耻甘为床下人，只要学通关系论，还能攀附上青云！”我有些不清楚，她又做了注释，她说姓陈的，爱上姓秦的，藏在姓秦的床下求爱，被同学们发现了，就给他起个绰号叫床下人。这个床下人俄文很好，常给米夫校长做口头翻译和文字翻译，他又是二十八宿中的健将，就得到了米夫的重视和重用。

关于这首打油诗，我以后在苏联学习时，有一位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丁山同志，他也对我讲过。

小船划到太阳岛，我们停泊上岸，岛上没有几个人，空落落，冷清清的。我们走向俄国人开设的餐厅，走到近前，餐厅还未开张，我们都很扫兴。就回到小船停泊的地方。她先上了小船，操起划桨，她要划一划。她说：“该练一练，有时可能有用呢！为革命什么都得会。”我坐在一头，她划起来，划得不怎么熟练，划了一时好象还很吃力，脸发红了，呼吸也有些急促，可以看出她的身子虚，没划到江心，她的额上出了汗。我就不让她划了。她喘吁吁地说：“我再划一划。”我没有让，她就不划了。我们换了位置，她坐下后就掏出手帕擦汗，还轻轻咳嗽了两声。我把小船划到南岸，交了船，我请她到游船俱乐部去看一看，她说，她感到有些累不想去了。我们沿中央大街走了一段路，她说她要去找一个人，我们就分手了。

有很长一段时期，一曼同志没有来找我。伯阳说她到外地农村工作去了。当时我很为她担心，她是一位南方人，不熟悉东北



农村情况，并且她的四川口音未变，很容易被人发现是外乡人，使人怀疑，暴露身分。没有想到她富有农村工作经验。在她从外地农村回来看我时，她对我讲，这次工作很顺利，还很成功。我看她的身体很好，精神也仍旺盛，只是脸色晒得黑些，嘴唇干得起了皱纹。她说：“很多同志把部队搞起来了，打了不少胜仗，游击队，一天比一天壮大。我想留在那里长期工作，因为未经组织同意，我就回来了。汇报工作以后，又做了请求，到部队去，拿起枪杆战斗。你学过军事，应去用武之地，不然，岂不是白学了，我们一起到游击队去吧！”

这次一曼同志说得非常恳切，我也非常动心。不久以后我就对伯阳说了。他说，党组织搞宣传的同志们正在研究，想象北平一样，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分会。让我等一些时再提请求。这样我就等待起来。

大约是在七月间，一曼同志又一次来，她问我请求到游击队去，组织是否有了指示。我说指示过了，让我等待。她笑了，她说：“你哪里是等待，你是在留恋。留恋一个年青美貌的人，你没有决心去，我已经看到了，你们在一起划船，在一起游泳，在一起散步，在一起进咖啡馆。你还写过几首诗，在你编的副刊上发表。有一首我记得是：松花江水日粼粼，不似今朝处处春。画桨双飞波影里，妒煞多少荡舟人？我也听说了，她是一位女大学生，又是一位处长女儿。你可能是爱她这些，她可能看你是报馆编辑，能写一点文章。不过，你应当知道，爱情是人类男女感情中最高尚，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男女间产生了这种感情，彼此必须志愿理想相同，性格爱好一致，这样对生活，对革命才能有益，有帮助。不能只看到年青，貌美，金钱，地位，学识，

名望，应知这些都是容易变化，一旦变化了，爱情也会跟着变化，就不能同甘苦，共患难，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你应为生活，为革命，好好考虑。”

她这样热诚忠告，使我很受感动，也非常感激。她提高了我对爱情与生活，爱情与革命的认识。

八月一日早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还躺在床上构思一篇杂文没有起来。这时一曼同志来了。我急忙下床穿好衣服，请她坐下。她笑着批评我说：“你真马虎，天亮了，你还没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我不晓得。”她说：“这是我们党有了自己正规军队的日子，你都不知道，可见你对党的历史太模糊了。周恩来、朱德你知道不？”我说：“这我知道。”她说：“一九二七年这一天，就是他们在南昌领导起义给党建立了正规军队伍工农红军。我们都学过军事，还要参加军事工作，连这个伟大日子都不知道，哪行？”对她的批评，我只是惭愧地笑了笑。她又做了自我批评说：“也怪我，我以为你对这个日子很清楚，我没有给你讲过。”一曼同志平时就是这样善于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那时哈尔滨的中共党员不只是新党员，就是老党员对于中共党史也不都十分清楚。因为那时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党史，所有的文件也只是片片断断的叙述。

这一天，她第一次给我一个工作任务，是给总工会的《工人事业》报修改稿件。她让我在这个星期日上午十时到道外桃花巷报牌前和一个左手拿着台湾草草帽在看报的人接头。由这个人给我交来稿件，修改好，再订地点交还他。以后我照办了，和这个人接过几次头，修改过几次稿件，其中也看到了有一曼同志写的声讨汉奸罪恶的文章。

九月十一日晚间，我在卧室灯下，坐在桌前，打开像簿，望着上面母亲的遗像，回想童年时期一些往事，母亲的辛苦，母亲的慈爱，正两眼满含热泪，感到悲痛的时候，一曼同志她轻轻地推开房门，缓缓地走进卧室。我忙站起将像簿放在桌上，一边拭泪，一边请她坐下。她坐在桌前，很惊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我坐在床边唏嘘着，还没有回答，她看见像簿上母亲的遗像，忽然明白了，就安慰我说：“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满二十七周岁了，还淌眼泪的，你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给多灾多难的祖国，给多灾多难的人民多做些工作，才对得起自己的生身母亲。人们不说过么，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流泪有什么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流泪，这一点你应当向我学习。”我说：“我也不想流泪，也不愿流泪。可是有时想起亲人，想起好友，就不由得眼泪涌了上来，这可能是我生理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向你学习。”

她忽然象想起什么似地说：“古人说，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又说，泪为生别滋，你和亲人们，朋友们分别时也都流泪么？”我说：“对亲人们只和我母亲，姐姐，妹妹分别时流过泪，对朋友只和一二知己分别时流过泪，并不对任何亲人，任何朋友都流泪。”她叹息了一声说：“唉！我今晚就是向你告别来了，不知你流不流泪？”我听她说来向我告别，就不由得心一动，忙问道：“这是真的么？”她回答说：“当然是真的，我的请求，组织已经同意。你怎样呢？还在等待？”我说：“可不是还在等待。这回你能走，我就不等待了，跟你一同走。”她急忙说：“这可要不得，一个党员无组织，无纪律还行？”我说：“那么，我就在这里等待。”她说：“我就到那里等你。”

她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流泪，这时她的声音可有些变了。我是尽力忍着，不想什么。她坐在桌前，我坐在床边，谁也不看谁，都不知再说什么。她沉思一时，从笔筒取出一支水笔，打开墨盒，抽出一张稿纸，一边想，一边在写。她写完了，自己又看了几遍，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我一看在稿纸上写的是《赠友留念》三首五言绝句：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今朝苦别离，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我把她写的诗看了两遍，使我感到这不是惜别，还是对我进行教导。我想也写一首回赠，可是想了多时竟一句也想不出来。我就想到一般分别的情景来。我对她说：“你给我写诗留念，明天我给你饯行，喝几杯酒做个纪念吧！”她说：“我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走，我也不想喝你这时秘密的送别酒，你如不离开这里，等我带着队伍解放了哈尔滨，那时我再喝你公开的欢迎酒吧。”

接着她又讲起革命根据地一些发展扩大的情形来。她说，只要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努力，不仅会很快驱除日寇解放哈尔滨，解放全东北，还可以很快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她越说越有精神，我越听也越高兴，也就忘记了一切。只想革命胜利在望，自己将如何积极工作，一曼同志直讲到夜深，她才同我依依握别。

当时我以为她不能很快就离开哈尔滨，可能她还来看我，我也许在哪里能见到她，真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我本想到游击区参加部队工作，同志们也说到部队去工作对我很适合，很对口。我没有想到组织竟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在

十月的一天，我竟悄悄地离开了哈尔滨，离开了可爱的故乡，可爱的祖国。

一九三五年秋，我由苏联学习回来，回到了久别的哈尔滨，见到了杨莹叔（杨朔）和金人，他们说，一些朋友，一些同志，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到游击区去了，有的去向关内，有的下落不明。我听了这种情况，回首往事不胜凄然。对于一曼同志我还以为她在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中继续英勇战斗。直到解放后，我在山东工作时，看到了电影《赵一曼》，我才详细知道赵一曼已经牺牲。缅怀她的往事我曾写过一首悼诗，志我哀思：

一曼当年哈尔滨，千难万险为斯民。

声声真理风云涌，事事典范天地新。

笔讨汉奸惊敌胆，枪杀日寇快人心。

红装白马传佳话，烈士英名贯古今。

（一九八二年春三月风雨夕记）

二十年代初期青岛纺织工人运动片断

王 景 瑞

风物不居日月流，
为人俯首甘当牛。
艰苦奋斗七十载，
回忆青春已白头。

风景如画的青岛，是祖国的天然良港。她在帝国主义眼中一直是一块肥肉。本世纪初曾被德帝国主义侵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两次侵占过。二十年代初期，封建军阀张宗昌、毕庶澄、沈鸿烈之流和官僚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把一个好端端的青岛闹得乌烟瘴气。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把劳动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强。处于水深火热的青岛地区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洪流，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远在七十年前，我的家乡崂山人民，为了反对德帝国主义掠夺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而流过血。我的大哥和二哥，为伐树垦荒而被德国鬼子捉去坐牢，罚款，打得皮开肉绽。为伐树垦荒，日本鬼子也到我家几次捉过人，罚过款，使我家穷上加穷。我是在

饥饿的环境下挣扎着度过童年，深深感受到洋鬼子的贪婪和残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那一年，我十二岁，开始从一个放牛仔变成一个埠落小学堂的学生。我的老师，叫李崇汉，他参加过义和团，是一位爱国者。他的反封建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在小学时，我就带头剪掉发辫，大胆支持二姐放足。在李村公学堂师范补习科学习期间，我写的《论岳飞》、《爱国论》等文章，受到老师的赞扬，得到顶圈。一九二一年冬，日资钟纺在沧口开始打地基建筑厂房。第二年秋天招考第一批练习生去日本神户学纺纱。这时，我们李村公学堂师范补习科和高小五年级毕业的前十名学生，差不多都被骗去当了练习生。当年我十七岁，既考取了胶济铁路业务科，又考取了沧口钟渊纱厂（即现在的青岛国棉六厂前身）。结果，我选中了钟纺（钟渊纱厂的简称）。同我一起考入的同学，小的才十五岁。我们这些天真幼稚的穷苦青年，只知找事干，挣饭吃，一心想出去看一看日出扶桑国的风光，因而经不住钟纺鬼子花言巧语的欺骗，离乡背井去到日本神户钟纺当了徒工，学习纺纱技术。

第一批去日本的练习生共二十三人，每月工资十三元五角，和胶济铁路的养成生的工资一样多，但生活用品比铁路的养成生待遇高，并且未出国就先发工资。厂方还说，学徒五年合同期满，可以每月挣工资40元左右。我们当中的不少人就是听信了厂方的这些欺骗宣传放弃了考取的胶济铁路养成生，而当了纺纱的“衣徒”。“衣徒”这个名称，之所以令人闻而生畏，是因为中国华新纱厂的“衣徒”上下班时，两边用木棍押解着走路，象囚犯一样饿得面黄肌瘦。据说，当年的钟纺技术是高超的，不仅在日本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闻名的。沧口的钟纺，在

当年是青岛四厂区七大纱厂的头子，财大气粗，技术比较先进，经营管理方式也有一套，对工人的剥削更为高明，更有欺骗性。同时，由于厂大人多，因此钟纺的练习生和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每一行动和斗争，在青岛纺织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钟纺的练习生去日本学纺纱的共有四批二百来人，都是男性青年。我们去日本神户钟渊纱厂时，乘的是“宁静丸”。因为是第一次远离祖国，每个人的内心是很不平静的。浩荡的汪洋大海，远处的鲸鱼，近处的小飞鱼，朝鲜海峡的渔船，日计岛上的航灯和宇品内海曲折秀丽的风光，这些当年的景物和我们遥望与怀念祖国的思绪交织在一起。到达神户后，我和王星五被分在钟渊纱厂一个车间精纺科当学徒。日本纱厂中徒工的生活实践，逐渐使我们认识到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比如我们每天拼命流汗干活十小时之后，象煤渣一样被扔出厂，可是挣的工资实在是太少。但是鬼子的监工，挣的工资越多越逍遙自在，资本家一个个都象臭虫一样，肚子膨胀得连路也不能走了。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世界的无产者是一家人。我们所在的神户钟渊纱厂，前、后纺及摇纱车间，多数是日本青年女工。她们对中国工人练习生是热情关怀的，在学习技术上或发生病伤事故时，都是积极地帮助我们。日本国的资本家对于他们本国的工人压榨也是很厉害的。一天上午，有一个日本注油工人，在后纺车间的吊梯上被皮带绞死，流血满地，很快就被拉出去烧掉。又听说，蒸汽锅炉房里也死伤了两个日本工人。这引起了我们练习生的同情，连日本工人的死伤病老都没有保障，远离祖国，流落异乡的中国练习生那就更不用说了，说不定哪一天在我们当中，也会出现象那几个日本

工人一样的悲惨下场。

神户市内有一条中国街，那里的商店都是中国同胞开设的。在国外一听到那里有祖国的同胞，心里就分外的热。在王星五的鼓动下，大家都要求出去看看。厂方答应了。但我们要出去，必须列队步行，还得有管养成的日本鬼子野村领着。我们的队伍约有七、八十人，在这不可一世的鬼子野村的眼里已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了。当我们行至某一条街，遇上了一群噪杂乱叫的日本人，他们一个个手执铁钩，张牙舞爪把我们队伍冲散，并且要动手打人。这是日本的武士道阴魂再现。就在这个紧张时刻，智勇兼备的王星五挺身而出，高喊一声：“不许动手！”并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在星五的带领下，我们以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镇住了武士道的邪气，终于迫使蛮横的鬼子们让路了。王星五在我们中国练习生中威信较高，他的技术学习是超群的，他对工友的困难或委屈特别关心，总是设法帮助解决，见义勇为，主持公道。经过这次同日本人的斗争，他的威信更高了。

还有一次，我们去游览八幡山。在山顶上看到立着的伊藤博文的铜像。记得在铜像的胸间还有一个窟窿，据说那是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而留下的痕迹。我们大家同情的不是伊藤博文，而是朝鲜的亡国恨。王星五对安重根大加赞扬，并领着大家唱出了朝鲜爱国志士作的《恨日歌》：

炎日何皎皎，射我山头苗；
土崩苗已死，炎日当空照。
愿得后羿弓，射日下山峤；
愿得鲁阳戈，挥日落海涛。

这支歌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的爱国主义思想。相传日本帝

国主义在占领朝鲜的时候，不许朝鲜人住家用切菜刀。只能在每一口井上放一把切菜刀，大家轮流使用，以便防备妇女们也拿起刀来杀日本鬼子。没想到日本鬼子竟然象统治朝鲜人民一样来对付中国练习生。有一次我们的炊事员，买了一把切菜用的长小刀，不幸被厂方派去监视我们的勤杂工鬼子看见，他偷偷地报告给警察局。一天半夜三更，一群恶狠狠的鬼子闯进我们的宿舍，用鼻孔说话，把我们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结果那把新买的切菜长小刀自然是被他们搜走了。通过这桩事，大家深深体会到：当亡国奴，人身是没有一点自由的。从而大家也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厂方资本家的丑恶本质。星五更是怒不可遏，他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我们绝不能屈服，要对付日本鬼子，必须团结起来。

神户的冬天，犹如青岛的深秋，山山红叶，郊外到处是青青的大葱。触景生情，进一步引起我们思乡怀国之情。这时，我们大家一致感到，远离祖国一盘散沙是不行的。没有一个团体，个人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在这之前，在中国练习生中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小团体，如我与苏名员、钟振先、李修度、袁相培等就是一个团体，但是力量还是小的，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同时在各小团体之间，也不能很好地协调一致，有时甚至还产生一些隔阂和磨擦。恰恰这时有消息说，中国练习生要改为日工资，这样我们的工资比出国时还要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纷纷要求将各个小团体联合成一个大团体。王星五也再三向大家讲，只有团结起来才力量大，日方资本家硬要压低工资，我们就团结一致进行罢工。经过酝酿，中国青岛纺织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兄弟同盟会在日本神户钟渊纱厂正式成立了。大家一致推选清花车间的年

龄较大的刘金为会长，王星五为副会长。可是时间不久，刘金不孚众望，遇事和稀泥，生怕打了自己的饭碗，大家都喊他为“箍炉匠”。这样星五便自然成了大家拥护的主将。

雪花飘飘春节到，我们第一批中国练习生在日本学习期届满了。一九二三年初春，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一大群青年日本纺织女工欢送我们搭上了“春日丸”，返回祖国。不久，第二批中国练习生也回国了。我们这些去日本学习的练习生先后回到青岛纱厂之后，厂方自食其言，要把我们的月工资十三元五角，改为日工资四角五分，其他工作服和鞋袜等福利待遇都要取消。这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工人兄弟同盟会组织大家积极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刚开始，会长刘金就消极妥协，毫不动摇坚持领导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王星五同志。日本厂长丸山幸藏为了阻止罢工斗争，特意去李村公学堂把当年我们的日本老师小林找来，劝说我们曾在李村公学堂上过学的工人兄弟同盟会的骨干分子。但是我们谁也不理这一套，坚持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大家团结一心不上工，各自带着一份石印的工人兄弟同盟会的兰谱回家了。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厂方又在我们练习生中收买了当过日本鬼子小侍的王三和臧同当走狗，让他俩首先上了工。同时厂方又采取硬的办法，以五年合同未满为理由，要每个离厂练习生的家庭赔偿出国学习费用。但工人兄弟同盟会坚持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厂方为了早日复工，也不得不答应将练习生的日工资由四角五分提高到五角八分。这样我们大家才正式复了工，取得了一次经济斗争的胜利。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复工之后，练习生的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挣得的工资所剩无几。这时工人兄弟同盟会的成员，采

取“磨洋工”的办法对付日本人。有一次，我们后纺车间安装机器的工友干活慢了点，鬼子浜端火了，大骂起来。我们谁也不听他这套，年龄最小的练习生潘明机当场就和浜端对骂起来。不料这个鬼子象疯狗一样，从梁上跳了下来，张牙舞爪地向小潘扑来，动手要打。就在这紧张的一刹那间，星五同志猛地站起来，面对面地一连骂了四句：“你是畜牲！畜牲！畜牲！畜牲！”这下子可把鬼子气坏了，他飞跑去从一个装过机器的木箱子里取出一枝实弹猎枪，转头来狗牙咬得吱吱作响，把枪口对在星五的胸膛上。但是，星五巍然挺立，横眉冷对，高喊：“畜牲！你敢开枪！……”在场的所有练习生和工友们跟着星五怒吼起来，一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下子使橡皮鬼子泄了气，夹起尾巴匆匆地往厂长办公室跑去。星五带着工友随后也到厂长办公室，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日方厂长慑于工人的力量，当场命令这个武士道式的鬼子向我们赔礼道歉。通过这次斗争，星五的威望在工友中更高了。

一九二三年秋冬，去日本学习的共四批练习生约二百余人先后回到了青岛。以前，工人兄弟同盟会虽然仅限于练习生的范围，但由于是工人自己的团体，因而深得工人的信任和爱戴。当去日本的练习生都先后回青岛，工人兄弟同盟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致要求重新整顿组织，开会活动。罢免了前会长“箍炉匠”刘金，选举王清为会长（因为练习生中李村地区的人居多，而王又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王星五仍为副会长。工人兄弟同盟会重新选举以后，大家又在酝酿罢工。特别由于回国的第四批练习生的工资太低，日工资为四角五分，他们的人数又多，于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声浪又起来了。正在我们酝酿罢工的过程中，王清被日本厂方收买过去，泄露了工人兄弟

同盟会的秘密，致使团体一度陷入涣散状态。这时工友们非常愤恨王清当走狗，大家迫切希望能有个坚强的领导，使工人兄弟同盟会更加巩固起来，以便更好地同日本资本家开展斗争。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深深懂得，剥削和压榨工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阶级本性，我们要增加工资，日本厂方绝不会良心发现，即使增加一分一文，也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九二三年冬，我们的工人兄弟同盟会已经突破练习生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纺织工人兄弟中去了。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大家又酝酿重新选举领导人，使工人兄弟同盟会巩固得象铁一样。一天的夜晚，在沧州钟纺的一幢新建而尚未落成的办公楼，召开了几百人的大会。会场上，点燃信香，烧了几桶黄表纸灰，每一个与会者盟了誓：“坚决团结战斗到底，当走狗就天打五雷轰。”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王星五光荣地当选为会长，副会长是吕纲和吕修，我是后纺车间的代表。

工人兄弟同盟会充实了新的领导之后，立即领导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声势浩大，钟纺工人兄弟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日本厂方完全暴露了狰狞的面目。他们把工厂的大铁栅栏门关上，不许工人出入。一些当门卫的走狗也武装起来了。当着千百名练习生和工人一起要冲进工厂时，鬼子和门卫走狗便拉出了救火车用水龙头向人群喷射。工友们怒吼起来，纷纷拿石块向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打去。斗争时起时伏。在一个晚上，我和钟振先两个人一起，抬来一块石头垫着脚，才把钟纺的紫铜招牌摘下来砸烂了。日本厂方最毒辣的一招是不给工人饭吃。经过几次不同的战斗，又几番派代表谈判，大家答应上工。但问题并未解决，干活磨时间，坚持斗争若干天。把食堂的碗摔得一筐一筐的往外抬。到夜间

吃饭时，鬼子要是不小心，就会遭到不知从哪里来的几个飞碗，被打得抱头鼠窜。由于这个原因，鬼子每人差不多都带上了“二人夺”刀。工友们行动时也是多人一起不拆帮。

局面越来越紧张。一天晚上，会武术的练习生王延灼借我的礼帽戴上去沧口街看看情况。冷不防，被中国警察一耳光把帽子给打掉了。当时我们工人兄弟同盟会成员，对中国警察当局的反动面目还认识不清。所以，王星五还派代表去沧口请来中国的警察署长到厂里交涉。可是这个警察头子一到厂里，就钻进办公室同鬼子咕噜着密谈起来。然后出来板起面孔，把我们围在大门口的一大群练习生和工人臭骂了一通，接着就洋洋自得地走出工厂。从此，我们才认识到，日本厂方与中国衙门原来是一个鼻孔出气。警察署长只不过是鬼子喂的一条狗。

茫茫黑夜盼救星。一九二三年青岛沧口区共有七个大纱厂，可是只钟纺一个厂闹罢工。在斗争中，我们深深感到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当时，我们不懂得马列主义，也尚未找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王星五等放开眼界，冲破钟纺的范围，特意派遣练习生于九鹤与岳国图为代表，到共产党在青岛的发祥地四方机械厂，请来一人给我们当参谋。该同志是四方机械厂工人兄弟自己的团体少林会——后改为圣诞节的成员之一，当时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我那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自然是不清楚的。

正当工人兄弟同盟会积极准备扩大斗争范围的同时，日本厂方也在阴谋策划对工人下毒手。一天中午，厂方去青岛日本总领事馆，拉来一汽车暗带刀枪的鬼子打手，并做了布置，然后以谈判为名，把星五等工人兄弟同盟会的十来个领导人骗去，下了毒手，每个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星五被毒打后，

有一个工务系的日本人，绰号叫“小武旦”，对中国工人表示同情，偷偷地让星五从豁口逃出。吕纲的头几处被打破，血流得满身都是。吕修被打得当场昏过去了，随后工友们用门板把他抬回家去，不久就牺牲了。岳国图等人也受了重伤，其他代表也无一幸免。

在日本厂方设置圈套毒打工人兄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的当天，厂方又以召开“茶话会”为名，在大食堂里摆上一桌桌黄橙橙的蛋糕，把所有的练习生都骗进食堂，然后关上门来，指名道姓加以训斥，有不少人还挨了打。我被一个鬼子赶到食堂的角落里，挨了几脚，打了几个耳光。日本厂方害怕工人继续罢工，在设置骗局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也不得不宣布给练习生每人增加日工资一角。这样练习生中最高的日工资为六角八分，最低的为五角五分。从此以后，我们虽然被迫复工了，但我们并没有泄气，大家的口号是：“下次再来！”

涛涛长江流不尽，且看后浪逐前浪。一九二三年严寒的冬天，财大气粗的钟纺，为了把一厂的十万纱锭很快开齐，又特意从日本国内调来一些熟练技术女工，分配在各车间同练习生一起干活，教徒工，传授工作法。同时还从青州地区招来很多满族天足姑娘。她们的工资仅够吃饭，住的炕上连铺席都没有。扫地童工生活更低，挣的工资吃玉米饼子都吃不饱，穿的个个象叫化子一样。日本厂方就是这样用满族廉价的女工劳动力，代替缠足女工和闹罢工的男工。到一九二四年春，一厂全部开车了。因为日本女工要回国，厂方急需技术工人。这时王星五等工人兄弟同盟会的骨干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伤也好了。通过与厂方按合同办事的说理斗争，他们全部复了工。可是鬼子对星五等人却十分警觉，一听到罢工的风声，就把星五监视起来。不让星五与工人同时出

厂。但是，星五并没有放弃斗争，而是改变了斗争方式，不能搞象以前工人兄弟同盟会那样的大团体，就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搞小团体，不能在本厂发动罢工，就到外厂去活动。当时，在沧口的日本纱厂都开全车，连钟纺二厂也开车了。丝厂也在兴建之中。日本各厂之间订有联合同盟，叫什么“辛迪加”，他们规定不准互相争夺工人和市场，工人也不能随便调厂。因此，这时整个工厂的局面处于稳定状态，原来工人兄弟同盟会的骨干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组织力量。在这个时期，以星五为首，我们前后纺车间的一些练习生，如刘振伟、宋景璞、杨廷珪、苏名员、李修度、毕庄令、王山和我以及我的徒弟刘阁成、刘亭等若干人结成了巩固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几年之后，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四年夏天，星五去沧口宝来纱厂串连工友，被日本走狗翻译发觉，险些被打。星五牢牢记住这只狗，决心要惩治他一下。不久，这只狗发了狂，跑到钟纺工人宿舍区捣鬼，被星五发现，遂立即出动了我们这个小团体，把他包围起来，用石块、擀面杖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差一点使他见了阎王。这件事很快地传开，大长了工友们的志气，大灭了日本走狗的威风。以后，就连钟纺的一些守门狗，见了星五和我们一伙人也乖乖地点头让路，不敢侵犯，厂方也对我们这些人免除了出厂检查。借此合法机会，我们经常帮助工友们解决生活困难，采取多种方式同日本资本家展开斗争。记得，有的保全工每到月底生活非常困难，在将要下班时就叫我说：“王师傅！请你帮帮忙吧。”我懂得他们的意思，回答说：“我的工作服在衣架上。”于是纱就裹在我的工作服里，几个人并肩出厂后，保全工友立即把工作服接去了。我有一把钥匙恰巧能打开仓库门上的锁，工友们的围裙破了，到夜班我就领着几个信

得过的工友，拿着旧的围裙到仓库去换来一些新的，反正不花分文，工友们戴上又干净又整齐。工友们有要紧的事，只要向我说一声，就可以回家了，工资照发。有时候气一上来，还故意弄坏几件机器零件。这些都是我们小团体团结一心，专门对付洋鬼子的一些小办法。我们懂得，在日本纱厂做工，就是给帝国主义分子当牛做马，鬼子要我们的是技术，是廉价的血和汗，它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青春，但却不能养活我们的老年，到血汗被榨干的时候，我们就会象煤渣一样抛出厂去。因此当时谁也没有以厂为家的思想，经常干扰和破坏厂方正常的生产秩序，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冬，我被调到钟纺二厂后纺，星五仍在一厂。当时织布厂正在兴建，钟纺逐渐扩大，并改名叫“公大”纺织厂。日本人对中国工人的统治压迫更加厉害了。鬼子们一个个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眼睛鼓得圆圆的，他们仿佛预感到中国工人阶级埋葬他们的自由解放之钟就要敲响了。果然，没有几天，消息传来，四方区的大康和内外棉纱厂掀起了罢工的浪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迫害更残忍了。当时我们就听说，四方有六、七个工友被厂方用麻袋包装着从地下水道流到海里去了，还有几个工友被扔到锅炉里烧掉。钟纺的练习生和工人，毕竟是四港区七大纱厂的工人闹罢工的前驱，听到大康和内外棉大罢工的风声，岂肯坐待，个个跃跃欲试，酝酿罢工的劲头又起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原来工人兄弟同盟会的骨干成员的行动一刻也没有放松监视活动。星五和刘振伟等在一厂活动尚未成熟，星五就又被鬼子专门监视起来。刘振伟跑到青岛其叔父家。我和毕庄令等在二厂后纺活动，白天消极怠工，夜班时就到厂房顶上商量罢工，故意找秘密地方睡大觉，让车间纱锭大开

花。当时因为我们消极怠工和工人缺勤，使厂内将近四分之一的车停止运转。日方车间主任“岛狗”，看到情况不妙，专门向上打了秘密报告。厂方管工务和人事的鬼子头头“大驴”和“野狗”（中国工人给他们起的绰号），白班上轮番几次找我谈话。种种迹象表明，鬼子又要下毒手了。就在这欲雨风动的时刻，星五不待鬼子动手，在我尚未离厂之前，已经潜出钟纺。后来，他告诉我，他在离厂之后很快就跳上火车到达济南，又转到北京燕京大学去旁听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讲课。据说，他是经过胶济路上党的关系介绍到北大去的。当他一九二六年重新回到青岛时，我才知道他于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星五走后，我也不待鬼子动手，在夜间十二点钟仓促离开钟纺，把所有的行李和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急忙搭上火车到了青岛。事后得知毕庄令也与我同时回了家。厂方到处找人，并以五年合同未满的理由，到我们每人的家乡去要出国学习费，想把我们捉回厂。但是，鬼子哪里会知道，一九二五年春上，我已经在青岛阳谷路平原洋行当店员了。就是这个地方，一年之后，变成中共青岛市“支联”的重要联络点，当年我们工人兄弟同盟会的许多成员，也都成了共产党员。

“五卅”前夕，星五以及我们许多练习生，先后离开钟纺，当然这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从自发的经济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进一步走上了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我们在茫茫的长夜中，终于找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投身到自己母亲的怀抱，看见了胜利的曙光，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从而，工人兄弟同盟会也就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首次占领延安

白志文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毛泽东同志在甘肃境内大草滩，利用两天时间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我以三军团原五师十五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到：“……到陕甘建设我们新的根据地，……占领延安，成立我们抗日战争的指挥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甘泉下寺湾一带与红军十五军团会师，毛泽东同志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下寺湾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当时，我在三军团司令部，因为身体不好，负责军团首长的一些勤杂事务，与彭雪枫司令员、李富春政委接触较多，也曾听他们说过“中央有占领延安的打算”。

在这期间，中央确定了“在发展中求巩固”建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陕甘根据地的形势虽不象江西根据地被敌人围剿得那样厉害，但也有很大不利。在陕甘一带，东有阎锡山的部队，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的人马，西有马鸿逵、马步芳的骑兵，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使张学良损失了近两个师的兵力，促使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实行了局部停战。这样我军在陕北便有了落脚之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曾打算夺取延安，但因延安属张学良的防地，进占不利于团结张学良共同抗日。因此，中央直属机关先进驻离延安大约七十五公里的瓦窑堡。

瓦窑堡会议以后，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准备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扩大红军，周恩来副主席和军事直属机关及红军大学留在瓦窑堡。当时，我任红军补训师师长，李林同志任政委，直接受军委参谋长张云逸同志的指挥。我们的驻地在瓦窑堡以南四十公里处桃园一带，任务是一方面训练新兵，一方面负责对中央和军委留守机关的警卫。

瓦窑堡是陕北的一个大镇子，里外三道城墙，约一千八百余户人家，又由于是中央和军委驻地，因此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尤其是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高双成，更是虎视眈眈。

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的一个中午，高桂滋部偷袭瓦窑堡，“红大”的部分学员进行了抵抗，因为“红大”学员一个班只有一支教练步枪、十五发子弹，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只好保护着周副主席和军委机关撤向保安方向。正在“红大”学习的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胳膊负了伤。

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东征返回陕北后，在延川县停了一下，又返回了瓦窑堡。五月中旬的一天拂晓，高双成率一个师从北面李家岔方向，高桂滋的一个团从东面清涧方向同时进攻瓦窑堡，东北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派军部一名少校副官找到我，要通过补训师的警戒线，他说：“贵军主力西征，正与马家军作战，留守部队无法击退高双成与高桂滋的进攻，与其让他们占领瓦窑堡，不如你们撤开警戒，让我军向瓦窑堡进展，现在我军正前进至离瓦窑堡三十里处。”

当时，我名为补训师师长，实际上除去一部分新兵和俘虏兵，并无武器，能作战的兵力只有一个排。我立即写了一个紧急报告，将情况说明，请中央速指示，派骑兵通信员立即送去。当时，我考虑，东北军接受我党共同抗日主张，如果东北军进占瓦窑堡对中央威胁不大，同时可以迟滞高双成、高桂滋部的行动，现在等待中央的指示已来不及，抵抗也无能为力。于是，我将这一个排撤至延长地区，在瓦窑堡以西十五公里，准备接应中央。第二天，送信的通信员回来了，他说他刚到中央机关驻地附近，就见高双成的部队已冲进瓦窑堡，远远地看见四个警卫人员保护着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首长利用城墙掩护，顺着蟠龙方向进了山，大概撤向保安县。这次敌人袭击中，河水、延川、延长、清涧四个县被敌人全部占领。

我马上和李林政委商议，由他把新兵送到其它安全的地方，由我带着一个排的兵力，连夜急行军绕道直奔保安，当天下午到达离保安不远的西杨家园子，接到总部通信员送来的指示，命我驻防西杨家园子，防御高双成部。当时，我因兵员缺乏，在补训师中抽调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新兵组建了四个战斗连队，又因缺乏干部，我向中央打了个报告，要求适当补充干部，很快总政治部从各部队调来了三十多营连排干部，大部分是红军长征干部。我又从总后勤部白如冰部长那里领取了一些武器、物资，使中央警卫部队的力量稍加增强。

经过敌人两次袭击瓦窑堡事件，中央感到，要建立稳固的陕甘根据地，首先中央、军委、总部指挥机关要选择一个安全的立足之处，延安是比较理想的。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总部撤至保安以后，中央就考虑抗日

战争总指挥部设置在延安的问题。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保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出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再次提出在适当时机夺取延安。

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我率领一部分部队到达保安城外负责警卫任务。一天，总部派来个通信员通知我：“立刻到总部，中央首长有任务直接向你布置。”我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保安城里。到中央总部以后，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我，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本来应该让你好好休息，可是现在情况不允许，在我们中央所在地，左边有个旦八寨，右边有个宁条梁，这是两个支撑点，由两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地主土匪武装占领，将来党中央迁至延安，这两股土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威胁，现在武亭同志（朝鲜族人）围攻旦八寨已经五个月了，还没有打下来，你在江西围攻城镇、寨子多次，很有经验，现在把攻克旦八寨的任务交给你，给你两个团、一个参谋、两个通信员，明天就出发吧。”接着周副主席将自己使用的望远镜送给了我。

第二天，我带着关中红一团（团长贾维义）、陕北红三团（团长郭宝珊）赶到旦八寨。当晚，我接到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的命令，内容是：旦八划为军分区，白志文任司令员、黄春圃为政治委员，负责围攻旦八寨军事行动。我马上部署了围攻旦八寨的计划，下达了命令。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终于攻克了旦八寨，大部敌人逃走，残部被我歼灭。我马上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毛主席立即派通信员送来命令：“宁条梁久攻未克，命白志文带关中红一团增援，陕北红三团驻防旦八，具体事宜由周恩来同志面示。”

傍晚接到命令，我带领关中红一团连夜赶往宁条梁，途经保

安，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接受任务，他说：“宁条梁的情况与且八寨差不多，也是久攻不下，你到宁条梁去，归阎红彦同志指挥，协助他完成攻打宁条梁的任务。”阎红彦同志当时是新编三十军的军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带关中红一团赶到宁条梁时，已是夜里十点来钟，我与阎红彦同志刚一见面，就接到中央拍来的紧急电报，内容是：西安发生事变，张、杨扣压蒋介石。命白志文带关中红一团立刻前往蟠龙镇，占领青化砭后，前进三十里，相机占领延安。以后，宁条梁敌人听说“西安事变”，将部队撤走了，宁条梁也被我攻克。

我接到电报指示后，连夜率领关中红一团马不停蹄地由宁条梁赶往安寨。青化砭守敌高桂滋部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已全部撤走。我未费一枪一弹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青化砭。到达青化砭后，我立即与总部联系，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黄春圃同志率陕北红一团护送周副主席已到延安乘飞机处理西安事宜，你与黄春圃协同，立即占领延安，占领延安后，你任城防司令，黄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两点，我军首次占领延安。

进占延安后，我们首先将城内七个保安队，约五百来人，集中在宝塔山对面两个山中间的一些窑洞中，进行了编遣工作，除少部分留下当红军，大部分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我在延安住了三天三夜，召开了当时还留在城里的国民党一些人员的会议，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同时进行了地形勘察和肃清残匪、张贴布告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又接到毛主席从保安发来的电报：“我军占领延安后，敌高桂滋部伺机攻

占瓦窑堡，以形成与延安对峙局面，命白志文带相当兵力进至瓦窑堡附近，进行游击战，以威胁牵制高桂滋。”

接到命令后，我带关中红一团立刻出发，直奔瓦窑堡，与高桂滋部展开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战，最后把这股敌人围困在几个据点里不敢出来。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毛主席率中央直属机关进驻延安城。从此，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都有了立足之处。延安附近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和地方军阀的部队除了被消灭、击溃以外，余部也被驱逐到陕甘边缘地区，延安四周的支撑点和要塞大部分也被我军控制。

一月二十八日，我在瓦窑堡接到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的命令，命我停止活动，撤至永坪镇，部队进行了整编，编成陕北独立师，我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下属三个团，一团团长张子英、二团长赵启民、三团长郭宝珊。整编完成后，独立师在永坪一直进行军政训练。

中央进驻延安后，虽未受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阀的大规模袭击，但延安附近的土匪活动还是比较猖獗。五月，周副主席在离延安二十五公里的劳山，就受到土匪的袭击。事件发生时，我正在离甘泉三十五公里处的套筒源整训独立师。当时，接到毛主席的紧急命令，命我率领全师连夜赶到富县（鄜县）、甘泉一带，执行两个任务，一是保护延安至洛川交通要道的安全；二是肃清土匪。

接到命令后，我立刻命令一、二团负责保卫延安至洛川的交通要道，我带第三团赶到甘泉，第一次到人烟稀少的南泥湾、井坪湾搜查土匪行踪，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只消灭了零星残匪，

大股土匪并无下落。

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对我师剿匪情况很关心。八月的一天，毛主席还把我从富县叫到延安，询问了部队的编制、干部、生活等情况。当我向主席汇报剿匪工作进展不大时，主席对我讲：“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陕北的土匪一般都和当地的会道门有联系，肃清土匪与保卫延安，确保中央的安全有密切的关系……。”主席的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回到师里以后，我马上发动群众，分析情况。在独立一师工作的郭宝珊是原陕北红一团团长，他从团里找了六、七个曾经参加过哥老会的战士，了解到哥老会成员大都是本地人，与黄龙山一带的土匪有过联系。于是，我带着独立师三团深入到黄龙山一带，利用哥老会人员寻找土匪行踪，经过两个多月的了解侦察，终于摸清了这股土匪的活动规律。一个夜晚，乘这股土匪在黄龙山里一个大窑洞睡觉的时间，包围了他们，全部消灭了。以后又陆续消灭了一些小股土匪。这以后，延安周围再也没有出现过土匪骚扰。当时参加剿匪的还有贺晋年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七军一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又调任两延河防副司令兼警备五团团长，何长工同志任司令，防守从清涧到延长的三百里黄河沿岸，保卫了延安侧翼的安全，使党中央、毛主席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沈治英整理）

北 欧 木 屋 中

江 晴 恩 遗 作

柏林——斯德哥尔摩的途中

事情决定得那样快，我随便拿了两件衬衫和几本杂志，放到小提箱里，坐电车到了司塔丁勒车站。

车站前还是十分冷落，除了来往电车的铃声，汽车的奔驰和卖晚报小贩的呼喊以外。扛行李的脚夫都懒洋洋地靠着门栏，看那些刚下工的女工，或是围站着谈笑；擦皮鞋的摊子上也还没有生意。

在候车室里，却已经有了几个喝啤酒、看报，等候北上的快车的客人。我急于找材料准备次日的讲稿，向茶房要了一杯咖啡之后，马上拿出带着的杂志看阅，而且时时用铅笔在拍子纸上写些数目字。

八点十五分，车站上的职员跑来候车室催促客人上车，他念着：“北上特别快车……谷勒佛斯瓦特……司忒尤商得……马而莫……斯德哥尔摩。”

我上车后，走过了几间空房都不愿意进去坐，却拣了一间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中年商人模样的人，和一位靠着窗户低头坐着看书的女子的房走进去，坐在靠近那女子的对面。车开行了，那女

子抬起头看了看窗外摇手巾的一些送客的人时，她那副嫩白的脸儿和金黄色的头发，实在显得异常的妩媚！可是，车开行后，她仍继续垂下头去看书，大概是看的莎士比亚的一本剧作吧？

我仍是惦念着我演讲材料，又从提箱里拿出带着的杂志翻阅。碰巧查票的人查到我的票的时候，说了一大篇德语，而且又超越了我的德语了解限度，弄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同车的商客们都不谙英语，最后还是那位女郎以怜悯与同情的姿态，出面用英语给我翻译。她很和颜悦色地解释说：“你坐错了车厢，这节车在中途是要被摘下来的，你应当坐前几节的列车。可是，没关系，我是在中途下车的，我下车的时候，指给你赶到前节列车上去，是不会有误的。”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了。她因为我在看杂志，和我谈了些政治上的问题。有时，同房的那两个商人也说说他们的意见，虽然他们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

午夜时分，车已行抵“东海之滨”，我随着乘客们，一同走出了德国的海关，而搭上渡我们过海的海轮。那海轮上有铁轨与路轨相接，一切邮车货车都可以直接拖上海轮；乘客们都可以买舱铺睡觉。直到次日清晨六时左右，才安达彼岸，而入瑞典国境。

从瑞典海滨杜礼斯堡（Türlesberg）上车，身体还是昏沉沉地感觉困倦。同房内的一个工人模样的乘客同我用英语攀谈起来，他很关心地问到远东的战事，他身旁还坐着一个衣冠比较整洁，和他一块儿自美国回来的人，他也参予了我们的谈话。我站在反战争，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立场，叙述战争的残酷，并且归纳到：“以国内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他们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很感慨地叙述了些美国失业工人英勇

斗争的情形，他们还询问了一些远东的革命形势和胜利收获等等。最后，他们谈到自己的时候，我才晓得他们都是芬兰人，他们是从芬兰移民到美洲的，都是汽车司机，最近因为屡次失业和参加失业者的斗争，被迫离开了美国！他们的伴侣还有五人，都在德国海滨的汉堡，被德国工人组织招待，而送到莫斯科做工去了。他们因为要回家去看看，才转道瑞典去芬兰。

我们谈笑得非常高兴！他们的失业痛苦，我受人压迫的感怀，似乎在我们共同谈笑时减轻了很多，因为我们发觉了我们共同的力量！

斯德哥尔摩的反战群众大会

瑞典南部，一望平原。田野中，掺杂着木板筑成的农家房屋，间或一片森林掠过。我们看到那些很悠闲地走进树林砍伐的工人们和很迟缓地在田野间“做活”的农人们时，都似有感怀地呆望着议论：

“此地没有受过欧洲大战的直接影响，他们都饱受了改良主义者说教的欺骗，他们似乎是很自在地，不去理睬那在急剧演变中世界的转换！”那个美国工人说。

“不，这是一种肤浅的结论！我们坐在火车上是不能知道他们的生活实况的！固然，比较起来，此地的革命运动落后些；但，我深信：大浪潮的激流奔放时，他们是会被旋转进去的！”

傍晚才到斯德哥尔摩，与同车的工人告别后，只身降到下车的人群中，正不知道怎样才见得到迎接我的朋友们。蓦地，一个矮胖的人来到我身边，唤我的名字：

“朋友，辛苦了，跟我来吧！”

我们一同走到车站门前，他又替我介绍了几个人：一个某报的主笔，一个某某组织的书记，还有四五个和我们一道走的人，他们都和我握手，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热烈地欢迎！可是他们都不通英语或德语，只有第一个碰到我的那人还可以用几句不十分通畅的英语谈话。他告诉我：

“政府当局已不允许你明天在大会上讲话！”

“为什么？”

“他们的理由是：中日并没有正式宣战！”

“岂有此理！”

“没有关系的，我们已经想了别的办法。”

他们把我领到中央大旅馆，开了一间设备极精致的小房间。他们又给召来了各报的新闻记者，我们很庄严地坐在那间房里，让记者们拍了照以后，很简单地谈了些中日战事的严重性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同时我又不客气地指出了中日反动阶层的勾结和中日民众在反战运动中的英勇斗争，以及满洲、上海、日本前线士兵局部的罢战运动。我又简单地申述：我不了解他们的政府当局为什么说“中日并没有正式宣战”，不允许我在群众面前讲话，并且希望他们主持正义，站在同情的立场，为我力争！最后他们都问：“苏联会不会永远守中立？”

“她是不惜任何牺牲以维持世界和平的，因为在战争中当炮灰的也只是劳苦的贫穷人们；要是世界的和平果真无法维持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激战开始的时候，她必然是反帝国主义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

他们走了以后，我又和朋友们谈了些中国的形势，并且还把我的讲稿交给了他们，准备不能在公开的大会上说话时，由他们

把译文念给听众。

赫千生 (Bertil Håkansson) 是一个热诚精明的青年工人。他稍通英语，在我闲暇的时候，总是他伴随我在市上散步，他又时常买些自由主义及保守派方面的报纸，如Stockholm—Tidningen和Dagens Nyheter翻给我听。据他说，瑞典六百万居民中有三十万失业者，比例算起来，当然也不是太少。前卫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尚称强大，尤以失业工人的组织最佳，重工业工人中的组织却还很薄弱！前卫党中约有一万五千余成年，四千余青年。政治上，社会民主党为在朝党，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微弱。

次日晚间的群众大会果然开成了。到会群众约有两千人，除了例行开会仪式及前卫党代表致词以外，还由“剧联”排演了关于上海闸北战争的残酷，及伦敦……等地所谓世界文化中心的资产阶级的享乐等的短剧。休息五分钟后，有人领我登台，听众的掌声，听众的欢呼，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为政府当局不允许我讲话，由Ny Dag报的主笔声明后，让我哑口无言地静坐在讲台上放置的一把靠椅上，当时，群众激昂的抗议声震动了整个会场！俟群众安静以后，又由该主笔把我讲稿的译文——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全世界普洛特利亚特的责任——念读了一遍。最后还映演了一套关于上海苦力穷困生活的影片。映演完毕，在群众的呼喊和歌唱声中，才由主席宣布闭会。散会后，有一班活泼天真的男女同志走到后台，和我握手，并且要和我深谈！我因为时间已晚，没有与他们当晚谈话，而答应和他们另约时间。他们都是当地大学的学生。

东区失业工人的集会

和赫干生在一家衣衫褴褛的人们常出入的饭馆午餐时，他碰到一个相识的朋友，他问我：

“朋友，有工夫没有？午餐后一块散散步，再到东区去看看失业工人们的集会，好不好？”

“好！”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

设在二层楼上的会场，虽然很昏暗，却满满地拥挤着一些饥饿不堪的失业者！一个中年人在台上高声讲《工人革命和俄国革命》。最后，他们要我向他们讲几句话，当场监视的警察却说：“他没有在公开集会上说话的权利。”当然又被他们给阻止了。在场的人们又是一阵喧嚷，纷纷质问，搞得那些警察们也自觉无趣地走向会场门外去！

傍晚，接到“民族布尔什维克团”祝我“前进胜利”的信，那团体是托派组织，我和赫干生商量以后，才写了一封针砭他们理论上的错误，劝他们走向正途的回信。

也是在当天晚上，有两个不速之客携着前天群众大会散会后和我握过手的一个女郎到旅馆来看我。她送给我一个桔子和一朵蜡制的鲜红玫瑰花，她不通英语和德语，一切谈话都是由同来的一个比较年长、曾到过美国的海员翻译。他们约我共同出去玩逛，我因为来势奇异，不便自由行动，婉言谢绝了他们！

我当晚和赫干生商量之后，就搬到另一个朋友私人家里去住，免得受他们的搅扰！预防意外事件！

红色前线战士的集会

住斯德哥尔摩的第四日晚间，和赫干生坐电车到南城参加红色前线战士干部集会，到会者约有一百人左右。

既是“力”的组织，又不是公开的集会，我当然可以说话。我讲了一些东方前线斗士的英勇斗争和血痕，最后提高嗓子结束说：“没有什么‘东方’和‘西方’的分别！我们好比是属于一支大军的两翼，任何一翼的失败或胜利都是要牵动大局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改良主义者还没有施展象东方那些曾自命过改良主义者的血手。他们只是以更巧妙的方法欺骗你们，阻碍你们的工作，目的却是在接济他们在东方的傀儡，消灭你们在东方的‘力’和朋友！不是等待的时候了，朋友们！吹起你们的号角，准备着随时动员，随时战斗，努力完成我们共同的伟业！”

散会后，和他们共同到一家咖啡馆座谈，交换彼此的经验，直到午夜才尽欢而散。

当晚，赫干生通知我：他们已交涉妥了，准我到瑞北几个城市和农村去参加反帝群众集会，决定二日启程。

次日，Ny Dag报主笔邀我午餐，仍是赫干生领我坐小火轮于积雪中冲破薄冰到城南该主笔寓所。我们谈了很多的话，最后他谈到瑞典的工人运动及“白色恐怖”时，我才晓得在瑞北工人示威运动中，当局曾逮捕及枪毙了五个工人领袖。舆论界曾在报上批评过政府，很多记者都已被捕入狱，他本人仍还在被审讯中！初级法庭已经判决要监禁他六个月，中级法庭却驳斥了那判决，目的是要加多监禁的时间！审判期间他却还有相当范围内的行动自由。

桑德赫门的农民集会

赫干生素来是很守时刻的，在他领我上车的那天早晨，却迟到了二十几分钟。我们赶到车站，在人声嘈杂和车站职员催促上车的匆忙中，又坐错了车厢。幸好行到中途Uppsala时，经一位同车客人指示，才换到后一挂列车中去！我因为不懂瑞典话，只好把目的地写在一张纸上，沿途向别人请教。中途，茶房认错了我写的字叫我下车。幸亏下车后，未碰到接我的朋友，急促惊惶中，又持纸条询问一个旅馆接客人的，他笑着又叫我回到原车厢里去。

下午三点十五分，车刚到一个小站，两位工人模样的青年上车来，走到我身边问我：

“你是×吧？朋友，我们是从桑德赫门派来迎接你的！”他们俩都会说德语。

“谢谢！”我如得了甚么安慰似地领谢了他们的美意。

“我们到前站 Stugsund 就下车，负责人都住在那里，你今晚也要在那里过夜。”

到司脱格松德站后，随他们到车站附近一间地窖里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所谓高贵的人们看来，这些农民都是些“粗野之民”，可是他们的表情及谈吐，他们那种诚挚坚毅的态度，处处都表现着一种不同凡响的伟大！高贵的人们是比不上他们的。他们之中有一个海员是负责招待我住宿的，他带领我到他家，那是一座木制的平房，靠着荫森的山林，叶上留滞着残雪，地面上铺盖着尺许深的积雪，寒气十分逼人。一些穷家子在雪中踢球、游戏。在我走过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呆望了一阵。海员告诉他们

说：“这是我们的朋友，快问他好！”他们都很天真地杂乱地喊“……Dag！”我走了很远，还听到他们似乎是惊异，似乎是兴奋地喊着：“我们的朋友！”嗣后，在吵吵嚷嚷声中他们又继续踢打起来！

木屋内的陈设十分简洁，比起中国的农民或海员家庭真有天渊之别，他们还有一架无线电收音机，可以广收世界各地的播音。那架收音机是他们弟兄四人合资用二十五克伦（瑞币）购买零件，自行制成功的。北欧工农的知识水准确是相当高的。这位海员的名字叫 Lindgren，他还有两个妹妹，都十分忠诚和蔼，她俩完全照料家务，烹饪及一切繁琐都由她俩主持。她们虽是中年妇人了，都还没有出嫁，因为在北欧人口统计中女子多过男子，出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个海员是在春夏秋三季河水开冻后才有工作。他的二弟是烤面包师，三弟是汽车修理匠，四弟是一个年轻的失业工人。他们合住的生活，要比其他工人家庭舒适安逸得多，但舒适并没有减弱他们的斗争情绪，安逸也动摇不了他们的坚强意志，连他们的妹妹们，对于参加集会及从事妇女运动也都是很活跃的！我称赞他们是“幸福的家庭”。

晚间，随着他们全家到桑德赫门参加农民集会。到会者约有二百五十余人，会场是在新盖成的桑德赫门群众社（Söderhamn Folks Haus），该地农民组织的力量非常雄厚，他们不顾虑非法与合法的问题，自动地拥护我讲话。我也就不顾一切，在两个穿着红色前线战士服装，持着两杆旗帜的鲜明的闪耀中，放高嗓音，向聚集的农民群众，讲了我在斯德哥尔摩没有讲出来的话！当地政府机关报（Söderhamns-Kuriren）的记者，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把我讲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而且在次日的日报上还

摘要登载了一些片断。散会前，他们还通过了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案，和投交斯德哥尔摩日本公使馆转致日本政府的抗议书。

勒威克砍伐工人的集会

次晚，乘坐公共汽车赶赴勒威克砍伐工人的集会，一切过程与前一晚相仿佛，听众已增达五百余人，完全都是砍伐工人。他们的组织特别坚强，工人们斗争的精神和自觉比农民更显得坚决和彻底！会后使我感觉到较前一晚更兴奋，停留在那里，还和他们作了很长时间的私人谈话。

纳久任得——火柴工业发源地

第三日清晨告别了海员兄弟们全家，搭九时半的火车赴松兹瓦尔，下午一时半到达。沿途积雪更深，山岭连绵，居民多以滑雪代步，寒气直刺彻骨髓，绒衣皮衣全已穿上，皆不觉暖！那里是工业区。在车站上，有一位于前三日曾在司脱格松德遇见过的朋友来迎接我。他率领着五六个工人模样的朋友跟在后面，走过马路时，引得居民都用异常惊异的眼光注视我们。他叫别的朋友把我的手提箱送到 Ny Dag 报的分发所，并邀我到他的姐姐家里吃饭，据他说，他的妻子病了，进了医院，不能在他自己家里招待我。他的姐姐是一个年过半百和蔼可亲的妇人，她的三个女儿正在招待她们的女同学戏纸牌。吃过饭后，又和那个朋友赶到 Ny Dag 报分发所，和一切朋友们见面。寒暄后，和他们一块乘坐公共汽车到纳久任得。

我们在开会前先到了一所小木屋里，见到几个正讨论着当天开会内容的负责人，然后共同走到会场。到会听众约有六百人，

成绩尚佳。只是我讲罢以后感觉异常疲倦，头痛发热，似乎已被病魔纠缠。深夜里，公共汽车已经停驶了。我们都在晚风中，雪花扑面、脚下滑溜溜的，周身战栗不耐寒逼的情形下，徒步走回住处！同行的人们仍是照旧一样热烈地询问一切，我仅只能够一一作简单的答复，远不如往日那样兴奋。一个青年工人问得特别多，另一个工人出身的画家喜欢提些奇异的问题，似乎那样才符合艺术家的身份。深夜里他还跑十几里路，回家去了个来回，为的是取两张他的“杰作”，赠送给我，以为纪念。

我住在一个失业工人家里，也是一所木屋。他们一家三口，他和他的妻还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幼女，共住两间木屋，内间是书房兼卧房，外间是饭房兼厨房，虽十分简陋，却很清洁。他们看到我那样发高烧的情形，都十分焦灼，很快地找来医生给处方吃药了。他们又把床铺整理出来让我睡，他们一家就在厨房里一张破沙发上和地板上挤着睡！他们的那种感情呵，是在牺牲自己，便利别人的立场上表现的！我吃了药以后，向大家道了晚安，也来不及等到画家的回转，就倦眼朦胧地睡去了。

次晨起床后，精神虽较好，病躯尚未复原。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来邀我到附近的火柴工厂参观，可是他们都不通英德语，只好等待一位通英语的朋友马丁来了以后，才向工厂出发，一直走进了普洛特利亚的帐篷。巨大的木料从河里提起至锯成木片，甚至于制成小木杆，都完全是利用电力机器，工人们只是站在工作岗位上运转机器而已，那些新奇电气机器的引用，当然节省了人工，因而造成悲惨的失业现象。

工人们虽都忙于他们的工作，仍含笑和我打招呼，和我同去的几个失业工人与厂内工人都相熟识，因为他们从前都在厂内做

过工，最近因受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影响，才被裁而沦落到饥寒交迫的失业境况中！改良主义者十分聪明，为着压制及预防他们的暴乱，规定他们每周做两天工，因之给他们一点小惠，以充失业补救金。这些改良主义者的欺骗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参观工厂以后，在马丁家里喝午茶时，有两个工人跑来通知我，当地警察要检查我的护照，我必须马上赶到警署去！

众人怀着疑虑，我却泰然地带着笑容走到警署，他们检查过护照以后，那个“伪君子”般的署长——一个改良主义者讥笑我说：

“你一定是中国将来的伟人！”

“我不愿意当伟人，而且根本就没有伟人的资格与前途；只是我愿意与一些命运相同的人们把中国，甚至于这个世界造成一个自由之乡，消灭一切暴政的组织，那样比做伟人要快乐得多！”我驳答了他。

晚间，在松兹瓦尔的集会是在警察的监视下开幕的，到会听众约六百余，那个“称赞”我要做中国将来的伟人的署长，禁止我讲话，并且派暗探尾随我，调查我的行踪！

火柴工业发源地附近的治安是要改良主义者加意防范的！

克拉姆福尔斯的工人斗争

第二日的早晨，搭九点一刻的长途汽车离开了松兹瓦尔，愈北行愈感天气更加寒冷。公路旁，积雪盈尺，车道甚平坦，车行愈速则自窗隙透入寒气愈大！一些积雪中的木制矮屋，一些冻得颤抖不已的造纸工人们勤恳地工作着，但也有一些滑雪溜冰的男女青年，利用冬季运动追寻爱情，继续不断地从窗隙间掠过！有

时也会碰到一些乘坐精美的汽车，在大腿上遮着厚毛毡，嘴里含着烟斗，身上披着厚毛皮领大衣的绅士们飞驰而过。

车行两小时到赫鲁逊地方，车停休息约半小时，再继续登程，以免旅客劳顿。但我毫无什么“车马劳顿”的感觉。约摸又行二小时，抵达克拉姆福尔斯。在汽车站上，一位革命团体的领袖赫尔丝托门君（Soren Halstrom）迎接我。我们徒步走半小时余才到工人区的中心。一路上，凝固的冰雪，令人很难行动，而且又有小提箱累赘，走到目的地时已是汗流浃背、疲惫不堪了。赫君告诉我：该地警察仍禁止我讲话，而且还有警察正追随在我身后呢！因为那里正有四百余造纸工人极坚毅地参加了罢工斗争。

晚七时开会，到会听众约五百余，我虽然没有讲话，可是听到那些雄赳赳的罢工工人代表的报告，感到非常的欣悦和兴奋。

会场是在一个小山坡上，散会后，下山路滑溜异常，很容易摔跤，一些青年工人们很天真地彼此斗闹开玩笑，相互摔跤，非常有趣，他们彼此间谁也不恼怒，双方都有一种弟兄间友爱的表现，这才是无产者团结的象征呵！

参加革命大学生集会

在领略够了瑞北那寒刺骨髓的冰雪风光之后，与各城地方警察的追逐战也有些令人疲惫，但我却满载着瑞北工农大众真挚热诚的感情，又回到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刚下火车，被一位“苏联之友”的会员领到他们的办公室，要我马上念一篇演说稿给他翻译。接着领我参加了当晚一个“苏联之友”的同乐会。我先简单地讲了几句话，由他们翻译后，对到会群众宣读我的讲

稿。我因为疲劳已极，没等他们散会就回寓所去休息了，虽然同乐会上有精美茶点、跳舞等等，都没有把我吸引住，我疲倦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事后却有些后悔！

轰动全瑞典的中国人宣传演讲，也引起了革命学生们的兴趣，也许因为我也是学生的关系，Clarté一种红色学生组织邀请我讲话并讨论。

开会地址是在大学里的一间课室内，到会参加讨论的约有三十多个夹着大皮包的大学生。

我首先讲述了一些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以及在目前危急存亡之秋，中国知识分子英勇参加革命运动的事实。最后结论道：

“……今日的世界，没有中间阶层——知识阶级生存的可能，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不做现存社会的辩护人，就得做扬弃现实急流中的革命先锋。”听众中有些人默默不语而时时用铅笔记录一些备忘的内容；有些人常摇晃一下脑袋，似乎是在怀疑我的理由，或是觉得我过于武断。这十足是小布尔乔亚的习气，我并不怪他们。事实上，呈现我们眼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在昭示着：只有后一条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讨论的时候，他们除了问些他们怀疑的地方外，又提出一些我没有谈到的问题：如中国土地革命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固然，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及现阶段！我又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哥德堡的反战群众大会

哥德堡是瑞典滨海一大商埠，从首都乘坐快车，七小时左右可以抵达。我到哥德堡时有三位革命领袖在站上候接我，他们皆

通德语，其中一位名叫Maj（美姬）的女郎，身材相貌皆佳，亭亭玉立，更善于谈吐，她的德语程度最好，还能说几句英语，因之我和她谈话也较多。那两个男子中年长些的是她的父亲，老者邀我到他家晚餐，我当然也答应了。可是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在他家匆匆用罢晚餐，我们一同赶到了会场。

会场很宽敞，到会群众约两千余人。当晚我虽被禁止讲话，却仍照在斯德哥尔摩群众大会上的办法，坐在台上，由别人念读我的讲稿。他们为着表示对于禁止我讲话的抗议，又多生出了一些花样，派代表走上讲台，和我握手，说明未能说服警察允许我讲话的歉意！他们又派少年先锋队队员向我赠花致敬；最后还通过了抗议警察禁止我讲话的决议案，闹得颇为有声有色！大有酿成行动的可能！而且我讲稿的内容也稍有改变，对于当时某瑞典商船正装载着大批军火运往远东的事实完全揭穿，并攻击瑞典政府当局，对于他们借口“中日并未正式宣战”理由禁止我讲话一节，也痛加指责！这当然触怒了警察当局，所以散会前我已得到朋友的警告，叫我散会后，在前线斗士的护卫下，搭停在会场门前预备妥贴了的小轿车回去。当我正跨上汽车的时候，由对面的车门也跨进了一个警探，正当他要捉拿我时，却有前线斗士们把我抢回，而在街心和那些凶恶的警探们作了一阵交手恶斗。我偷了一个空隙，在另外几个斗士的保护下，抢着乘坐一位朋友安得生的汽车逃走，可恶的警探又派汽车尾随，用探灯照射。我们环城绕了一个圈，驶到某三岔路口时，汽车猛然慢行，使我和Maj父女三人跳下车，跑到暗中，躲在墙角里，安得生本人驶着他的汽车，仍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以哄骗追随我们的警探。果然，我们侥幸成功了。最后，安得生驶到郊外，故意停住车子，

让警探们检查了以后，反质问警探为什么尾随他，使他心神不定！警探们乃道歉而去，我那时却已平安地躲在安得生家里了。我们会到了安得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十七岁，高中学生，稍通英德语。二女儿十三岁，天真烂漫，极可爱，她为安慰我，虽是从梦中惊醒，仍是带着惊异和同情吻我，以示欢迎！

我们三人那晚就在他家客厅里挤着过夜。安得生差不多到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告诉我们：警察已搜查了很多住宅，大概也会到他家里来的。可是他已替我买好了一张回柏林的车票预备就捕时应付一阵。果然下午一时余来了一个穿便衣的警探，检查我的护照以后，要我随同他到警察厅去谈话，我答复他：

“对不住，来不及了！我马上就要赶火车！”我还把安得生替我购买的那张三点钟开行的火车票给他看。

他思索了一阵，只好说：“好吧，谢谢！”

很多革命同志，同时也有很多警探到车站送别。同志们开玩笑似地，高声喊着，举拳齐肩向我致斗争的敬礼送别！警探们的脑袋在人丛中探来探去，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聊！保卫谁？防范什么？他们只知道奉行命令！

车开行了，同志们还高举着拳头依依惜别。我临窗含笑向他们摇晃着右手，直到车离站已远，他们的影儿也由模糊而消逝了。我在车厢里碰到好几个朋友，他们曾告诉过我，哪个是跟我的密探！

过边界的时候，税关上的人员也对我冷笑了笑。

登上了德国的火车，与乘客们谈起来，又把近几日来的演讲稿背诵了一遍，虽然我已是很疲倦了，但我还是在异常兴奋之余，怀着任务达成的胜利感觉，踏上了归途！

（一九三四年于捷克）

后记：关于《北欧木屋中》

江 柏 舟

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抄完了父亲江晴恩的遗稿《北欧木屋中》。

将近五十年前写成的这部手稿，诞生在时局动荡的欧洲。参与这些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的中国革命志士本来就很少，而那次在冰天雪地里的北欧之行，更是除了瑞典同志外，只有父亲是中国人。我只好参阅了他在此前后的其他文稿和日记，访问了他这个时期的的部分战友，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他在秘密状态中不便直言的情况作个简略的说明。

父亲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今是中学与彭雪枫伯伯等一起参加党的活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在冯仲云、胡乔木等伯伯所在的中共清华大学支部工作，后来转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中共旅德支部谢唯进、王炳南伯伯领导下积极进行党的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受派参加了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后，他回到柏林，将会议的主要文件刻印成中文，广为散发和宣传。不久，又决定让他赴瑞典宣传这次大会的精神，争取瑞典工人声援和支持我国的抗日斗争。瑞典自一八一四年以来，就未遭到过战争，和平主义色彩很重，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力量甚大。欧洲早已象一个火药桶，它却依然象世外桃源，虽然瑞典也有罢工斗争，但在欧洲是

最微弱的，要在那里争取群众比较困难。瑞典政府的警察和密探也在严加防范共产党人的活动。《北欧木屋中》，就是写在瑞典的这段斗争生活。他对协助他完成这次任务的瑞典同志赫干生、Ny Dag报主笔、Lindgren、马丁、赫尔丝托门、Maj（美姬）和她的父亲，安得生一家和许多不知名的同志和朋友深怀着敬意。文稿约在一九三四年写于捷克。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父亲被驱逐出德国，在布拉格他和日本战友八木同志继续编辑原在柏林出版的《革命的亚洲》，在捷克改名为《东亚通讯》。《阿姆斯特丹》、《北欧木屋中》、《布拉格》等文都是这个时期写的，是他原计划写的自传体文稿《企光的自述》中的一些片断。后来在紧张的地下工作中，他根本无法考虑这个计划。直到一九四八年，他的工作被顾祝同怀疑，经鲁南区党委决定，将他转移到济南，一面养病，一面迎接解放，他才有时间找出这些旧稿。在他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把《企光的自述》这本东西抄录完毕，以后我好决定是否往下再写！第二部是《故乡系狱记》，我已经准备开始，但还没有眉目。第三部是《八年离乱》，记述抗日事迹，更是一本很难写的著作，如果这三部著作能顺利而成功的完成，我就是死也瞑目了。”这是他准备献给新中国的礼物。四个月后，济南解放了。遗憾的是，他忙于繁重的革命工作又无暇动笔，直到一年之后，在新中国诞生前二十天，他终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未能如愿以偿。

这次我在许多革命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整理遗稿，除了部分译名根据《世界地名辞典》作了校正，个别明显的笔误作了删改外，均按手稿抄录。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反“扫荡”五日记

钱 钧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我鲁中抗日战争最艰苦、最紧张的两年。日本侵略者“囚笼”政策被粉碎后，接着又提出所谓“强化政治”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到处挖封锁沟、封锁墙，建立据点，妄想将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互不联系的小块，然后再各个击破，以至消灭我山东抗日军民。一九四一年十月，日寇侵华军总司令畠俊六坐镇临沂，纠集了三二、一七、二〇、二一等四个师团和五、六、十等三个混成旅，加上伪军共五万余人，向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攻，把我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一一五师等指挥机关，压缩在南北不到八十里、东西不满七十里的地区，企图将我军民一网打尽。于是，又一次艰苦的反“扫荡”战斗打响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

这几天，我旅一直驻在旧寨以东的水塘崮、罗圈崖一带，注视着敌情的变化。当时，我是这个旅的副旅长兼参谋长。十一月一日这天早晨，从情报得知：新泰的敌人分成三路，正向我驻地方向移动；还有滋阳、蒙阴、泰安、费县、临沂、沂水、泗水、台儿庄的敌人也都出动了。公路上敌人的汽车、马队、坦克争相

滚进，各路敌人从四面八方朝水塘崮、罗圈崖方向运动，显然，敌人的矛头是指向我们。此时，我们接到了山东纵队指挥部的电示：保存力量，跳出包围圈就是胜利。

旅党委研究决定：由司令员王建安同志带领旅直属队先向金泉官庄转移，如敌人抢先发起进攻，便相机向鲁山区跑。副旅长胡奇才同志带领二团向泰山区跑。我带领一团坚持在水塘崮、罗圈崖一带山区活动。当我接受了要我留下来进行反“扫荡”的任务之后，感到这副担子很沉重，虽然我对这地方就象自己的手指一样熟悉，但我还是把地图打开，仔细、认真地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当我的视线在地图上扫视着的时候，藏兵万、司马寨等这些既便于部队隐蔽又便于打仗的地形，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暗暗下定决心：对！就这样，围着山和敌人推磨，你到东我到西，背靠墙打狗，看你鬼子把我奈何。

十一月三日

二日整夜没听到枪声，这是暴风雨前的沉寂。果然，三日天一亮，便从西南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我立即发报与山东指挥部联系，了解情况；谁知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联系上。我心急如火，便和团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派便衣出去侦察。结果，几次派出去的侦察员都回来了，没有一点头绪。这时的枪声更加激烈，我从枪声的方位判断：狡猾的敌人，想用“挖心”战术，绕过我们战斗部队，直扑我首脑机关……我为指挥部担心，为指挥部各位首长担心，因此，我心里非常焦急，决定派人继续侦察。

不久，侦察员带来了从指挥部突围出来的同志了解到的情

况，说指挥部被敌人包围了。情况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但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处境会这样严重。于是，我派团参谋长高文照同志带领一个营前去支援，其他两个营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部队刚刚到达田家北村东山附近，就同敌人接上火了。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经过一场激战后，敌人垮了下去。指挥部在我们的掩护下突围以后，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弱，又回头向我们追来。敌强我弱，不能恋战，必须迅速转移，否则，就有陷于敌人重围的危险，于是决定部队再回到旧寨以西地区。我命令三营先行，一营后卫。第二天清晨，部队到达疗养崮，这里是一条狭窄的山谷，二十余里弯弯曲曲的小道穿过其间，路两边突起的山峰直插入云，仰头看天，只见一条蓝线，谷中除中午有些阳光外，终日阴暗。

穿过这样的山崮，是不能有一点大意的。只要敌人有一个班的兵力放在制高点上，我们便寸步难行，所以，我马上命令前卫营登上山顶，抢占制高点，掩护部队前进。部队进入山崮不久，侦察员向我报告说前面发现了敌人，我还没来得及查明情况，前卫营已经同敌人打上了，幸好制高点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敌人在我前卫营居高临下的突然打击下，象茅坑里的蛆一样乱作一团，拥挤在狭窄的山谷里，进退两难。还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已被打倒了好几个。

从以上情况可以判断：敌人不是有准备地在这里打阻击的，可能是要到田家北村去合击我们，没想到在这里遭遇了。好吧，既然碰上了那就干一下吧。

狭窄的山谷，兵力很难展开，火力也不易发挥，我命令战士们发挥手榴弹的优势，这玩艺短兵相接最有威力，打得敌人哇哇

直叫。敌人在绝望之余，不停地向天空发信号弹求救。过了不久，天空传来了马达声，接着，两架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山顶上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我对战士们喊道：“别理它，天上那样多的鸦雀拉屎也没掉在我们头上，两架飞机下‘蛋’就能炸着我们？！没那么准，同志们狠狠地打。”

突然，在我身后轰然一声巨响，我回头去看，一股黑烟冲天，炸弹在山谷里爆炸了，损失了两匹骡子。

就这样一条狭窄的山谷里，我们和敌人打了整整一天，到晚上，敌人撤退了，他们除丢下一片尸体外，什么也没得到。我们为指挥部的突围争取了时间，无一伤亡，胜利地翻过了疗养圈。

十一月四日

半夜的时候，部队到达燕子，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一条小河从中穿过，把村子分为南燕子北燕子。团部和直属队带一个营驻南燕子。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了河北岸有人饮马，那边并没有我们的部队，又不象群众，是什么人呢？随着天色的明亮，反复仔细地观察，原来是敌人。我们的同志真不愧是久经锻炼的战士，他们一点也不慌张，非常机警、沉着地把情况报告了司令部。

根据哨兵的报告，我拿起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了一遍，可不是，北燕子周围的大小村庄，住满了敌人。我估计：敌人也许已经发觉了我们，可能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因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暂时不敢动手。这时，我十分了解全团的处境，我们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一旦打响，四面八方的敌人就会象包饺子

一样地把我们包围起来。

敌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但既不能战斗也不能转移，大白天，一个团的行动，很容易暴露目标，只有隐蔽，等到半夜再行动。好在司马寨驻有我们两个营，可成为犄角，那里是突起的山岭，有的山口，只要架上一挺机枪，一万个鬼子也别想攻上去。于是，我命令部队，在隐蔽好的同时，作好战斗准备。我们的战士“点”子也真多，他们把帽子上的两个纽扣拿了下来，使敌人摸不清我们是哪一部分的人。这一天显得特别长，过得特别慢，我真希望太阳一下子掉下去……

行动的时刻终于盼来了。天黑下来以后，我们向土门太公峪转移。部队离开南燕子还不到两袋烟的工夫，背后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扑空了。这时已过午夜，北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地痛，但是我的心里却热乎乎的，因为我们打垮了敌人的阻击又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谁知部队行至温村的时候，团长李福泽向我报告说：“村里有敌人，不知是鬼子还是伪军。”

“管他是什么军，反正不是自己人。快上马，继续前进！”同时，我要他向部队传达我的命令：“速度要快，行动要肃静。”因为，现在部队已误入敌人防区，只有利用敌人的错觉，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闯过去。敌人怎么也料不到八路军会大摇大摆地在他们面前行进，同时我也做好了万一被敌人发现后的应急措施。我骑在马上刚过了敌人的驻地，发现二营没有跟上来，便派骑兵班长带一名战士回去联络。他们刚走不久，便从后面传来了枪声。

到达宿营地不久，二营也随后赶了上来，骑兵班长也同时回来了。他向我汇报了联络的情况以后，说：“参谋长，今天真危

险，我们是从鬼子的空档里穿过来的。”他接着说：“我去联络时，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找老乡买点东西吃，我刚推开一家老乡的门，里面黑洞洞的，我正朝里走，谁知一脚踏在人的身上。‘八格呀噜’，哎呀，睡了一屋的鬼子，我赶紧上马，调头就跑。”

我听了这位班长既惊险又风趣的谈话，不由得笑了起来。多么机警勇敢的战士，在敌人的重围里，他们如入无人之境。

十一月五日

我们与指挥部联系上了。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团立即跳出敌人重围，到罗川崖一带集中。

部队已到达金钱关，再过一条小河，向西走不远就是罗川崖。在过河的时候，我按照惯例，先派出前卫营到河西，一面了解情况，一面掩护全团的同志过河。

前卫营刚刚到了河西，便发现南面一公里处象打了烟幕弹似的，尘土飞扬，烟云滚滚。是群众还是敌人？是鬼子还是伪军？一时弄不清楚。我命令前卫营就地隐蔽观察；不久，过来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都是伪军打扮，看神气却又不象是中国人。敌人押着满载鸡鸭的大小车辆，赶着成群的牛羊，顺着河边的公路向北走，显然，这些东西都是从群众那儿抢来的。我看着耀武扬威的敌人，想到群众的灾难，便暗暗定下战斗决心：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把群众的东西夺回来。于是，我命令其他两个营迅速过河，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山上，打它个措手不及。

敌人越来越近，那些发了洋财的敌人，已经走进了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打！”我一声令下，步枪、机枪象雨点似的向敌人扫去。敌人招架不住，调头朝河东逃跑，东面的部队又用手榴弹

把他们打了回来。两个营的兵力，把敌人紧紧地压缩在干涸了的河滩上。当我们的战士出现在敌人面前时，敌人不是缴枪投降，而是顽固地抵抗。这出乎我的意外，往常，伪军在我英勇战士的面前，一触即垮，今天的敌人，非但不溃退，反而端起刺刀“呀—呀—”地朝我们反扑过来，眼前的敌人到底是真鬼子还是假鬼子？经侦察，原来这些二鬼子是真鬼子化装的。我听了这个意外的情况，又好气又好笑，这些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天皇”子孙们，也怕死啊。我向部队揭穿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激起了战士们的无比仇恨，决心消灭这股敌人，于是，一场恶战在河滩上展开了。子弹象爆豆似的响成一片，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开花，刺刀闪着青光刺向敌人的胸膛……鬼子被打得到处找地方隐蔽自己，然而，平平的河滩上，没有一处是他们藏身之地，趴下去的鬼子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战斗结束以后，由一部分同志负责把夺回来的牲畜、家禽送还给当地群众，一位老大爷紧握着战士的手，指着他的老黄牛，流着眼泪说：“这是同志们用命换回来的呀……”

晚上，战士们风趣地谈着真鬼子冒充假鬼子的故事，自豪地谈着战斗的胜利，整个部队，在欢声笑语中前进！

赣 南 追 斥 战

张 兴 华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北京香山接见我们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主席说：“你们这一次下江南要穷追猛打，是中国的地方都要去，都要解放。”有人问遇到美、英帝国主义的军队打不打？主席放开嗓子高声说：“打！象打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地打。中国历史上有个曹操三十万大军下江南，打了败仗回来，我们三百万大军下江南，可不能象曹操那样回来。”

在向江南进军的途中，我四十八军贺晋年军长还对我们强调说：你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穷追猛打”的指示，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不要等待命令，枪声就是命令，打了以后再告诉我们也行。经过反复的思想教育准备，毛主席“穷追猛打”的精神，从干部到战士，从作战人员到后勤人员，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进军赣南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收复赣州 追歼逃敌

六月下旬，我四野四十八军在九江渡过长江进入江西，七月二十日，军部在樟树对各师布置了进入赣南后的任务：一百四十二师围歼吉安地区之敌，一百四十四师围歼瑞金地区之敌。当时我任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奉命带本师和军部的一个炮兵团，围歼

赣州和赣州以南之敌，这个地区驻有国民党七十七军和六十九军，以及几个独立团，保安团残部等，虽然敌军人数、军械比我军多，但敌军已成惊弓之鸟。我军刚到赣州地区，敌军就逃跑。我们当即命令各部队发起攻击，穷追猛打，强调在追歼中要发扬“穷追不舍，孤胆作战”的精神，一人追上，就一人先打；一个部队追上，就一个部队先打，不给敌人喘息、逃跑的机会。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我部队进入赣州城南七、八里处，得知敌军已于当天拂晓五点钟左右逃出赣州城，由信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方向逃跑。我们当即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十分钟，吃点干粮，并抓紧时间开了几分钟的团级干部会，刘政委对大家说：“穷追猛打”的时候到了。我给部队布置了任务：五十七团从小路直插信丰，争取抢占信丰桥，切断敌军后路，包围敌军一部或全部；五十八团、五十九团，炮团和师部由公路经南康向信丰前进，两路部队都要随时准备打仗，正面一打响，侧面就马上包围上去。

赣州到信丰一百五十华里左右，我们部队以每小时二十华里的速度前进。下午四时，两路队伍都追上了敌人，与敌人的后卫部队打响了，五点左右就有大批大批的俘虏押下来。根据当时我军南下，敌我斗争的有利形势，我很快通知前面部队，对抓到的大批战俘让他们原地集中，不要再往后送了，叫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编制原封不动，是连长的当连长，营长的当营长，团师两级不要。连、营长主要管两条：一是管生活吃饭，二是管组织纪律。有一战俘连长说：“长官，你们不要打枪，只要包围上去就可以缴枪呀。”这连长的话确实反映了当时敌军官兵已不愿再打的精神状况。我还让通讯员马上通知前面部队，要抓住战机，千

方百计包围敌人，只要敌军不再顽抗，不先对我方开枪，我方就不先开枪打击他们。

从赣州到信丰的一路上，到处是敌军遗弃的汽车、手推车、皮箱、挑子、背包……乱七八糟的东西把交通都阻塞了，漫山遍野都是被风吹散的文件纸张，片片皑白，七月的江南，象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敌军逃跑时的狼狈相由此可见一斑。

巧 夺 信 丰 桥

天色已黑，各部队仍不知疲倦地向前猛追逃敌。我们的三个步兵团都插到前面去了。我爬上公路右侧的山头向前看，好家伙，几十里路都有枪声、火光，已分不出哪里是敌我双方的分界线了。师作战科长郭声九同志说：“真象孙悟空一样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去了，看他投降不投降。”象这样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的战斗，又发生在夜间，炮兵一点也用不上，炮团留下一半人看炮，另一半人拿起缴获的步枪随步兵到前面去了，师部的一千多人除实在走不开的外，也都到前面去了。

信丰一战的关键是夺取信丰桥，信丰桥是赣南通往广东的唯一大桥，有一百多公尺宽，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追击，在大桥上装放了成吨炸药，准备在危急时把大桥炸毁，守桥部队是敌六十九军的一个连。接受了夺取大桥任务的我师董存瑞连带了敌七十七军警卫连的两个解放战士，化装成敌七十七军警卫连去替换守桥部队。敌人在桥西布置了一个排的兵力，连部及另两个排布置在桥东，我董存瑞连来到桥西面时天已黑了，只听到守桥敌军在问：“你们是哪个部队？”我方回答：“七十七军警卫连，奉命来接替守桥任务，换你们下去休息准备南撤，共军和我们打起来

了，你们听到枪声没有？”对方答：“又不是聋子，早听到了。”我方问：“你们在桥西面放多少兵力？”对方答：“一个排。”“那我们也放一个排好了，你们放几个哨兵？”“两个。”“情况这样紧张两个行吗？”“那你们就放四个嘛，等打个电话给连长就与你们换。”敌排长摇了一阵电话没摇通，我方趁机说：“算了，算了，还摇什么，快下去休息吧，还要赶路的。”“那你们走不走？”“我们可能等天亮才走。”桥西面的守敌毫不迟疑地撤走了，我军一个连长，带了一个解放战士和两个排的兵力很快跟过桥去，一面过桥，一面把桥上引爆炸药的电线剪断。桥东的敌人可没桥西面的那样老实，我们进入炮楼后他们仍不肯撤走，要等上级指示，我方一面跟他们扯皮，一面将三、四层换下来，我军连长对他们说：“你们不换也行，我们也是奉命来守桥，那你们守一、二层，我们守三、四层”，不等敌人回答，连长随即对我方战士命令道：“七十七军警卫连全部上三、四层。”刚上完就向二楼扔下去两颗手榴弹，“轰、轰”两声巨响后，只见二十多人，一下就伤了十几个，我们对那些伤兵喊话说：“这下看你们换不换，敬酒不吃，吃罚酒，赶快告诉一楼，快点把一楼也腾出来，不然也给他们两颗手榴弹！”伤兵在楼门口往下看，一楼早已没人了，我方未伤一人就将信丰桥顺利巧夺到手了。

没过多久，桥西的枪声突然激烈起来。原来是六十九军残部要过桥，被我方守桥部队打了回去，六十九军以为对方误会了，就对着碉堡高喊：“七十七军大哥，你们不要打了，我们是六十九军，要过桥去。”又是一阵机枪、步枪声，喊声没有了。又过了一阵，敌七十七军警卫连来了：“我们是七十七军警卫连，要过桥去，你们不要打了。”随着一阵枪声过后，对方倒下好几人，

又没有人喊了。不一会又来一伙：“我们是×师×团要过桥去。”我方战士回答：“你们想逃跑吧，没有军长的命令不许过桥。”对方答道：“我们就是送军长来的，军长就在这儿。”“叫军长亲自来才能过桥。”“好，你们不要打枪，陈军长马上就来。”一会儿，有两个人朝碉堡走来，到跟前时，战俘认出真是七十七军的陈军长，叫他过来了，乖乖当了俘虏。战斗快结束时，我和师指挥部来到桥西，见敌军尸体成堆，为了确定我先头部队的方位，一面很快通知山炮上来，一面吹号联络，河那边答号是董存瑞连，我们高兴的会师后，我对他们说：“你们连打得好，为夜战信丰立了大功。”

信丰一战抓了七千多俘虏，我们对战俘部队临时定了几条：编制不动，原地驻下，可以做饭，可以睡觉，可以夫妻团圆，可以保管原来武器，可以保管原来财物。另外还规定了五条纪律：一、不准打枪，二、不准逃跑，三、不准破坏武器，四、不准抢东西，五、不准强奸妇女。我们临时定的几条对安定战俘起了很大作用，很快就把混乱的战俘组织起来了。有的战俘说：“早知共产党、解放军对我们这样好早就不走了，也不用打了，在赣州不动多好呀。”“共产党对我们这样宽大，不让人害怕，天下一定是你们的。”“解放军如果要我，我就跟你们当兵了。”

敌军逃跑时被抓去的几千民伕也解放了，他们拉着我们战士的手说：“早几天就梦到红军回来了，你们走了十五年，刮民党、遭殃军搞得我们家破人亡，从赣州逃跑时十家抢得九家空，该死的遭殃军也有了今天。”

我军一个班俘敌两千余

信丰解放后，我军人不卸装，马不停蹄，继续猛追逃敌。七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带师部警卫连一个班和电台向龙南前进，行进中通讯员报告：“前面五、六百公尺，右侧出来许多敌人，估计有两千多，朝我们方向打了几枪。”我估计是逃散的敌军，敌众我寡，必须以我军的政治、军事优势瓦解敌人。我马上进行布置：“机枪和电台跟我上中间山头，其余步枪上两侧山头，前面左侧和右侧的山头各去一人，带上红旗，越快越好，占了山头就是胜利。”又对李参谋说：“你带一个通讯员去喊话。”我们占的四个小山头都插上了红旗，我们所有的武器，机枪、步枪、两支二十响快机、几支冲锋枪先后打了几百发子弹，敌军也还了几十枪，插在山头上的红旗都被穿了一个洞。这时李参谋对敌军高声喊起话来：“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首先我们解放军不打了。”我们所占的几个山头的枪声马上停了，李参谋又接着喊：“双方都不要打了，派出代表来谈判好不好。”对方回答：“你先过来，你过来谈。”李参谋答：“可以，我过去谈，双方都不要打枪，我不带枪去，你们放心了吧。”李参谋过去向他们宣传了昨夜打信丰的情况和我军的俘虏政策，如同意投降就到信丰集中，对方表示早几天就不想走，不想打了，愿意投降。这里离信丰城五十多里，我派通讯员送他们去，对他们的团长和副团长说：“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我们通讯员的安全，我们相信你们，你们要为我们负责，通讯员出了问题，对你们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是没有好处的。”对方连连表示没问题，只要他们在，通讯员就在。待他们走完，我们又继续沿公路前进，途中遇到敌一个班，一个连

的散兵，我们让他们组织起来，自己去信丰集中的事例就更多了。

解 放 龙 南

连续四天四夜的追击，我部队比较疲乏，战士四天来没有正式睡过一觉，都是一面走路一面睡觉。一个战士说：“给我睡三十分钟就好了。”另一个战士说：“你要求太高，给我睡十分钟就满意了，解放了全中国我请假，不吃饭，睡它七天七夜。”

追击中，战斗往往在公路上进行，边打边前进，公路上横七竖八的都是敌人的尸体。后面的部队沿公路向前行进时，只要前面一停，后面困极了的战士倒下就睡着了，有的睡在死人堆里，甚至把死人当枕头也不知道。部队一前进，又才起来跟着走。天亮时，后面的战士问：“你是不是挂花了？”前面的战士在自己身上左摸摸，右看看，身上一点也不痛：“没有挂彩啊。”“那你衣服裤子上那样多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另一个战士说：“一定是他刚才同死人一起睡觉了。”

前进中召开干部会也只能开五分钟，开十分钟就很难坚持不打瞌睡。有一次我去看地形，拿着望远镜朝敌人阵地那边看，看到许多机枪，我就一挺、两挺的数着，不知数到多少就睡着了，突然，叭、叭、叭几声枪响把我惊醒了，原来敌人发现了我们，开了枪，把我的帽子也打掉了。

我有一匹快黄马，最快一小时可走三十公里，几天来它也乏了，随部队前进时我骑在马上打瞌睡，走着走着马一下摔倒了，我也被摔在地上，我火了，怎么在大公路上走还摔跤，拿起鞭子要打它，只见它眼里充满眼泪，似乎感到很委屈，我的心软了，放下鞭子，马确实太乏了，不能怪它。

下半夜，我们追到龙南城下，在城里作垂死挣扎的守敌有两、三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朝城外打着，子弹打到哪里去了只有天才知道，不一会机枪的射击声也停下来了。我方一个伤亡也没有，也没打枪，战士们静悄悄的从侧面包围上去，才发现守敌趴在街上和公路两旁都睡着了。我军战士面对他们高喊：“起来，起来，你们解放了，进房子去好好睡吧。”敌军俘虏眼睛都睁不开，象说梦话似地回答：“我们解放了，就让我们在原地睡一下吧。机枪、步枪，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刚才军官用鞭子打都没醒过来。”我军指挥员看这情况，就对战士说：“让他们睡两个小时再叫好了，除用两个连看守他们外，其余部队原地休息一个小时继续前进。”龙南城一个师的敌军就这样在梦中做了俘虏。

与游击队会师

龙南解放之后，我军继续沿着公路向全南方向乘胜追击，敌军见我们追得太猛，就往两边山林小路逃跑。沿途，两边山里都能听到枪声，是什么人打的呢？两边山里我们又没派部队去，大白天，敌军也不会发生误会，自己打自己，而且东打打，西打打，战线又这样长，到底是谁打的呢？我们向当地老乡了解，知道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是当年红军北上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就请老乡给他们带封信，让他们到全南城与我们联络。

第二天，游击队派来的代表在已解放了的龙南城与南方局领导同志方方等见了面。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活捉了白军一千多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胜仗，机枪、步枪都是美国造的，这些该死的白军，我们把他们都捆起来了。”我们说：“我们在信丰、龙南抓的俘虏，连武器都没有下他们的，叫他们自己

管理自己。”“那他们跑了怎么办？”“将来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他们能跑到哪儿去？”大家一听都笑了，游击队的代表当即派人回去通知各区不必捆俘虏了，象大军一样组织班排连，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极艰难的处境中坚持斗争了十五年，身上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没鞋穿，光着脚板。我部队通讯员到被缴获的敌军仓库里拿衣服给他们穿，他们见是国民党军的服装就说：“国民党的衣服，我们就是光着身子也不穿。”“那我们的衣服你们穿不穿？”“你们的当然穿。”“每人抽一套衣服，一双鞋子给你们。”游击队的同志热情地说：“鞋子我们不要，留给大军穿，你们一天跑那么多路，我们还要做鞋送给你们呢。”

有几个女游击队员都是男同志装扮，我问其中一个：“你多大了？”她说：“你们离开江西根据地那年我二十岁，你们一走十五年，现在回来了，你说我有多大了？”“噢，二十加十五，三十五岁，有几个小孩了？”几个女同志一起“格格”地笑了：“还没结婚，哪来的孩子。”“中国不解放，我们就不结婚。”我们说：“全中国快解放了，你们也该结婚了，我们祝你们今年结婚。”她们回答：“我们祝全国解放。”

赣南追歼战经过七天七夜的穷追猛打，胜利结束，共歼敌两个军，六个师，六个保安团残部，其中打死一千多，俘获一万五千多，包括营、团、师和军级的军官六百多人，我方仅在追击中晕倒而牺牲三十七人，战斗中牺牲三人，负伤二十多人。这次战斗，以小的代价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穷追猛打的战斗精神，它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一块基石。

（一九八二年一月）

陈郁同志在全国海员总工会

陈修良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我刚被上海英租界虹口区看守所判为“误拘”而释放出来。原丝厂工会（行动委员会）党团书记阿金同志通知我：“中央决定派你去全国海员总工会（行动委员会）工作，党团书记陈郁同志直接去找你面谈，他叫阿郁。”陈郁同志是广东省港大罢工的工人领袖，他的大名，如雷贯耳，我高兴地等待他的光临。

过了几天，我正在家里守候，忽然听到楼梯上脚步响，一个高个子，大眼睛，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人走上我的三层阁楼，他操着广东话问我：“你是小陈吗？阿金要我来看你。”一提到阿金的名字，我马上猜到这个来客一定是陈郁同志。我说：“是的，你是阿郁吗？”他回答说：“正是，你这次被巡捕抓去的经过，我们全知道，你辛苦了，我代表组织向你慰问，今后我们将在一起战斗了。”阿郁同志和蔼可亲的神态，使我前不久在敌人的监牢、法庭上被威胁利诱的紧张心情，顿时松懈，好象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一样的幸福。阿郁同志看了四周的地方，他说：“这里的板壁有缝，不好说话，你跟我去，到我的家里去谈谈吧。”

阿郁同志住在离东华德路不远的一条街上，他同妻女三人住在一间后楼内，除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方桌，凳子以外，没有空间

可以放家具了。他的小女儿阿 B 还只有两三岁，睡在床头旁边一个空档，铺上一块木板，算是她的小床了。阿郁同志很爱这个女儿，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叫“阿 B”。阿郁同志说：“‘B’是‘布尔什维克’英文第一个拼音字母，因为我相信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所以命名为‘阿 B’。”他的妻子叫阿娥（即杨杏娥），是一个女工，她掩护机关，作内部交通，烧饭，带孩子。阿郁坐在床沿边，我坐在凳上，就这样布置我的工作任务了。他说：“你的主要任务是编好‘海总’机关报《赤海报》，同时兼任‘海总’的秘书，担任起草党的重要通告与指示信等等。”我说：“我不是海员出身，怕是负担不了。”他说：“这个无妨，你跟着我们上船，听海员们的谈话，便会写出好的报道。”幸而我能听懂普通的广东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就这样接受了他给我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九月下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夜，正是立三路线统治时代，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即七月的中国问题决议精神，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以及“长沙十天的苏维埃，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军斗争。”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中央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可以形成客观的革命形势”，因此上海要组织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指挥武装暴动的机构。李立三同志取消了党、团、工会的各种组织，把党、团员统一合并组织在行动委员会内，这样古怪的作法，当然谈不到“加强党的领导”，海员总工会就是这种“行动委员会”的重要支柱之一，直属于中央的领导。其他还有铁路、丝厂、纱厂等等的产业工会也按此方式改变了组织的性质。“海总”内部的干部全部是党员，由党组织委派，工会机关成了党的秘密机关，而工作对象

是海员工人，内外不分，公开与秘密不分。“海总”的赤色工会会员比较多一些（我是从丝厂工会的情况作为对比来看的），所以称为“实力派”。为什么海员工会的人数比较多一些，因为海员工人还是相信“赤红工会”（老工会），大革命时工会的政治影响相当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员们多在外洋，被捕被杀的相对的少，所以还保留一部分革命的实力。“海总”的组织基础主要在外洋轮，但也没有正式的工会组织名称，要想作出统计，是不可能的。陈郁同志在海员中间确实有威信，我经常跟他上船，那些老海员非常热烈地接待他，呼为“阿郁”。他也常给《赤海报》写文章，化名“阿郁”、“有邑”等等。“海总”的另一种势力是长江航运，长江船上的工人多数是江浙人，宁波人很多，朱宝庭同志就是宁波工人中的领袖，“五卅”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他也有威信，阿郁同志很能团结这一帮海员工人，叫朱为“阿缺”（因为他的嘴唇缺了一大块）。由于“海总”内部团结比较好，虽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还是能够作些群众工作，还能出版油印的《赤海报》。但这样做法同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同志领导的中央所要求的是大相径庭的，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组织过“总同盟罢工”或者实行“武装暴动”，夺取轮船，组织起义。以陈郁同志为首的“海总”，比较实事求是，他不喜欢吹牛拍马，他想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争取工人的切身利益，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所以在这一时期“海总”的组织还没有遭到致命性的破坏，领导机关还可开扩大会议。“海总”党团在四中全会以后，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恐怕与这种作法是有关系的。总而言之，中央内部确实存在意见的分歧。

九月下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陈郁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进行传达，批评了立三路线“过左”，否定了“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改革。正在议论纷纷的期间，次年一月七日召开了第四次中央全会，发出了“决议”，党内立即发生分裂。

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也好，四中全会也好，都说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实践证明立三路线行不通，我们一致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来一次转变。但使人失望，三中全会仍然换汤不换药，一再强调“七月的国际指示信的正确性”，迷信国际的思想，实在是惊人的，不许公开在会议上争论，只好背后窃窃私议。所谓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够“左”呢，还是“右”了呢，分不清楚是非。陈郁同志当时的头脑也并不清醒，他对“国际”也有一定的迷信，党内的家长制度束缚了他的思想，所以在“海总”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都没有及时指出与改变，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人们可以放开思想，放开手脚去实行彻底的改造。例如说《赤海报》问题，我们仍然提出过时的、过左的政治口号，如“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建立苏维埃”等，不触及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对于这类刊物非但不大欢迎，实在非常害怕。我有一次在外洋轮上发现《赤海报》成包地放在舱内，没有发出去。我们也看到了党与工会工作的危机——严重脱离群众。发疯了的敌人正在到处追捕我们，而我们的机关根本不象“秘密机关”，也不象公开的工会机关，随时都有被破获的可能，无法抵抗外部的进攻势力。所谓“扩大党的组织”，也都成为空谈。陈郁同志面对这种情况，内心中是担心的，但他每天还是召开“碰头会”，党团成员如阿

缺、李海（宣传部长）和我，都一定参加，此外如长江线的巴人、吴福海等同志也都到会。这种会只开一小时左右，主要是了解每日的情况，有哪些船到上海，分配干部上船去联络，很少布置具体工作。最多不外是了解工人的政治思想，传达一些指示，或者发发《赤海报》，至于发展党团员、工会会员的事，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我们的一个根本错误观点，就是迫不及待要“行动”，谁会去想巩固组织作好长期打算呢！

在这个时期中，陈郁同志带领大家埋头苦干，谁也没注意到党内宗派主义的严重，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主义的小集团，紧紧依靠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为首的国际驻中共的代表团，他们正在伺机发动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排斥打击所有不听话的老干部。当时王明正在被留党察看中（因为他曾被捕一次，托人带巡捕到中央宣传部机关觅保，被处分），他的宗派集团的几个要员也受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谁会想到米夫不经党中央的讨论与决定，突然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拿出米夫、王明写好的“决议”，强迫在会上通过，而且立即撤换了中央的领导人员，大批留苏回来的王明宗派集团的人，参加了党、团、工会等的领导机关。谁会想到王明立即登上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使全党的命运落在这样一个政治野心家的手里呢！四中全会是出其不意地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了，陈郁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足有二天的时间关闭在那个会场里面。他回来后，向“海总”的二十多个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四中全会的决议，他非常气愤这次会的不民主作风，非常不满意四中全会的决议内容。他说过，三中全会决议没有解决立三路线问题，四中全会也没有解决路线问题。大家听了以后也同样表示不满，一致不同意米夫、王

明等人改组中央的领导班子，明确地指出王明不能担负中央的主要领导工作。那几天的“海总”党团会讨论很热烈，陈郁同志立即提出，用党团名义起草一个申明书给中央，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要求中央另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当前的政治任务问题，同时指定我为申明书的起草人。次日我写好后给他看过，并在会上讨论，经一致同意才发到中央机关去。不料这件事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海总”党团敢于第一个冒尖，对王明等人进行批评，引起了他们的严重惊慌，认为“海总”党团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反对“国际”，反对中央，再三找陈郁同志去谈话，强迫他写“悔过书”，否则就要严重处分。正在这个时候，一月十七日突然发生了“东方旅社事件”，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三位同志被人告密而被捕，总工会负责人罗章龙、徐锡根、张金宝、王克全等人组织了非常委员会，公开在组织上搞分裂。王明一伙得意忘形，处罚了许多干部，或者强迫写“悔过书”，油印成传单，发给各单位，这类东西多数落在敌人的手里，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他们强词夺理地说：“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国际路线”，还幸灾乐祸地说二十三位同志的被捕是因为他们反党，早知会发生这类事情。这样一来党团思想陷入极度混乱，随着出现了有人叛变，有人消极等坏现象，党团工会组织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地步。陈郁同志十分痛心，他表示坚决与“非常委员会”划清界限，以避免形成更糟的分裂局面。迫于形势，为了团结，他只好同意写“悔过书”，表示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这个东西是他自己写的，后来也油印发给了下级机关。“悔过书”满天飞，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谁也闹不清，只知道“左比右好”，右倾机会主

义到底是什么也并不清楚，人们当时记忆犹新的是中央全会决议中的一段话：

“右倾的估量就是否认全国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涨事实，而认为应该抛弃准备总同盟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这都是违背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的，而右倾的估量简直是投降政策——客观上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右倾 = 取消派 = 奸细”，这样大的帽子如何吃得消？陈郁同志私下对我说过：“如果不写悔过书，我就要被开除党籍了。”至于地位低的干部，王明倒不来强迫写悔过书，我因此逃脱了写这种可笑的“悔过书”。

二月七日林育南等二十三位同志在龙华壮烈牺牲，我们机关的全体同志默默哀悼，向烈士致敬，王明一伙却在那里兴高采烈，庆祝“胜利”。王明住进了大洋房，真正是“一面在庄严地工作，一面在荒淫无耻”！

二月间，“海总”党团召开了一次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新提拔的中央组织部长赵云（即康生）前来出席。此会由陈郁同志主持，形势十分紧张，要陈郁同志当场检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的检讨，大致内容是：“一贯执行立三路线（认为立三路线也是‘右’的），后来又拥护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现在是反对完全正确的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这样不伦不类的所谓“检讨”，现在的人们听起来一定会哄堂大笑吧，实则不然，只有这样说一通，才能过得过。这里主要的是表示了打倒李立三与瞿秋白，忠心地拥护王明为首的党中央！谁能在这种场合辨明是非呢！

康生听了以后表示满意，也着实夸奖了他一番。我想不到会

议的最后一刻钟，康生立即提出了意见，宣布停止我的工作，理由是我在“海总”党团内起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他引证了“海总”党团的申明中的一段话，证明我是“右派”。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立三路线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破坏了工会的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的组织，破坏了红军，使中国革命推迟了”。“四中全会的决议还说立三路线是‘右’倾，难道还要更‘左’吗？”康生给我定了性，还在中央出版的油印刊物《宣传者》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海总”党团的申明书的起草者是“右派”的报道。这是我第一次被康生等定为“右派”的小故事。奇怪的是，为什么海总的领导人陈郁同志没有加上“右派”帽子，偏偏这顶大帽子落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头上呢？而且使人不解的是他还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当时议论甚多，不知其意。其实我们彼此心中有数，这是王明宗派集团打击报复掩人耳目的狡猾手段。对于陈郁同志来说，因为他是有名的工人领袖，“国际”正在强调要提拔工人干部，如果政治局没有工人成份的干部，“国际”是批不准的。更加阴险的是“欲擒之必先维之”，暂时让一步，以便后来收拾他。对于我却不然，因为我是知识分子。我们在苏联“中大”学习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同学，被米夫—王明戴上右派或托派帽子，被无故开除了。他们更恨的是在于我在“中大”时坚决反对以王明为首的支部局，同中共代表团相接近，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与成员邓中夏同志等在四中全会时同时下台，我又岂能逃过他们的掌心，给我“停职”处分，实在是很宽大的了。吴福海同志在“中大”时是反支部派余笃之、李剑如同志的拥护者，也是坚决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而且再三劝说，也不能“悔过”的人，却没有遭到我的命运，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工人出身。但并不因此信任他，他们采取更隐蔽的手段加以“无情打击”，当时条件下就是“调动工作”，实际上不再分配工作，不接党的关系，无形地开除出党，他的后来的遭遇，也是惨的。

林育南烈士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在他被捕前两天给他的爱人陆若冰同志的信中有一段话，非常沉痛地描述了王明一伙“残酷打击”干部的情景，相当动人，他写道：“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稀’，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这里林育南同志指的正是埋藏在党内的不拿枪的敌人——王明、康生之类！六十多年的党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我被“停职”以后，抱病在床，陈郁同志还经常来看望我。陈郁同志对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他对我的母亲也很尊敬。我的母亲有一次买了一个沙田柚请他吃，问他：“这叫什么？”陈郁同志说：“这叫绿柚。”母亲听了这句广东话，很觉有趣，以后一直称呼他为“绿柚”。我的母亲一九七五年八月病逝之前，还经常问我“绿柚”在哪里。由此可知陈郁同志的深情厚谊，感人之深。她问我最多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关心陈郁同志一定也在遭殃中。

解放以后，一九五三年我在上海工作，陈郁同志突然跑来看我。我们一别多年，天南地北，谁也不知道生死存亡。他非常高兴地说：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王明领导的中央就决定要他去莫斯科学习，他去后又被“无情斗争”，清算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老账，结果是被送到工厂劳改了六、七年，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冬，遥望故国山河，真象苏武牧羊。王明、康生终于报复了前仇。中国抗战以后才由周恩来同志向共产国际提出，让陈郁同志重返祖国的延

安。党的“七大”开会时，选举党中央委员，他不愿投王明的票，由于毛主席动员，他也只好选他一票。我听了后，不觉惊叹至极，他真是宽大为怀！

一九五七年我又一次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自由可以与老战友互通音讯，我不知道陈郁同志是怎样的生活。“文革”时期，我一个人住在杭州，受尽了折磨。我的老母也一个人在上海，她双目失明，带着疾病度过她晚年的最孤独的生活。我的女儿远在临潼作技术员，她希望把我的女儿调到上海照顾两个孩子（女儿的子女），我的女婿曾写了一封信给陈郁同志，说明我们全家的苦难，他立即发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劳动局，要求照顾我的母亲，把我的女儿调到上海工作。这是一九七二年，正是“四人帮”在上海横行时期，他们当然不会发慈悲心，给人民以任何方便，因为在“四人帮”们的眼中看来，凡是从事革命事业者都成为“反革命”了，岂止一家一人。事情虽然不成功，但对于陈郁同志的亲切关怀，不忘同志的友谊，我们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陈郁同志不幸与我们永别了，他的深情厚谊，难以忘记。写出这段很少被人们知道的历史，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但愿后代的人们不要忘记我们历史的惨痛教训。

回忆红九师参谋长胡陈杰烈士

徐孔嘉 陈云阁

胡陈杰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夏曦在红三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陈杰被迫害牺牲，年仅二十九岁。他生前骁勇善战，文武双全，深得贺龙同志喜爱。

—

胡陈杰是四川省铜梁县人，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于土桥乡旧石坝。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城郊东郭乡。七岁入县立小学。十六岁与同乡杨文锦女士结婚。十七岁入县立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深为师生器重和爱戴，被推选为铜梁县学生联合会主席。

一九二二年，四川掀起反日、抵制日货运动。铜梁县城关正街最大的一家绸缎铺为铜梁财阀刘凤梧所经营，他以封建势力为靠山，一贯在商界投机倒把，兴风作浪，专门贩卖贩运日货，牟取暴利。各界多次劝告无效，胡陈杰挺身而出，以学生联合会名义号召各界团体推出代表，同往刘凤梧的绸缎铺，将查获的日货现场烧毁，并面斥刘不得再贩运日货。全场群情激愤，推动了铜梁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

同年，在地方反动势力的策划下，铜梁县政府竟非法拘捕了

具有爱国民主思想，支持学联活动的县议会议长、县立中学学监练哲谙，关在警察局里，企图借此恐吓威胁县议会，驯服学生。胡陈杰得知这一情况后，即邀集同学前往警察局质询，要求释放练哲谙。趁同学们与警官交谈之际，胡陈杰带头打破拘留室的门，冲进去拉着练哲谙就往外逃。练脱险后，胡陈杰又发动群众揭发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非法侵犯人权，钳制民意的种种行径，以支援议会抨击反动政府。这一斗争搞得有声有色，铜梁县政府慑于人民的威力和社会舆论，不得不向练哲谙道歉了事。

一九二三年，驻防铜梁县的军阀旅长廖谦强令征收“门户捐”，凡有户口的都要交纳。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本已多如牛毛，又额外加征“门户捐”，群众极为愤怒。胡陈杰抓住这一时机，跋山涉水，徒步奔赴璧山、永川、大足、江津、合川、潼南六县串连，发动六县学生联合会与铜梁县学生联合会团结一致，共同反抗“门户捐”。六县学联纷纷响应、支持。胡陈杰返回铜梁后，即召开各界团体群众大会，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痛斥反动军阀和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取消“门户捐”斗争。他当场宣布罢市，会后，又率领各界团体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到县政府请愿。铜梁县政府鉴于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巨大的威力，不敢和代表接触谈判，许县长悄悄从后门溜走。“门户捐”也就不了了之，从此取消了。这是铜梁县人民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胡陈杰烈士身体强健，他坚持体育运动，借以磨练体魄。他爬山下坎，喜爱游泳，会做气功，会打拳，还喜欢参加各类球赛。他也爱好京剧，公余之暇，总喜欢自拉自唱几段自娱。抽烟、喝酒、打牌等恶习，他绝不沾染。虽然工作繁重，他仍坚持

勤奋学习，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一九二四年他从铜梁县立中学毕业，立志深造，离别妻女故乡，出川去南京考入东吴大学。行前他曾赋诗与家人话别：

男儿壮志出夔关，
学不成功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接受冯玉祥电邀北上商讨时局问题的孙中山先生，对段祺瑞政府的倒行逆施，抨击怒斥，忧愤疾发，一病不起，竟于逝世。同年，发生了帝国主义镇压反帝运动的五卅惨案。胡陈杰毅然从东吴大学肄业，弃文学武，辗转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在该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十月，胡陈杰由黄埔军校毕业，任北伐军某连指导员。一九二七年党派他回川工作，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副官长兼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时期的川军，大都无组织纪律，扰民害民，民怨极大。胡陈杰到涪陵二十军后，设立了政治部，团以上单位设政治指导员，通过政治指导员开展爱国爱民教育，使广大士兵逐步认识到军队是保国为民的，应严守纪律，买卖公平，有借必还。旧军队中常见的拉夫、拉兵、小偷小摸、纪律涣散等不良现象逐渐减少，军纪也严明多了。

胡陈杰在二十军驻防涪陵期间，为革命培养输送了一批新生

力量。当时涪陵有四中、县中、女师三所中等学校，他物色共产党员白云生、甘再人、杨子厚、余锡根、詹志圣、郭桐森、余尊三、黄绍纪、杨梦蜀和进步人士卢松涛、郭小壁、陈云阁等人担任各校校长、主任、教员，在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帮助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读书会和各种活动。在每周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纪念会上，二十军政治部都派党员去作报告。一九三〇年涪陵暴动时，不少学生参加暴动，上山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后，重庆和下川东一带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胡陈杰利用他的身份想方设法收留掩护来涪陵避难的同志，为党保留了许多干部和党员。如刘道盛、张加明、戴弱生、饶慧丰、邓济时、袁镜明同志等。

胡陈杰回四川搞军运工作后，一九二八年曾准备在二十军的建制下成立一师，为发展红军力量打下基础。就在他费尽心机刚刚组建成一个营时，即被该营营长郑希杰出卖，并密告军长郭汝栋说：“本营有共产党活动。”该军即派出一个团，强令将该营解散整编，并逮捕了连长、共产党员袁镜明，拟以枪决。胡陈杰多方运动、想尽办法极力营救，始得脱险。袁镜明被释放后即去武汉搞军运工作，后牺牲。

一九二九年，二十军改编为整编二十六师，胡陈杰又兼随营学生队队长。由于胡陈杰在二十军中名声很大，身份亦渐暴露，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对他暗中提防戒备，劝他去日本留学而实际上下了逐客令。胡陈杰辞去军职赴上海找党中央，接受了新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初，胡陈杰化装成和尚，悄然回到阔别数年的故乡铜梁，探视亲人。春末，他又化装成渔翁，远离亲人，去到洪湖。

三

洪湖及湘鄂边区根据地，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周逸群、贺龙到桑植的洪家关后，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关系和影响，集合亲友、旧部三千余人，攻占桑植县城后建立的。一九三〇年夏天，胡陈杰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来到这里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红三军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攻占了巴东、秭归、荆门等县。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统治了中央，李立三同志执行以武汉为中心、各地红军配合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错误政策，并派中央特派员到湘鄂边区推行这一错误路线。中央代表只给洪湖苏区留下一个营和少数游击队，使苏区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丧失殆尽。负责地方工作的周逸群、段德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战斗，组织了大量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六军，把根据地恢复起来。整顿部队后建立了红九师，段德昌任师长，胡陈杰任参谋长。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红三军遭到国民党徐源泉、张振汉、肖之楚及川军郭汝栋等匪部的严重打击，贺龙同志率部进入鄂西北，解放房县，创建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窃取了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一九三一年三月，王明派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独揽了党和军队大权。这时敌人使用了“以水代兵”的毒计，挖堤决水，河堤溃口百处，洪水漫天，

死亡十余万人，冲毁房屋十万间以上，逃荒灾民达七十万之多，洪湖苏区军民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况中。

在此紧急关头，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会，贺龙同志建议：放弃原来计划，部队立即返回洪湖。胡陈杰坚决拥护。为了迎接红三军主力回师，段德昌、胡陈杰带领九师战士再渡襄河，于九月二十八日与红三军主力会师于刘猴集。在贺龙的安排下，红三军出师襄北，奔袭天门皂市，守敌四十八师工兵营闻风而逃。贺龙同志命令段德昌、胡陈杰带领九师跟踪追击，顺势包围了在应城陈家河、龙王集一带的守敌四十八师特务团。在激烈的战斗中，九师消灭了应城来援之敌，陈家河守敌被迫投降。敌第四师第十二旅星夜赶来增援。贺龙同志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以少数兵力监视龙王集被围之敌，集中九师和汉川独立团的兵力，在龙王集至应城公路两侧设下埋伏，全歼敌旅长张联华以下三千余人。之后，第九师在段德昌、胡陈杰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到文家墩，歼敌一一四旅。

四

一九三二年一月，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贺龙同志被排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中进一步贯彻和加强，使逐步走向高潮的革命形势又转入革命低潮。同时，他们在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抓“改组派”、“第三党”。胡陈杰同志因与邓演达搞的第三党有些关系，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处决了。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同志伸张正义，经报党中央查核批准，为胡陈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胡陈杰烈士逝世已经五十多年了，但他为革命舍家、舍身的精神，他那种豪爽、潇洒、乐观、大度的军人气概，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王成林整理）

陈志正烈士传略

陈立平 窦止敬

陈志正烈士又名陈述，化名陈福生，笔名陈殖，于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卜弋桥镇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劳勃生路“共舞台事件”中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因叛徒告密，又被重审加判八年零二个月。本来已经判无期徒刑又加判几年，这也是国民党法庭的怪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日，被残酷折磨死于南京军人监狱，终年仅二十六岁。

学 生 时 代

志正天资聪颖，一九二五年在常州初中毕业后，就越级考入上海政治大学。这时正是北伐前夕，各种革命理论冲击着年轻知识分子。志正很快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这里结识了进步同学刘晓和窦止敬。刘晓在奉贤县创办曙光中学。

一九二七年志正转入上海劳动大学，李立三同志在这里任教，给予不少启发，使之在思想上、工作上得到提高。为了进一步探究真理，他刻苦自学日文、德文，并且常去内山书店买日文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

《哲学笔记》等书籍，认真阅读。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使他建立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坚定的革命信念。志正烈士正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并一度担任过劳动大学的党支部书记。

求学期间，寒暑假回到家乡，志正不愿与父母兄弟同住一处，而独自居住在他家桑园中的书房内。他白天与长工（雇工）、镇上的贫苦青年及小学教师等来往交谈，十分亲切；夜晚则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常到凌晨。对亲友们的陈陋习俗，如等级观念、男尊女卑、嫌贫爱富等他常加以抵制反对，因此乡人对他的行为疑惑不解，有的说他是“怪人”，有的说他是“共产党”。

走向社会

一九二八年志正被劳动大学开除，从此完全投身革命工作。他移居上海虹口附近，无固定住所，以报贩、码头工人的身份作为掩护，深入青年学生及劳动群众之中，积极进行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他曾两次被捕，一次装哑巴，坚不答话，巡捕无可奈何地把他释放了；一次坚不承认革命活动，因证据不足，不久即获释放。

一九三〇年，陈志正先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秘书长，与今日尚健在的陈伯村、李华生等同志一起工作过，并且一起对王明路线进行过斗争，陈志正还因此受到处分。

这期间，志正一方面直接从事革命工作，一方面仍坚持阅读日文、德文的革命经典著作。他从日文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

动与资本》，载于一九二九年北京清华大学《清华周刊》三十卷四百五十四至四百五十六（三期）；又翻译了日本白板逸郎著的《历史的人口法则》及《抽象人口法则》等两章，载于一九三〇年北京出版的《新民半月刊》第十三、十四两期。这两篇译文都是托他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二哥志安发表的，现在都有复制影印本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另外志正还有其他译著。为了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他收集了很多中国经济资料，可惜都已散失。

一九三一年，陈志正离沪去北京，一面继续进行革命工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一些自然科学。许多和他接触过的同志，都钦佩他的理论水平和广博知识。可以说，他一生除了学习与革命外，别无所求。

一九三二年初，志正因父亲病危，回家乡探视。见母亲日夜护理父亲，十分辛劳，他立即在夜间代替母亲护理父亲。他对父亲既有感情、又有界限。父亲是了解他的，临终前曾关照母亲：“志正秉性刚烈，有他自己的志气。他是不肯蹲在家里的，他要离家外出，就让他去罢！不必强留。”果然，父亲死后不到一月，他又到上海去做革命工作了。

在他离家赴沪之前，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和搜查，曾把不少书籍、文件和写作稿件，用油纸包封投入桑园中的池塘内。五十年沧桑！池塘已被填平，恐已无法复得。

被 捕

父亲去世后，志正在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回到上海。七月十七日“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在共舞台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

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上海各工厂、学校“民联”的代表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还有江苏省一些地方“民联”的代表。其中不少是党员、团员。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召开这样的大会还事先在国民党报纸上登了启事。结果会议没有开始，即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陈志正、顾卓新等同志立即组织多数同志和群众脱险，不幸自己被捕。这就是著名的共舞台事件。这次被捕八十八人。一次开会就被捕这么多人，这在上海革命史上算是最大的案件之一。被捕的人，先关在上海警察局一星期，后转解上海龙华司令部，不久又解到南京军政部军法司，被审讯两个多月。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基本上弄清了案情，就在九月二十七日判决了。十月一日黎明，十三位同志被判死刑壮烈牺牲在雨花台，其他人被判处六至十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志正被判无期徒刑。除两位女同志留在南京坐牢外，余均解往苏州江苏陆军军人监狱。“共舞台”事件发生以后，党组织以及保障人权大同盟的蔡元培先生等曾先后组织营救，没有成功。

狱 中 斗 争

在苏州陆军军人监狱里，志正和有些同志被当作重犯，戴着笨重的镣铐，住的是黑暗闷气的牢房，吃的是霉饭烂菜，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进监狱的头一年，他们编辑过秘密手抄刊物，对狱中同志进行自我教育并与狱中托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志正是主要编写人之一。另外，他们利用墙角小缝，互递条子，沟通消息，他常常还借此帮助隔墙难友学习。

志正在监狱斗争中，也是最勇敢、最坚定的战士。一九三四

年六月，狱中掀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斗争，要求改善伙食和争取“开禁”。由于志正直接面对敌人说理斗争，被毒打六十军棍，还加了两副重镣，但他毫不在乎，仍坚持斗争。

即使在监狱里，志正也没有放松学习和译著。除经常阅读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外，他还翻译一册日本大内兵卫著的《财政学大纲》，狱内无纸张，他就用铅笔头以蝇头小字写在原书的行间空隙，译完了上、中两卷，约二十余万言，原译稿从狱中带出后，由他的堂外甥女潘清婉誊清成册。现亲笔译稿已散失，清稿本保存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在狱中，他还对黑格尔著《大逻辑学》原文进行翻译，可惜译稿已失。

一九三五年五月，监狱统治者突然提出三十几名政治犯照相，其中有陈志正、章夷白、顾卓新等。后来知道这是叛徒告密，说有人在狱中进行共产党活动，照片是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从中辨认出八个主犯，即章夷白（章慕勇）、陈志正（陈福生）、顾卓新（陈广和）、王致中（陆锦恒）、潘尔波（郭忠）、海潮风（连丕烈）、肖炳生、王不坚（王世明）。一九三五年六月，以上八位同志连同两个叛徒，一齐被解送南京国民党政部军法司看守所。

在军法司看守所，他们八人被关在一起，获得互相商量的机会。其实他们早把在狱内编写的刊物《囚声》销毁了，所以敌人和叛徒无法拿到他们活动的任何证据。在审判时，章夷白、陈志正等同志还先后与两个叛徒在庭上当面对质，终因拿不出任何证据，审讯未有结果。在宣判前，八位同志都作了牺牲的准备。特别是陈志正已判无期徒刑，今又将加刑，肯定要被处死。但他毫无悲观怕死的表现，照常读书、译著、帮助别人学习，情绪稳

定，只是肺病逐渐加重，身体愈益衰弱了。

八、九月间宣判，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判陈志正等四人八年零二个月，其他四人加判八年，判决后即关进南京陆军军人监狱，作为重犯对待，看管特别严厉。不准他们与其他犯人接触，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此时，志正的家人多方设法营救，但他坚决拒绝履行任何形式的悔过手续，认为自己无过可悔。

在南京监狱期间，志正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的意志很坚定。那时有些同志对时局不很了解，对前途有些悲观，但他对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很有信心，极为乐观，曾写信给他二哥志安，引用雪莱的著名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么？”坚强地表明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他的大哥志定在他病重时，特往监狱探望，见他病情严重，但神色安详。他亦自知病重，却把生死置之度外，爽朗地说：“我死后不要运回常州，就葬在南京。书籍、衣服，统统送给难友，不要带回去。”尽管他的身体已非常瘦弱，但刚正的性格丝毫未改，也丝毫没有悲观失望情绪，还念念不忘难友。令人感动不已！当病危时，移入病监，据当时护士回忆，他躺在床上，仍然手不释卷。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日，志正在南京陆军军人监狱里与世长辞了，终年只有二十六岁。当他的死讯传出时，同狱难友们无不悲痛万分，万分惋惜这位坚贞不屈、才华横溢的同志。

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家庭接到狱方死亡通知书时，附有他给家中的遗书，其中有言：“我生无内疚，死无怨尤”；“愿弟妹们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这铮铮有声的几行大字，为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作了简明的总结。陈志正烈士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指引着下一代青年的方向。

向警予被“引渡”内幕

於润华

一九二八年春，向警予同志化名易向氏，隐藏在汉口法租界，不幸被叛徒告密。国民党驻汉口卫戍司令部派本文作者於润华带着叛徒黄佑南到法租界交涉逮捕引渡向警予同志。由于我党派人出重金“赎取”，法租界巡捕房虽然逮捕了向警予同志，但拒绝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于是汉口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涂允樟便建议卫戍司令胡宗铎通电全国：收回汉口法租界。通电发出后，汉口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又组织各界响应，最后法领事不得不道歉，把向警予同志交给汉口卫戍司令部稽查总队。於润华在此文中没有详谈逮捕向警予同志的经过，但对发起收回汉口法租界运动的始末及国民党与外国领事间的秘密外交活动叙述得比较详细。现特予发表，以供参考。

——编者

桂系初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桂系首脑李宗仁率桂军由南京西征到达武汉后，派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聂沈为参谋长。司令部辖参谋、军法、军需、军医、副官、秘书六个处。秘书处专管卫戍司令部对外交涉、列席民众团体开会，和普通应酬文稿等事

项，置处长一人，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政治学博士涂允檀担任，自兼英、法文并置俄、德、日文秘书各一人，和普通秘书、法制（国际法）秘书各一人。我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在上海、南京失业后回到武汉的，由张知本（原湖北省立法大校长，我在该校任过财经教授）介绍给胡宗铎，暂充日文秘书，帮办日租界警察打死中国车夫水杏林案的交涉和口译工作，同时在该部等候湖北省财政厅长张难先先生同意我在清理公产筹备银行工作（张知本介绍）。

向法租界交涉引渡易向氏

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直辖的稽查总队里，有一个向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自首的叛徒黄稽查（湖南人，名佑南），他向胡宗铎、聂洸告密，说有两个女共产党员匿居法租界，一个叫易向氏（后涂允檀答我的问说是“向警予”），一个叫易夏氏。涂允檀处长奉命向法领事陆公德交涉，陆公德允准卫戍司令部的稽查会同法国巡捕去逮捕，并答应捕到后“引渡”给汉口卫戍司令部。

一九二八年初春的一天上午，聂洸命我同黄佑南一同去法租界逮捕易向氏和易夏氏。涂允檀临时决定去民国日报馆（他任馆长）开会，便叫我同法租界的巡捕长波勒接洽引渡她们的事。我们到了法租界，黄带着法捕和稽查将易向氏、易夏氏指到巡捕房。我向波勒说明我的来意，不料他厉声说：“刚才接到我们领事的电话，绝不移交。”并指着我说：“你们中国人不懂法租界章程规定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吗？”我只得回部先后向聂、涂报告了。涂允檀以后又来向法领事交涉过两次，仍无结果。我问涂处长：“为什么法领事陆公德先答应了你，以后又变了呢？”

他答：“可能因为易向氏颇重要的缘故。她曾留学法、苏，任《大江报》主笔，是个著名的共产党员。”

涂允檀在对法租界交涉过程中请假一星期，回黄陂原籍为祖母祝寿，嘱我在法领事有电话找他时，代他去一下。过了三、四天，一个下午，法领事馆的电话来了。聂参谋长叫我去一下。我到法领事馆时，一个馆员开门指着陆公德对我说，那就是陆领事。没容我问话，陆公德在楼梯拐角处跺脚向我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只认识涂博士。你们中国人不守时间，不懂外交礼节，又没有介绍信来。”接着又大声向着我说：“陆公德领事不在家！”我受了一顿窝囊气，只得返回报聂洸了。

涂允檀回来时，我又将上情报告他，他说：“这个交涉颇麻烦，以后移交给外交部驻汉交涉员甘介侯负责办理。”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策动收回汉口法租界

涂允檀后虽将法租界交涉移交甘介侯负责办理，但在幕后策划。一天上午，涂允檀从汉口特别市党部来秘书处，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誊抄他拟的通电稿，电文颇长，修改很多。他先念给我听，念到法领事陆公德向易向氏、易夏氏勒索三十万元贿赂时，我吃了一惊，说：“这个消息从何得来，是否真确，否则通电一打出去，要出乱子。”涂答说：“这个消息是法领事馆里一个馆员秘密传出的，甘交涉员也知道，我已报告胡司令了。”

涂允檀将他所拟的通电稿送胡公馆，请胡宗铎核判。胡很表愤慨，但考虑到通电发出后的影响，颇有顾虑。涂进言说：“这个通电发出后，司令的政治地位可以提高。”胡就判“行”了。涂离开时，胡又追嘱涂允檀再仔细考虑一下。涂送陶军长看后，

交聂参谋长发了。

上项电文，我很费力地回忆，仍记不起全文来了，只记得有“汉口法领事陆公德违背诺言，拒不移交给向氏、易夏氏，借口租界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实则向易向氏、易夏氏勒索三十万元的贿赂……是可忍，孰不可忍！……”等语，意在激起国人义愤，电文最后表示要收回汉口法租界。

发电次日，涂允檀利用他身兼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并代组织部长（陶钧）和宣传部长、《民国日报》馆馆长等数职的便利，策动汉口总商会、武阳两商会、汉口银行公会和其他重要机关、学校、团体，推派代表组织“武汉各界收回汉口法租界后援会”，推选麦焕章（李宗仁的第七军政治部主任、汉口《中山日报》社社长、市党部委员）做主席，负责宣传收回法租界和联络工作，经费概由商会担负。各界代表有项仰之、余蓉樵、秦禊卿等，并雇佣了几个职员。

涂允檀在秘书处对处员说：“这个后援会是民众运动的团体，卫戍司令部不便参加，如该会有通知来，请李秘书去列席。”实际这个后援会是他一手操纵的。

法领事陆公德向胡宗铎发出最后通牒

武汉卫戍司令部发出通电斥责法领事陆公德后约一个星期，法领事陆公德将停泊九江的两艘法国军舰（包括海军陆战队）调到汉口江面；并在华法交界各交通路口，检查出入行人，密布电网、巡捕们荷枪实弹，法租界已进入戒严状态。

陆公德布置完毕后，便通过外交部驻汉交涉员甘介侯，向胡宗铎发出最后通牒，通牒大意是“贵司令妄听于秘书（这里应为

涂允檀，是他将陆公德勒索贿赂的消息报告胡宗铎并发电收回法租界的。而法领事用“於秘书”，显系不想得罪涂，留条后路）之言，侮辱我大法国驻汉总领事陆公德向易向氏、易夏氏勒索三十万元的贿赂。试问上述款项系用何国币制、在上海何时、由何银行汇往巴黎？兹特向贵司令提出最后通牒，限贵司令于文到后四十八小时内圆满答复，并正式道歉。否则，敝总领事采取断然之处置。”这个通牒涂允檀在交涉员甘介侯处看到了，两人颇表慌张，涂允檀回部又接到胡宗铎的电话，催他去胡公馆。涂允檀怕挨骂，邀我同去，我答说：“在誊抄电稿时，我就向你提过，怕出乱子，现在果然出了。”他难以作答，我便和他同去了。

我们到了胡公馆会客室，胡宗铎一见便向涂允檀骂说：“我叫你不要打这个通电，你还是打了，怎么办？”涂面红耳赤地说：“通电稿子是司令判了‘行’才发的。”胡说：“我不是叫你再详细考虑一下吗？你也没有再报告我。”涂又答说：“这个通电发出后，这几天各方复电响应主张收回法租界，南京除蒋介石和王正廷（外交部长）无复电外。何应钦和各部都回了电，表示赞同，司令的政治地位是提高了。”胡忽厉声说：“什么政治地位提高了，过了四十八小时，法国的海军陆战队上了岸，我不是完蛋了吗？”这时涂允檀的两腿颤起来了，他向我示意，并对胡说：“看於秘书有什么意见？”我只得轻松地说：“事已至此，只宜进，不宜退。我想，法领事这个最后通牒不值一驳，幼稚得很。司令的通电主要是揭发指责法领事陆公德勒索受贿，犯有国际外交上的刑事罪行。陆公德不但不以为可耻，反而要用武力来对付中国，保护他的租界。今后不是易向氏、易夏氏的引渡问题，而是中国要收回汉口法租界的大问题。我建议尽可再发第二

个通电，明告国人，同时据理驳复法领事。”

胡宗铎决心收回法租界

胡宗铎颇以我的话为然，便坚定地说：“我抽调一师兵力作收回法租界的准备。叫汪以南（市公安局局长）沿着法租界西边，另辟一弧形马路，两头接着特一区（旧德租界）、特二区（旧俄租界）和法租界毗连的马路到江边。从三方面包围法租界。通告行人，不得通过法租界，沿着新路走；同时通告法租界中国居民，于三个月内迁往中国地界，叫法租界变成一块无用的死地。”他旋即嘱涂允檀草拟第二次通电稿和对法领事最后通牒的驳复。

次日上午我到秘书处，向涂允檀问电文和驳复怎么样？他答说：“通电和驳文昨晚分别由司令部和交涉员公署发出了。”我问内容怎样？他答告：“电文和驳文内容大致相同，前一段将最后通牒原文照抄，后段的头一节照你的意见驳斥和指责。末节改了一下，就是法领事陆公德不以勒索三十万元贿赂为满足，反欲用武力庇护共产党，扰乱武汉治安……”我当时心里想，法领事陆公德是反共的，何以要用武力庇护共产党，扰乱武汉治安呢？假若法领事再来一个最后通牒，要卫戍司令部提出证据，那就更麻烦了。当上项消息传开以后，武汉市面较第一次通电时更见紧张，法租界增加了武装戒备，局势颇为严重。

秘密交易的结果——陆公德逃走

第二次通电和对法领事驳复发出后，胡宗铎虽然军事上作了布置，为收回法租界作准备，但局势若发展下去，后果使桂系颇为忧虑。如果中法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李宗仁在广西的老巢是

否会受到越南法兵的威胁？蒋介石是否会乘人之危？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汉口英国领事却出来进行调解。是李宗仁、胡宗铎熟商之后，授意甘介侯、涂允檀串通了英领事？还是英领事怕法租界被中国收回后会危及英租界？这个内幕只有甘介侯和涂允檀知道。一般人只了解英、美、法、中秘密交易的一些表面的东西。

法领事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下午四时光景，涂允檀到秘书处叫我将他写的一封英文信送往英文楚报馆，面交该报主笔格兰特。我问信的内容，他答说：“英领事介绍格兰特给卫戍司令，每月送给格兰特顾问费四百元，请他在英文楚报上多多宣传收回法租界的消息。”我问他说：“四十八小时快到了，英文楚报再宣传有什么用？”涂说赶快送去就是，送到不要停留就回来。

最后通牒的第三天上午七时许，我在卫戍司令部秘书处听李秘书说：法领事陆公德昨晚深夜已经上军舰逃往上海了，法租界的电网都撤除了，往来交通也恢复照常了，我很惊讶地说：“你说鬼话，哪会有这种怪事？”他说：“昨晚胡司令、陶军长、聂参谋长、涂处长都在这里没有回家睡，我奉命在秘书处值夜班，往法租界江边看了的。我在法租界的波罗馆（白俄人开的跳舞厅）听见谈论说，昨天深夜，英文楚报馆主笔格兰特拿着一份假号外稿子到波罗馆找到法领事陆公德急忙地说：卫戍司令部一两小时内要派一师兵，冲进法租界接收你们的领事馆和巡捕房，如果你不赶快走，你的生命都有危险，我要去发紧急号外。陆领事吓得慌乱起来，再三要求格兰特不要发这个号外，自己急忙找他夫人去了。他的夫人下楼还慌得跌了一跤。后来格兰特就送陆公德夫妇上了军舰。陆领事依格兰特的劝告，下令波勒回去

将电网和武装戒备拆除了。到凌晨三时许，陆公德坐的军舰才离开武汉江面往下游去了。”秘书处的同事听了大笑一场，说把陆公德哄骗走了。涂允檀来后，我问究竟，他笑答：“这回英领事帮了大忙，紧张局势算是完全解除了。”不多一会儿，《民国日报》来了，刊载的大字标题是“汉口法领事陆公德愚人自扰，害怕中国派兵收回法租界，往来交通恢复如常……”。武汉地区的紧张局势，顿告消失了。

徐謨和約爾根來漢引渡易向氏

陆公德不得到南京法国公使的命令，虽然上了军舰，也不敢自己随便离开汉口。据第二天的九江消息说：法国两艘军舰由汉开抵九江江面停泊，足见陆领事仍在待命。直到南京法国公使命上海领事约尔根与陆公德对调后，陆公德才东下上海。约尔根路过南京，与法国公使和中国外交部、英公使都会晤后与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謨同来汉口。徐謨住在外交部驻汉交涉员兼江汉关监督公署。次日由甘介侯、涂允檀陪同谒见了李宗仁、胡宗铎、陶钧和聂沈，并一同拜会了英领事。关于收回法租界和引渡易向氏、易夏氏的问题，他们秘密磋商了好几次。最后，法领事约尔根发出致外交部驻汉交涉员公署并转致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一件正式道歉（这个复照是在新领事约尔根和徐謨同到汉口后四、五天后送来的）。徐謨次长看到这份照会后，便离开汉口回南京复命去了。该项复照的内容大意是：“敝法国驻汉领事陆公德年迈荒唐，处置失当，致触贵司令之怒，兹特备照向贵司令正式道歉，并请转告‘於秘书’不必介意。嗣后在法租界逮捕‘匪类’悉听贵国官厅要求，敝领事馆无不依照办理。并附送易向氏、易夏氏移交单壹

纸，请贵司令即日派负责人员来敝领事馆办理接收签字手续为荷。”

甘介侯、徐謨接到领事约尔根的正式道歉复照后，很高兴。甘介侯即将该项道歉复照亲送李宗仁、胡宗铎、陶钧、聂洸、涂允檀看了。第二天，甘介侯奉胡宗铎、聂洸之嘱，到卫戍司令部和涂允檀、李铭勋（稽查总队长）前往法领事馆和巡捕房。法领事约尔根、法巡捕长波勒签字移交。甘介侯、李铭勋签字接收，最后由李铭勋将易向氏、易夏氏带到稽查总队。

我依照省财政厅长张难先先生的预约，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到财政厅去报到，担任清理公产筹办银行的工作，关于易向氏、易夏氏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涂允檀出谋划策要回易向氏、易夏氏之后的第三天就升了少校督察。

尾 声

易向氏、易夏氏到手，胡宗铎便不再喊收回法租界了。涂允檀遂又利用他主持汉口市党务的权力，将“武汉各界收回汉口法租界后援会”换上“武汉民众外交后援会”的新招牌。这个新的工具，不久也就自行消失了。对国民党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蒙哄国人、结束收回法租界运动。涂允檀拟了一个最后通电稿，前段将法新领事约尔根的正式道歉照会完全照抄，后段大意是：法领事约尔根已正式备照道歉，并将易向氏、易夏氏签字移交，则汉口法租界事件，系一武汉地方事件，业已告一段落。至于收回汉口法租界问题，关系中央整个外交方针，听候中央解决”云云。这个通电完全暴露了桂系收回汉口法租界的实质是为了引渡向警予。

最后通电发出以后，冯玉祥首先来电道贺，电文是“武汉卫

成司令部胡司令勋鉴：法租界外交处置恰当，特电驰贺。”胡宗铎阅后交由聂洸通传司令各处知照。其他各方虽然陆续复电，但大不如前此之迅速、热烈，可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一九六四年）

订 正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同志：

你们编辑出版的《革命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四辑中，一篇由吴晓梅同志整理的尚钺同志《囚日》一文，有一段描述明显失实：“……另外还有一个浙江青年，名叫汤健豪，嘴中常骂人，表面很左，可暗地里也在干坏事。…那个汤健豪喜欢吃小老头家中送来的东西，并合伙破坏我们的活动，引起大家的谴责。我出狱后，听说汤健豪后来象癞皮狗一样，也被敌人枪毙了。”

首先，汤健豪（元炳）同志并没有被敌人枪毙，他还健在，他现在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其次，当时狱中同志对汤健豪同志都很熟悉，骆耕漠、庄启东在大监时和他在一起，张崇文、徐雪寒在东监时和他在一起。我们几个人都知道汤健豪同志在狱中并没有破坏过我们的活动，也没有暗地干过坏事。

我们估计，尚钺同志显然是把另外人的印象误记为汤健豪同志的事了。

可惜，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尚钺同志已经去世了。现在只由我们写出以上更正，希望编辑同志能够设法刊出。

张崇文、骆耕漠、徐雪寒、庄启东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